舍斯托夫文集

张冰 主编

第4卷



Лев Шестов

АПОФЕОЗ БЕСПОЧВЕННОСТИ

无根据颂

——非教条主义思维的一次尝试

张冰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http://www.cp.com.c




ISBN 978-7-100-16626-
9 787100 166263 >
定价：34.00 元

舍斯托夫文集 第4卷

张冰 主编

АПОФЕОЗ БЕСПОЧВЕННОСТИ



Лев Шестов

无根据颂

——非教条主义思维的一次尝试

张冰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舍斯托夫文集.第4卷,无根据颂/(俄罗斯)列夫·舍斯托夫著;张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ISBN 978-7-100-16626-3

Ⅰ.①舍… Ⅱ.①列… ②张… Ⅲ.①舍斯托夫—文集 ②哲学思想—俄罗斯—现代 Ⅳ.①B512.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5225号

舍斯托夫文集
第4卷
无根据颂
——非教条主义思维的一次尝试
张冰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6626-3

2019年7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201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6⅝
定价:34.00元

Лев Шестов

АПОФЕОЗ БЕСВОЧВЕННОСТИ

Опыт Адогматического Мышления

本书根据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译出

《舍斯托夫文集》总序

列夫·舍斯托夫（Лев Исаакович Шестов，1866—1938），原名耶古达·莱布·施瓦尔茨曼（Иегуда Лейб Шварцман），是伟大的俄国哲学家，存在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和奠基者，白银时代俄国文化杰出代表之一。

20世纪俄国哲学被誉为给世界思想界的“一件礼物”，而列夫·舍斯托夫是20世纪俄国哲学的“头把交椅”或“第一小提琴手”。在追溯俄国白银时代宗教哲学思想经由欧洲各国首都等侨居地城市向欧洲思想界渗透、逐渐被吸纳并与之产生深刻共鸣的全过程时，如果缺少了对于列夫·舍斯托夫思想的研究，那将是残缺不全的。列夫·舍斯托夫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俄国哲学家”，对于世界哲学文学界产生了持续而又深远的影响。在欧洲，他是名副其实的“存在主义之父”，同时早在生前就被公认为俄国文坛从象征主义问世以来所有俄国现代派的“祖师爷”和“思想前驱”。

1866年1月31日（俄历2月12日），舍斯托夫出生于基辅一个商人家庭，父亲伊萨克·莫伊谢耶维奇·施瓦尔茨曼（1832—1914）系大工厂主兼一级商人，母亲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娘家姓什列伊别尔，1845—1934）系其父第二个妻子。其父所经营的

"伊萨克·施瓦尔茨曼布料公司"坐落于波多尔，以经营高质量的英国布料著称。该公司由施瓦尔茨曼夫妇创立于 1865 年。从 1884 年起，公司拥有该城最大的商店，从 1892 年起，公司在克列缅丘格（乌克兰城市）拥有分公司。

舍斯托夫的父亲系古犹太语文献专家、自由思想者，观点进步，视野开阔，思维开放。他想让孩子继承自己的家业，但在这个问题上也并不强求。列夫有两个弟弟、四个妹妹。列夫就学于基辅第三古典中学，但很快就被迫转学莫斯科，在莫斯科大学数学系学习，后转入基辅大学法律系。1889 年以副博士学位从该校毕业。学位论文《论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被严禁发表，并被莫斯科审查委员会销毁。为此而未能获得博士学位。

毕业后列夫在其父在基辅的公司里工作了几年，同时高强度地研究文学与哲学。但把商业和哲学结合起来并非易事。1895 年他患了严重的神经紊乱症，翌年出国治病。此后其父的家族企业对这位思想家成了一种家族的诅咒：此后他还将不止一次中断心爱的工作，抛开家庭和孩子，回到基辅整顿被其父放任自流，又因两个弟弟缺乏规矩而变得松松垮垮的公司的秩序。

1896 年列夫在罗马娶了正在该地学习医学的安娜·叶丽阿扎洛芙娜·别列佐夫斯卡娅为妻。两年后二人移居波恩。1898 年回到俄国。

1898 年舍斯托夫的处女作《莎士比亚及其批评者勃兰兑斯》出版。该书所勾勒出的问题后来成为贯穿这位哲学家全部创作的主题：对于人在世上的"定向"而言，科学认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一般理念、体系和世界观也会遮蔽我们直观美丽而又多样、

丰富而又真实的现实生活的眼睛；把具体感性的人类生活及其悲剧性放在前景中加以考察；不接受"规范标准"的、徒具形式的、强制执行的道德和普遍"永恒"的道德律令。

此书问世后，舍斯托夫紧接着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和文章，分析俄罗斯作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尼·托尔斯泰、安·帕·契诃夫、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费·索洛古勃——创作中的哲学内蕴。舍斯托夫在这些著作中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他在其处女作中提出的问题。在此期间，舍斯托夫结识了俄国著名的文化赞助人佳吉列夫，后者是他在《艺术世界》杂志的同仁。

1905 年舍斯托夫出版《无根据颂——非教条主义思维的一次尝试》，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知识界引起异常尖锐激烈的争论，争论中出现的观点针锋相对，从欢呼雀跃到坚决否定，不一而足。这本书实际上是舍斯托夫的哲学宣言。按照舍斯托夫自己的说法，"……我的全部任务恰好在于要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种类的、被形形色色的、伟大和并不伟大的哲学体系的奠基人以如此莫名其妙的顽强精神所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开端与终结"。

1915 年舍斯托夫婚前所生儿子谢尔盖·利斯托帕多夫战死。1917 年二月革命，舍斯托夫并不感到喜悦，尽管他永远都是专制政权的敌人。1920 年舍斯托夫携家离开苏维埃俄国，在瑞士逗留了不长时间后，于 1921 年定居法国直到逝世。

此时他在哲学上关心的课题是巴门尼德和普罗提诺、马丁·路德、中世纪德国神秘主义者、布莱兹·帕斯卡尔和巴鲁赫·斯宾诺莎、索伦·克尔凯郭尔，以及同时代哲学家埃德蒙·胡塞尔。舍斯托夫由此进入那个时代西方哲学界的核心精英圈，而和埃德

蒙·胡塞尔、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马克斯·舍勒、马丁·海德格尔、乔治·巴塔耶等有密切交往。他还在索邦大学举办讲座和开设课程，内容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以及整个俄罗斯哲学思想。舍斯托夫还对《路标》杂志（巴黎，1926—1928）的编辑出版提供了帮助，1925 年该刊第 1 期刊载了他的哲学论文《发狂的演说——关于普罗提诺的神魂颠倒》。

1938 年 11 月 19 日，舍斯托夫于巴黎的布瓦洛诊所溘然长逝。

舍斯托夫通常被人称为“反哲学家”：其主要追求是挣脱意识的束缚，因为意识——由公式和模式等理性抽象物构成的意识——既构成了世界的基础，也遮蔽了真正的现实。自明性即死亡和痛苦的自明性，是世界强加在人身上的。对人而言，这种自明性是在理性主义和人文道德中得以体现的。舍斯托夫没有沿着主流经典哲学家开辟的思辨大道前行，而是剑走偏锋，走了一条“灵魂中的漫游”式的哲学之路，为此他选择格言警句体和评论注释体进行写作。对于舍斯托夫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从普遍必然判断这种幻觉的俘虏下挣脱出来，走向上帝。因此他为自己的哲学研究选择的对象是面对上帝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卡尔、尼采、克尔凯郭尔——的经验（体验）。舍斯托夫完全被圣经的魅力所吸引，尤其是圣经中那些先知们以及使徒保罗。正是圣经以其向世界发出的挑战，以及上帝对这种挑战的回答证明，自明性是一种可怕的幻觉和骗局。“理性导向必然性，信仰导向自由”——这句话完全适合舍斯托夫自己的命题。

迄今为止，舍斯托夫的著作在俄罗斯国内外以各种欧洲语言

出版了有数十种之多。其中,俄罗斯出版的文集从上个世纪初至今,便有所选篇目多寡不等的数十种文集(多数为两卷本)。国际上出现最早的是法文版文集、德文版文集等。

在我国新时期以来的外国文学界哲学界,自从列夫·舍斯托夫的《在约伯的天平上》(我校董友先生译)、《开端与终结》、《旷野的呼告》(方珊译)问世以来,在读书界产生了持续、持久、恒常的影响,包括上述译著在内的舍斯托夫的著作,在数十年间,持续不断地由多家出版社再版,成为读书界"学术类书籍的常销书",也成为学术低迷、拜金至上时代的一个"思想的奇迹"。有鉴于此,对于舍斯托夫思想在20世纪俄罗斯和世界思想史中的意义与地位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编纂一部信实可靠的列夫·舍斯托夫文集,就成为当今学人对于我国外国文学和外国哲学研究界应该承担的一种责任和义务。

舍斯托夫著作在我国的翻译介绍,可以从以下简表中见一端倪。《在约伯的天平上——灵魂中漫游》(董友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1版);《旷野的呼告》(方珊、李勤译,华夏出版社,1991年第1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开端与终结》(方珊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舍斯托夫集》(方珊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初版;2004年第2版);《以头撞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版);《双头鹰文库》(方珊、张冰主编,共6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舍斯托夫文集5卷本》(方珊主编,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卷《钥匙的统治》,第2卷《在约伯的天平上》,第3卷《雅典与耶路撒冷》,第4卷《旷野呼告·无根据颂》,第

5卷《思辨与启示》）；《雅典与耶路撒冷》（张冰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钥匙的统治》（张冰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旷野呼告·无根据颂》（方珊、张冰等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我们这个即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舍斯托夫文集》，除以上已经翻译过的著作外，增补了最新发现的舍斯托夫著作4部：《莎士比亚及其批评者勃兰兑斯》《希腊哲学史讲演录》《伟大的前夜》和《唯凭信仰》。这几本书本人在2015年在莫斯科大学访学时全部购齐。目前，拟议中的《舍斯托夫文集》分为13卷。第1卷：《莎士比亚及其批评者勃兰兑斯》；第2卷：《托尔斯泰与尼采学说中的善》；第3卷：《悲剧哲学》；第4卷：《无根据颂》；第5卷：《开端与终结》（文集）；第6卷：《伟大的前夜》；第7卷：《钥匙的统治》；第8卷：《在约伯的天平上》；第9卷：《旷野呼告》；第10卷：《雅典与耶路撒冷》；第11卷：《思辨与启示》（文集）；第12卷：《唯凭信仰》；第13卷：《希腊哲学史讲演录》。

舍斯托夫的著作在读书界享有广泛而又良好的声誉，这次中文版《舍斯托夫文集》的问世，必将引起广大读者的热情关注，欢迎广大读者对本文集的编纂和翻译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修订。相信经由我们的努力，一定能使舍斯托夫和中国读者之间的“心桥”更加畅通无阻。

谨以此为序。

张冰

2018年6月

本卷说明

《无根据颂》在列夫·舍斯托夫的创作生涯中是一部阶段性著作，而其作者的哲学思想之所以被世界所认可，也正是因为其思想的“非教条主义思维”特征。舍斯托夫最初动笔时是想将其写成“正经”的专著的，可是，越写越觉得自己的思想复杂而又矛盾，很难被硬性塞进既定的思维框架中去。作者意识到必须去掉“中心思想”和“体系化”的束缚，才能获得思想的自由，因而创造出一种最适合表达其思想的文体——格言警句体。

本书最初命名为《屠格涅夫与契诃夫》，1904 年改为《无根据颂》。在舍斯托夫的全部著作中，没有哪部像《无根据颂》那样，首次出版问世（1905，彼得堡）就引起空前未有的激烈争论。初版以来再版达十多次之多。先后被译为法语、德语、英语、日语等。

本书由序、第一章（122 则）和第二章（46 则）组成。

目　　录

序

一

需要为自己做个辩解，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仅仅在于从何谈起：从本书的形式，还是从本书的内容。在西方，采用格言体进行阐述十分普遍。而在我们这里，情形却截然不同。我们这里认为，一本书应当是一个有着逻辑关联的、成熟的体系，由统一的思想把它贯穿起来，否则就会有负于它的使命。是的，如果一本书不具有任何别的使命的话，那么，说它是格言体通常就是对它最严厉的批评了。缺乏内在联系的零乱思想，最多只能看作只有经过相应加工才能获得某些价值的原材料。但是，随着人们对连贯性越来越不信任，随着对任何统一思想的可适用性怀疑的增强，一个人难道不应该对最适合现有偏见的阐述方式产生厌恶吗？我这么说只是根据我的经验。本来，我并不想赋予本书以现有的这种形式。连贯和系统的阐述习惯即使在我身上也已根深蒂固。在我这本书甚至已写了一半时，我的工作大致就是按照既有的提纲进行的。但随着工作的进展，我越来越感到继续写下去令我无法忍受、令我痛苦。有一段时间连我自己也搞不清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材料早

已准备就绪，剩下的差不多只有外部结构问题了。可我所理解的外部结构原来比我感觉到的东西更加重要得多。我开始怀着惊奇和疑惑发现：有一样东西最终成了“思想”和“连贯性”的牺牲品，那就是文学创作中最应受到保护的东西——自由思想。有时，一些外表不引人注意的、微不足道的情况，比方说阐述某一思想的位置或其毗邻关系，便已赋予了非我所愿有的明晰和确定的色彩，对此我无任何权利改变，而且也是我最不愿有的。而所有的“因为”，以及用作结论的“所以”，甚至包括普通的“和”字，及其他一些无辜的、借其之助能把零星得到的判断联结成为一条“缜密严谨”的思维链的关联词——上帝，它们原来竟是一些多么残酷无情的暴君呀！我看出来，这样写作至少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要知道，我所具有的有关读者的一切记忆都在告诉我，一本书中最沉重、最累赘的就是中心思想。你只要不愿成为书的纳贡者和驯顺的奴隶，你就该设法根除它。然而，迄今为止，只要公认的阐述方式得以保留，思想就不光会占据首位，而且会压倒书里的全部内容。因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途径能达到全书的完整和统一呢？我确信，别的途径是没有的，必须重新把盖了一半的楼房拆成一块块的砖瓦，冒着会激起读者尤其是批评界痛恨自己的风险。批评界当然会认为对传统形式的破坏不是什么别的，而是奇思异想，让著作以一种无任何外在关联的一系列思想的形式出现……没有思想、没有概念、没有连贯性，有的只是矛盾，然而这恰恰正是我所要达到的目的，这一点读者可能从标题本身就已经猜到了。无根据，甚至是无根据颂，当我的全部任务恰恰在于要一劳永逸地摆脱伟大及不伟大的哲学体系的奠基者们以可以理解的顽固强加给我的各类

开端与终结的时候，还谈什么外在完整性呢？现代思想的立法者所确立的不可动摇的原则是：学会终结。可你不妨试着去问问他：是什么赋予他权力，去如此自信地宣布自己的法则——你就会发现，在他那里，实际上除了“按照类推法证明”外，没有灵魂。没有屋顶的房子百无一用，因此（ergo）没有开端和终结的思维应该被推翻。然而，要知道一幢没有炉子的房子也无法履行自己的使命。难道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给作家提供了烟囱和炉挡吗？况且，一般说来，须知类推证明法是最贫弱、最缺乏说服力的一种证明。实在说来，甚至根本就不算什么证明。然而无论我怎样搜索记忆，我都无法想起一条有利于完整性的严肃理由。带屋顶的房子就把一切都说尽了。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能以我们理性的追求作为辩解的理由的呀！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怜的理性不追求的呢？还有什么东西是追求不能为之辩解的呢？至少人们一度曾对之寄予厚望——那时自然是放纵了它的需求，甚至放纵了它那些不良习惯、低级趣味和任性行为的。而现在，当大家全都清楚地认识到了它的无能，甚至就连形而上学论者都搞起了自然科学，而一刻也不放松地紧盯着认识论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考虑理性的需求难道还有什么意义吗？难道不是正好相反吗？当代的主要任务难道不就是要学会绕过（不然就破坏）所有那些数不胜数的关卡吗？它们从远古以来就被强有力的精神领主们以种种借口设立，只是由于人类胆怯短视的天性中永恒的保守性，才使它至今仍是我们思想运动中无法克服的，甚至是“自然而然”的障碍。要有什么样的终结呢？要有什么样的结语呢？为什么要有世界观呢？……当然，我是在谈论哲学和哲学家，谈论那些力求在生活中尽可能多

地了解和体验的人。对于普通的日常生活实践来说，完整性依旧是不可变更的教条。没有屋顶的房子的确百无一用……然而，未完结性、无序、混沌、无法导致被理性预先设定的目标如生活本身一样充满矛盾的思维，难道不是比那些体系，即便是伟大的体系也罢——其创造者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认识现实，不如说是理解现实——更贴近我们的心灵吗？“如果我的理论与事实不符，那对事实就更糟糕”——黑格尔如是说。我觉得，在他之后的许多人，也蛮可以重复这句“骄傲”的话，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生前达到黑格尔那样的名望，只有借助于那样的名望，才使得由如此自信坦率建成的辉煌宫殿轰然倒塌。哲学家们当然对其体系有很高的评价：因为这些体系来之不易，往往需要他们花费整个一生。况且，对世界观的需求也很大。人的确很想“理解”世界，有时他的这一愿望如此之大，以致在他身上，愿望剥夺了他批判地审查所提交的任何论据的能力，以致就连极其贫弱的论据，他也会满怀喜悦地欢迎。如今谁都不会说：我相信，因为它荒谬（credo，quio absurdum），但这还不等于说我们已经从中世纪的迷信中彻底解放出来了；不等于说我们已经没有自己的信仰（credo）和自己的荒谬（absurdum），这些东西当然仅适合于具有理性的铁路和电的时代精神。然而，我们甚至也没必要以新事物的幻想来欺骗自己。如果发掘一下记忆，就可以知道，我们可以在远古时代的残余物中，找到现成公式来作为我们信仰的符号。无论你如何规范人类的理性，理性总归会以这样那样的借口，偷偷钻到一个“保护伞”下，以便在闲暇时能尽情地放纵自己那罪恶的倾向，其中主要是闲适或甜蜜的无所事事（dolce far niente），对此，现代方法论似乎做

了无情的抨击！在严格的科学研究占主导地位的领域，“信仰”靠近其射程是被严厉禁止的。人们采取了各式各样的防范措施，不让狡猾的诱惑者以某种方式偷偷地不仅在人的头脑中，而且也在人的“心灵”中，为自己找到栖息地。“信仰是非科学的”——如今连小孩子也知道这一点。从学龄时起人们就教导我们不要接近特殊的、永远败坏了自己名声的诸如星相术、炼丹术之类的学问。假如您了解了当代方法论学说，您就会完全心安理得地离开它们：显然，任何信仰也无法穿透由它们布置的稠密的、岗哨林立的保护网而抵达现代人的灵魂，哪怕信仰并不比一枚大头针更醒目。任何人也不会怀疑当代知识的有益性，即使是最多疑、最老练的人，也不会怀疑。当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同科学斗争时，他们竭尽所能想把论战转移到道德基础方面。科学是正确的，科学没错，对此没什么可说的。但它只为富人而不为穷人服务，它发展了人身上不良的欲望。就连尼采也不是总有足够的勇气面对现代科学，后者所占据的难以企及的立场曾使他一筹莫展。

然而，万幸的是，凡是人手创造的一切，仔细看都并不完善。科学进步数百年以来取得了辉煌的实际成果，在理论思维领域里却几乎没有任何建树，尽管我们也能列举出长长一大串响亮的名字，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科学之所以能够征服人的心灵，不是因为它能解决心灵的所有疑问，甚至也不像大多数有教养的人所以为的那样。科学证实要使这些疑问获得令人满意的解决是不可能的。科学之所以能吸引人，不是因为它无所不知，而是为了生活福利。长期受穷的人类曾经如此迫切地追求它，犹如一个饱受长期斋戒之苦的乞丐，扑向丢给他的一块面包。社会学被认为是实用

科学的桂冠，它许诺要创造公共生活的若干条件，以把悲伤、贫困以及痛苦，永远从地球上消灭。这难道还不够有诱惑力吗？难道为了这一诱人的前景不值得放弃人类历来怀有的虚幻的希望吗？于是乎，取代旧的“我相信，因为它荒谬”，出现了新的“我相信，为的是理解”(credo, ut intelligam)，需要的仅仅是理解周围世界，使人类幻想曾描绘过的最伟大的理想实现。高兴之余，谁都没有发现，这次以体现了小心谨慎和怀疑一切精神的科学本身为指导的贫乏的人类理性又一次陷入了窘境。信仰“理解”与过去曾经统治过人们的其他信仰相比，绝对不具有任何优点，此外还有人类从摇篮时期就习惯于对之屈膝膜拜的理念和语词。这里哪儿还有什么信仰、怀疑和追寻呢！凡是具有哲学修养的人都记得这样一个经院主义的信条：“我相信，为的是理解”。大家全都相信，它和我们无任何关系，相信我们已经远离了信仰决定着理性生活的性质和方向的童年状态。我们相信科学教养使我们永远不受离情悖理的诱惑、不愿意看着近来重又允许可怜的放逐者向自己靠拢。对我们的祖先来说同信仰打交道是很危险的。未经训练和没有文化的人往往不会用火，并且总是成为火的牺牲品。而我们却可以怡然自得地享受光和热，因为我们了解这一危险的自然元素的全部特性，而并不害怕它那破坏性的作用。诸如此类的言论削弱了人类的怀疑精神，并引导科学走向迄今为止前所未有的胜利。如今谁还愿意重复这样一个老问题：真理是什么？谁不知道，这个问题从科学观点看不具有任何意义，因为无论答案如何，也丝毫都不会影响科学探索的性质和进程。科学预先就知道它想要的是什么，因此，它把自己的追求以它称之为原理的形式加以表述。

二

近来，哲学界出现了一种极其重要、依我之见甚至意义重大的现象，那就是理论界永恒的论战，使得原理起源问题尖锐化了。在德国，有一大批哲学家兼学者试图探讨所谓因果律的标准化理论，而实质上这里并没有什么新东西，标准化理论不过是康德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但在这里重要的是，当代学者认为必须给予特别强调的康德学说中的那些方面，先验唯心主义这位奠基者本人却认为没必要将之推到首位。在康德那里，科学与伦理的关系，即便他们那些新学生不去研究，也是人人都清楚的。在他那里，尽管他也承认实践理性的首要地位，却从不认为自然现象规律直接受我们伦理要求的制约。在他那里，法则如君主一般，是高居外部世界现象和人类灵魂之上的。但全部关系也仅以此为限，只要自然与人全都听命于法则，这对康德来说就足够了。而当代思想家们，或是因为他们有崇高的要求，或是感到保持康德的立场不被触动已不可能，所以，他们走得更远。他们不承认理论理性是不受制约的法则——他们把它置于实践理性的开端和监督之下，并试图对康德因果范畴的独立性提供伦理根据。他们同康德一道证实，规律性不是外部世界现象所固有的，而是人类理性把它带到那里去的，但之所以带它去，不是因为不可知的命运，使它不由自主地扮演这么一个非常卑贱、模棱两可的行政警察角色，而是因为这一角色是最高的、被道德本身所证实并说明了的角色。既然道德已经出场，帽子就该滚蛋了，就不要再说什么了。

话到此处，读者大概也就明白，尼采反对道德的远征有什么意义，意义又有多么伟大了。那些以自己的方式为因果律创造了道德根据的德国哲学家们，大概连想都没想过有尼采的存在。而早在70年代就已脱离大学生活，而且一般说对当代哲学学说不大感兴趣的尼采，大概也没听说过德国哲学中有什么新的流派，更不可能想到自己与这门学科的官方代表做着同一件事。当然，他做这件事的方法是他自己的。与此同时，德国人积聚了所有力量以维持正在下坠的规律的威望，并甩出了最后一张也是最宝贵的一张王牌——道德(除此之外已无所指望)。而尼采却道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判断，即付款是用伪币支付的，而道德本身尚需证实，因此，道德不可能代科学负责。这一思想在尼采那里从未给予人们所希望看到的彻底清晰的表述，我甚至相信，他对此未必有清楚的认识。显然，他很可能凭借本能感觉到，在科学那永恒而又有力的同盟者——道德——未被推翻以前，是不可能与科学斗争的。如众所周知，本能并未欺骗他。如今，就连最谨慎小心的人们也坚信，支持科学认识基本前提和公理的只是道德。这样的观点从一方说来是否超前了呢？是否无法设想他们那千年之久的道德有一天会丧失魅力呢？很可能是这样，但话既已出口，未必能在什么时候被人忘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其他一些人曾试图重复反科学的道德，但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毫无结果。道德和科学是人称为法则或规范的同一个父亲所生的孪生姊妹，她们有时会相互敌对甚至仇恨，就像亲人之间常常会有的那样，但或早或晚血缘会起作用，她们必定会和解。德国人对此了解得很清楚。在他们那里，在学校、军队，在道德方面，在警察局，在哲学中，到处都贯穿着

同一个最高原则,那就是秩序高于一切。原则是有益的,这一点无可非议:只要想一想我们这些遵守纪律的邻人于最短时间内便在各种领域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就够了。就在不久以前,他们还跟在欧洲文化的后面,亦步亦趋,现在他们却——而且根据十足——想当盟主了。假使科学和道德为自己设定了功利主义的目标的话,那就必须承认,他们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可是众所周知,他们所达到的,远不止于此。他们渴望占有统治人类灵魂的至高无上的主权,于是,那个老问题在此又冒出来了,对此问题,尽管有各种认识论,人类还是从未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人们又在问了:真理是什么?科学无言以对。而道德则出于习惯,震耳欲聋地呼喊着已经失去意义的陈词滥调,但已很少有人相信它了。

三

道德是科学的,科学是道德的。显然,认识论看穿了某种极其本质的东西。批判哲学的理性——批判哲学把研究理性的能力当作主要前提——是某种一成不变的、永远与自身相等的东西,是十分任意和没有任何根据的。康德的全部信心仅仅建立在他想在科学这一一般名义之下把数学和自然科学统一在一起的愿望之上,但这种愿望自何而来呢?对于一个不偏不倚的、一个被迫不偏不倚的人来说——因为谁会自愿放弃自己的激情和愿望呢?——这里只是无可置疑地展示出一种十分重要的情况。每一个哲学家兼研究者迟早都会把在其背上积淀而成的纯理念的重负甩掉,歇一歇,为的是能从经验的泉眼中汲取一点儿活水;尽管开头他曾庄严

发誓不去触动经验主义。康德也需要歇一歇，生活中的康德最需要的是休息和终结——在休谟的怀疑主义迫使他进行了艰难的转折之后。然而要坦率承认自己也不乏人的弱点，并像任何一个精疲力尽的旅人那样说："我累了，想歇一会儿，哪怕迷了路，哪怕对达到目的抱着假想的信心，也想歇一会儿。"可不那么容易。自有哲学以来，请问有哪位伟大体系的奠基者肯允许自己如此坦诚呢？或是说：谁愿意拥有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声望而征服世界时，不解难解之结，而快刀斩之呢？一个人只有当他丧失了前进能力和力量时，才会断言，他已走到尽头，接下来既无路可走，亦无走路必要，该停下来建立世界观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一代新人都要想出一套与历代前人的真理完全不同，甚至与其无任何继承性联系的自己的真理的原因，这里隐藏着一个谜，尽管历史学家总是不遗余力地想要证明与之相反的观点。在一个朝气蓬勃、刚刚跨入生活的年轻人和一个疲惫不堪、已经开始给自己的一生做总结的老人之间，会有什么联系和相互理解呢？况且疲惫与疲惫也各有不同。有时候，梦会由于一个人超负荷以及长期不寐而降临，而与此相反，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一任性的神祇，会把它的礼品赠送给懒汉和无所事事的浪荡子。由此可见，还是不要侈谈什么休息的好处和终结的必要了吧。无论您引用多么严谨的证明，也无论您信心十足地采取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姿态，在某些场合之下，您的全部论据和整个宣讲激情还是会付诸东流。此人命中注定没有休息，也没有睡眠。对一个被持续不眠所苦和长期内心不安几乎已成第二天性的人，歌颂睡眠和安宁，侈谈睡眠和安宁的道德必要性，难道还有比这更无聊、更像是一种挖苦的吗？对他来说，任何

终结和结语，甚至被吹得天花乱坠的形而上的安慰，都是无聊可恶的废话。如果你问他："你往哪儿去？你希望什么？"他大概会用一个诗人的话来回答你："我也不知道上哪儿去，我也不知道等什么。"(Je vais sans savoir où, j'attends sans savoir quoi.)

您是否以为这人为了理解世界而想同康德及康德主义者一道把规范法则、秩序说成是创造的瑰宝，因而允许道德为其提供某种前提呢？可他根本就没去寻求什么"理解"。理解就是把未知变为已知，可要知道所有已知他都见过、体验过，也审问过了，而且他逃离已知时连头也不回。如果他能够有什么希望的话，希望仅在于这样一种假定，即未知与已知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甚至已知并不是那么已知——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因此，个别人以及整个民族以之自慰的所有前提和无数信仰，只不过是骗人的幻想，它们兴许也不失为美丽，但却不会长久，而且，也远离现实。在他的术语词典里，"理解"一词及与之并列的"终结"一词，根本就没有。难道必须理解世界，难道必须按照我们以前已经体验和认识到的样子来组织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吗？他只有一个愿望——前进。他要到哪儿去？他会在哪儿找到栖息之地呢？这些问题对他已失去了意义。他越来越深信，"安宁"、"栖息地"以及其他一些对他们具有不同意义的语词，远不具有其在哲学中所具有的那种价值。面对就在他们眼前所发生的事情，人们有什么权利断言，我们存在的最终目的是安宁和自我满足呢？又根据什么证明人类语言和我们已经找到相应词汇表达的人类经验，对于揭示生活的全部奥秘已经足够用了呢？……

所有这一切都会令人感到与所谈之事无关。人们会告诉你，

当产生哲学问题时，一切抒情插叙都不合时宜，应当把它们纳入诗歌领域。当问题涉及因果律时，连莎士比亚本人也得闭上嘴巴洗耳恭听知情者的讲述。假设哲学家拥有独立不倚的研究方法，假设哲学家纯粹是由理念而非神经和肌肉所构成——这诚然不假……多数科学界代表人物冷静沉着的精神业已成为熟语，以至于不仅在公众中，即使在行内人士中，也产生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在哲学家的判断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永远是枯燥而客观的理由。况且他的题目就外观而言也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任何"心灵"都不会对它感兴趣，哪怕你允诺赏赐给心灵以个人的不朽和天堂，包括其所具有的一切迷人之处……但，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是极大的错误。哲学家知道什么是疲劳，而疲劳是宁愿要无论什么样的终结，也不愿选择过分漫长的流浪的。哲学家比任何人都更害怕模糊和不确定性，为了一个明确的失误，他会给你整整一系列超验的、摇摆不定的真理。而如果根基摇摇晃晃、一点儿都不踏实，那会令他多么害怕呀！你们还记得当海涅在海上颠簸时，他在船上表述对亲爱的德意志的热情幻想吗？

日耳曼，即使你到处
都充满疯狂和不义，
我也将怀念你
哪怕是因为——你毕竟是一块坚实的土地。

(...Immerhin, mag Thorneit und Unrecht
Dich ganz bedecken, o Deutschland.

Ich sehne dennoch, nach dir:

Denn wenigstens bist du doch festes land.)mich

当康德读到休谟那些动摇了科学基本原则的议论时，他是否曾想到过这一点呢？哲学家也是人，因此，人所具有的一切，都与他息息相关。他喜欢被人踩得平展展的大路，在那里理论思维可以轻松自如地运行，那里除一条直线外，连一棵小树或一根小草也没有。哲学家在平坦宽阔的练兵场上感觉最佳。在此，在鼓点的伴奏下，可以排成庄严隆重的队列仪式勇敢地行进，既不用前瞻也无须后顾，只要留心不要弄错了步子，并尽可能多"踏着点儿"就可以了。哲学家只看重逻辑思维，这也就是一种方向，一经确定便只须无忧无虑地循此走下去的思维，因为如此行进，惯性力便不会被消耗在无穷的回顾、找路及与"自由意志"及其形影不离的伙伴——怀疑——作斗争上了。的确，哲学家更乐于谈论什么翱翔，而不是什么步法操练；他从不炫耀逻辑是其力量的主要来源，而且，只是由于健忘，他迄今还没有与惯性法则——而逻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仍将是其表现形式之一——当面对质。然而，一个早已为人所共知的事实是，所有人都有好说大话的弱点……

我在这里所列举的，远非一个有学问的人的全部习惯和趣味，但我认为，这已经足够了。显然，当他断言他没有"灵魂"和激情，说他整个已化身为抽象真理的追求本身时，说什么不能让莎士比亚参与因果律问题的讨论时，他是在贬低自己。哲学家跟普通凡人完全一样，也会害怕、高兴、喜欢、仇恨、疲劳、伸懒腰、打盹、睡觉，尽管他即便是在表示最普通，甚至是生理学方面的东西时，也习惯于使用一些外行人似乎感到格格不入、不知所云的语词和术

语。因此，哲学的基本前提和公理，绝对不能被当作是客观论断。沉着、冷静、平庸、淡漠，也是属于人的一些特征，它们既可以帮助人接近真理，也可能产生笨拙感和负重感，将人永远固定在一个他所习惯的地点，并预先决定他只能得出虽然牢固而受尊敬，但却短视而又错误的判断。一个生活的真正的研究者无权当定居者，无权只相信特定的真理探索法。他应该什么都愿意去尝试：要善于及时对逻辑产生怀疑，同时还要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那样，一旦必要，不惮采用诅咒这样的方式。他应该既善于挺起腰杆仰望星空，也应当在必要的时候，肯弯下腰来在地上寻找真理。假如一个人对你说："知识就是知识"(scire est per causas scire)，那么，你就可以断定，对于哲学来说，此人已不复存在了，而哲学对他来说亦复如是。我们早就该抛弃旧的偏见而公然声明："知就是不知。"(per causas scire est nescire)而在这里，莎士比亚兴许反倒很适用，他会告诉你有一些未知是无论如何无法、也不应被归入已知的，他会说哲学家们所谈论的秩序，只存在于有阶级的房间；说人脚下那坚实的土地迟早会消失；说在其消失之后人仍然会继续其无根基的生存，或是另有根基，但这根基却永远在脚下晃动不止；说到了那时，人便不再认为科学认识的公理是不需证明的真理，不再称其为真理而称其为谎言；说如果可以称道德的话，那也只能称其为——不玩弄词语游戏的话——人对世界及他人的一种道德的态度；说根据因果关系而称的知识，乃是最不完善的知识。他的口号是歌颂无根据……然而，"哲学家"们早已捂住了耳朵，什么都比没有根据强。日耳曼呐，你身上有如此多污秽、卑污、肮脏和丑陋——

你毕竟是一块坚实的土地。

Wenigstens bist du doch festes land.

列・舍斯托夫

第一章

世界和生活都太零碎。

Zu fragmentarisch ist Welt und Leben.

——亨·海涅

1

城市郊区的居民，往往享受不到市中心区居民惯于享受的生活便利。他们没有电气和煤气照明，甚至连煤油灯和大马路也没有——行人走路不得不碰运气，在黑暗中摸索着往前走。如果你想点个火儿，就得等雷鸣电闪，再不，你就得采用我们远古祖先曾用过的原始方法：击石取火。在火光亮起来的一瞬间里，陌生地方的轮廓从黑暗中映现了出来：你得使劲让稍纵即逝的一瞬间里你所看到的一切，贮存在你的记忆里，以证实你的印象是否无误。还有的时候你根本就无法很快找到火——你难道能以头撞墙让眼睛里冒火星儿吗？既然如此，我们怎么可以要求求知欲（我们认为我们身上的求知欲是足够强烈的）迫使总是在生活边缘徘徊的人，有明晰而又准确的判断呢？我们又怎么可以把他们的事情与市中心区居民的事情等量齐观了呢？

2

不知何故，人们总是以为自然现象的规律性是如此明显，理所当然，以致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即自然现象的根源，并不在现实生活的实在中，而是可以在我们理性的性质中找到。然而，实际上，自然现象的规律性，乃是我们在生活中所能观察到的一切中最为神秘的东西。秩序从何而来？为什么非得是秩序，而不是混沌和无序呢？况且，如果有关规律性的假说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实际好处的话，人们也就永远不会屈服于想要把其抬举到永恒的、不可言说的真理的宝座上的那样一种诱惑了。然而，正是由于有了规律性，才使得预见成为可能，认识为的是能有所预见(savoir pour prévoir)，而与此同时，也才可能有对自然的统治，而那些总是对成功顶礼膜拜的哲学家们，也便一个赛一个地在它面前张口结舌，他们所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们所拥有的最高级的封号——永恒真理——呈献给它。但对于自然来说，即使是这样它也嫌少：越吃越有胃口。(L'appétit vient en mangeant.)像《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里那位老太婆一样，因果律想要让那条金鱼供它使唤……对此，有人已经不耐烦了，但也不过是有个把人而已……

3

定居者言："一个人怎么可以在对明天毫无把握的情况下生存呢，怎么可以不在屋檐下生活呢！"可是，话刚说完，一件偶然的事

情，把他从屋里永远驱逐出去了，于是他只好在森林里过夜。他怎么也睡不着：他害怕凶恶的野兽、害怕自己的兄弟，也害怕那些流浪汉。可到后来，他毕竟还是把自己交付给了机遇，过起了流浪汉的生活，而且，甚至可能没有一夜睡不香的。

4

一个作家，尤其是缺乏经验的年轻作家，往往以为自己有责任给自己的读者就各种各样的问题提供最充分的答案。可是，由于诚挚往往会过分妨碍他，使他对有些事情视而不见，使他忽略那些最令人苦恼的疑虑，所以，他会不由自主阐述起所谓的“万物之初”一类的问题来；又由于他终究无法就这类题目说出什么道理来——要知道参与哲学家的论争，这可不是什么年轻人干的事儿——他便气贯如牛，声嘶力竭，吼得声嘶力竭起来。直到他嚷够了，累了，不出声了时为止；再不，如果他的话得到听众的喝彩的话，那么，连他自己也会惊讶：做一个预言家是何等轻而易举的一件事儿呀。于是乎，在一个才智平庸的人的心灵里，所能滋生出的一个愿望仅仅是：把自己对人群的影响力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而那些比较敏感较有天赋的人，则会鄙视那些不善于把饶舌者和预言家区别开来的人群，并且还会鄙视自己，因为那崇尚理念的、可耻而又愚蠢的小丑角色，也曾诱惑过自己，哪怕一生中就只有过那么一次。

5

读柏拉图写的苏格拉底临终前如何对话的故事，真使人感到压抑！他的有生之日、有生之时已然屈指可数了，可他还是一个劲儿地说呀说个没完……天快亮时，克力同走进来告诉他说，祭神的法舟不日内即将返抵雅典：苏格拉底一听此话就开始喋喋不休，反复论证……当然，对柏拉图的话，也许我们不该全信。人们都传说，对于柏拉图记述的自己的那些个对话，苏格拉底有过这么一句评语："关于我，这个年轻人说了多少谎话呀。"可要知道，有关此事的所有来源都一致证实，苏格拉底在被审判后的一个月中，就是在与自己的学生和朋友的不断对话中度过的呀。喏，这也就是被人所爱和拥有学生的好处！连平平静静地去死都不让……人们一般以为是最糟糕的死法，实际上乃是最好的——就一个人，身边没有任何别人，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在医院里——像人们常说的——如篱笆墙下一条狗那样。这样的话，至少在你生命的最后一刻，你不必作假、不必教导什么人，就只是沉默：以便为那行将到来的、可怕但或许是伟大的事件，做好准备。帕斯卡尔，据他妹妹所说，临死之前同样也曾喋喋不休、唠唠叨叨；而缪塞活像个孩子似的哭哭啼啼。也许，苏格拉底和帕斯卡尔之所以有那么多话要说，不过是因为他们都担心自己会号啕痛哭吧？真是恬不知耻！

6

一种念头或一连串偏差是无益和不必要的,可要是想推翻它们,有时就连思想体系也不足以充当充分的理由。一个念头既然已经冒头——你就开门容纳吧。因为你若关闭它的合法入口,它就会强行闯入,再不就会像克雷洛夫寓言里的那只苍蝇,偷偷地钻进来,念头才不管什么诚实和道德的法则不法则的呢。眼前就有个例子,那就是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当其产生之初曾经引起了普遍的愤怒。生活中的丑恶有何必要让我们去了解呢?的确,没必要,现实主义并不善于证实自己的公正。可是,只是因为它无论如何也不能往前走,所以,它也就不假思索地撒起谎来:它把自己与病理学相提并论,自称是有益的——进而夺得在文学中的统治地位。如今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现实主义毫无益处,甚至是有害的,十分有害,它与病理学无任何共同之处,而且,要想把它从它已经待惯了的地方赶跑,也不那么容易。多少岁月过去了,它也就有了统治的合理的根据(justus titulus)。

7

托尔斯泰伯爵宣扬无为……可是,看来他在这个问题上如此卖力毫无必要。在相当程度上,我们也正是过着“不做什么”的、游手好闲的生活,而且,也正是托尔斯泰伯爵所向往的那种游手好闲的生活,放纵地、自觉地鄙视任何劳动的、游手好闲的生活,乃是我

们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特征。当然啦，我在此所说的，是指托尔斯泰伯爵的话语所主要针对的，社会的上流阶级、生活优裕的阶级。我们“写书、绘画、谱写交响乐”，可这难道算劳动吗？这只不过是劳动的外观，是由于无所事事而引出的一种消遣。所以，当托尔斯泰伯爵把他论无为的说教忘到脑后，而要求我们每天至少要有八小时下地犁田时，他要比我们更正确一些。这一要求自有其意义。无所事事会毁了我们的。我们复归我们祖先亚当和夏娃曾生活过的原始的生活状态，没必要以汗洗面地操心每天的饮食，大家全都一心想着要从禁树上采摘果实。而这样一来，理所当然地，我们也就得承担相应的惩罚。神祇的法则是一成不变的。除求知欲以外，在天堂里一切都在允许之列，甚至包括劳动，尽管在那里，它并非必不可少，因为，老实说，劳动是为那些被从天堂里驱逐出来的人安排的。托尔斯泰伯爵对此是理解的：有关无为，在他也不过是片刻谈谈而已，而在此之后，他还是干活儿去了。因为协调一致的、经常性的、平稳有序的、富有节奏的劳动，无论其为生产性的还是如托尔斯泰伯爵那样，只不过是看上去像生产性的而已，乃是精神世界的一种保障。在这个问题上，德国人就是一个好例子，他们的每一天，不仅以祝福开始，而且也以祝福结束。而在既不需劳动也没有与劳动相关的一切的天堂里，由于无须在劳动之后从事休息和长时间的睡眠，所以，一切诱惑都是那么不可抗拒。生活在那里是很危险的……也许，无所事事的现代人已经猜到天堂生活的状态了？没有劳动的地方，也就不会有公正、平稳、安宁与自得。在那里，甚至就连智者也无法预见到什么；在那里，任何人都无须要知道知识乃为了预知；在那里，我们的科学将成为笑柄。实际上

在此刻就有许多人，当然是那些不事生产、无所事事的人，就在对它感到惊讶了。然而，也还是有许多人，其中主要是德国人，还在捍卫先验判断，其根据是，没有它们，现代科学、现象的有序嬗变和预见，就不可能有了……

8

要想摆脱当代思想的统治，不妨去读一读历史：异族人、异国和异代人的生活将教会我们理解。我们这里所公认是永恒的理念，实质上不过是我们的一种误解罢了。我们只需向前再进一步，那就是，让我们想象人类并未生活在大地之上，而那样一来，尘世间一切永恒的理念，当即便会失去魅力。

9

有关我们生存的终极问题，我们什么也不会知道，现在如此，将来也同样如此：这是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然而，由此所能得出的结论，压根不等于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把无论什么样的现代教条主义的学说，或其外观如此之可疑的实证主义，当作生活方式，生存方式(modus vivendi)。由此所能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一个人可以随意地、经常地更换自己的“世界观”，像更换靴子和手套一样，只有在与他人交往时才需保持信念的坚定性，要知道别人必须懂得，在什么场合及多大程度上，他们可以指望我们。正因为如此，这一点才“成为一个原则”，那就是，对秩序表面尊重，而在内心

里，却是十足的混沌。对啦，对于那些感到难以承受如此这般的两面性的人，可以在他们心中确定某种秩序。只是切莫为此而骄傲，而是要永远牢记，这里也表现了人性的弱点、局限性和所承受的重负。

10

毕达哥拉斯派早就认为太阳一动不动，而地球却一直是在旋转之中。这一真理过了多长时间，才得以证实呀！

11

无论这使伊壁鸠鲁多么恼怒，我们最终还是不得不对自己说：一切的一切，无论其为什么，都是可以从无论什么中生发出来的。这并不等于说，一块石头确确实实一度曾经变成过面包，或是从一大团浓雾之中，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出可见的世界来。可是，在我们头脑和经验中，我们绝对找不出任何东西，可以让我们有理由对自然本身的任性哪怕是稍稍加以限制。即使现实与我们如今所见到的稍有不同，在我们看来，它也因此而显得不那么自然。换句话说：也许，在人类有关现象的判断中，包含有必然或偶然的成分，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努力，迄今为止，我们也未能找到，而且，显而易见，永远也找不到可以把两者区分开来的方法。况且我们还不知道，二者之中，哪一个更本质、更重要。由此所得的结论是：哲学应当抛弃想要寻找永恒真理（veritates aeternae）的企图。哲学的任

务是要教会人如何在未知中生活——尤其是最害怕未知、在各种教条之后躲避未知的那些人。简言之:哲学的任务不是安慰人,而是使人窘困。

12

一个人当他发觉自己身上存在着某种无论用什么方法也无法摆脱的缺点时,他除了宣布这缺点乃是某种品质之外,别无他法。缺点越严重,改善它的需求也就越迫切。从可笑到伟大同样也仅有一步之遥,强者身上无法治愈的毛病总是会被改称为美德的。

13

实质上,形而上学与实证主义无太大差别。无论在前者还是后者那里,都有一些地平线是被封闭的,只不过是被涂抹上了别样的色彩。实证主义喜欢灰色调和普通的平均水位图;而形而上学则更喜欢明朗的、光华闪耀的色调、复杂的图案,并且总是喜欢把自己的画布,打上无限性的底色,尽管由于透视法,它在这一点上鲜少成功。然而,它的画布却足够坚固,以至于任何花招和妙计也无法使人能穿过画布进入“别一世界”。何况艺术的透视法本身就十分诱人,所以,在形而上学者那里,便总是能寻找到理由或是借口,以与实证主义者口角。

14

作家的任务是：一直向前走，并与读者分享自己新近的印象。因此，与通常见解相反，作家实质上根本就没义务去证明什么。可是，由于在他行走的路上，形形色色的警察局密探，他们像道德、逻辑、科学一类玩意儿一样，总是对他纠缠不休，因此，作家就必须把一定论据时刻准备好，以便能让自己摆脱那引人厌烦的警卫们。而且，对于论据的性质，也大可不必过分操心。要知道他没有任何必要做到“内心公正”。只要他所准备的推断，在那守卫道路的人看来是可信的，也就足够了。

15

普希金“内心和谐”之谜——对于普希金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坏得不可救药的。毋宁说比这更甚：对他来说，一切都是有用的。犯罪是好的，悔悟也不错。怀疑固好，有所信仰则更佳。无论是“脚上拴着铁镣”、溜冰、随茨冈人流浪、到教堂里祈祷，还是和朋友口角、与敌人讲和、陶醉于和谐、为构思而洒泪、回忆过去、展望未来，他都同样欢乐。普希金好哭鼻子，而谁要是会哭泣，谁也就不失其希望。“我渴望生活，为的是能思考和受苦”——普希金如是说，表面看，使全诗如此美妙的“受苦”一词，只是由于找不到更适合与“死去”押韵的词才放在这儿的。在此之后的、意在说明“思考和受苦”的含义的诗句，就是对此的证明。普希金本可像古代英

雄那样,说一句:“危险物之危险,只对别人有效,对我则不。”他的情绪之所以总是和谐之谜,端在于此。

16

我们必须把被踩得瓷瓷实实的现代思想界的田地重新掘松。因此,在一切方面,每迈出一步,遇有机会或没有任何机会、根据充足或没有任何根据,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对大家公认的判断大事嘲弄,并毅然说出悖论来。只要这样做了,那么,一切便会水落石出。

17

什么是世界观呢?众所周知,屠格涅夫曾是个现实主义者,从写作第一部作品起,他就力求尽量真实地表现生活。尽管我国未曾有过真正的现实主义理论家,但在普希金之后,一个俄国作家已经不大可能太远离生活。甚至就连那些压根就不懂得如何“用现实生活”创造什么的人,也不得不侈谈生活、只谈生活。作家为了要让其所描绘的图画给人的印象不至于太沉重,就竭力预先储备好世界观,而迄今为止,世界观在文学中的作用,恰如一根魔杖,凭着它,无论什么都可以任意变作任何东西。

在这一点上,屠格涅夫的多数作品,都极为有趣。而最有意思的,是《多余人日记》。首次把“多余人”这种说法引入俄国文学的,是屠格涅夫。从那以后,关于多余人人们说得很多、说得太多了,尽管直至今天,大家都能谈拢的地方还是那么少得可怜,与 550 年

前一模一样。多余人是有的，而且还很多，可是，究竟该拿他们怎么办好，却无人知道。所能做的就只有一件事：根据他们的世界观进行杜撰。1850 年，那时还不过是个年轻人的屠格涅夫，也正是如此这般地解决他所面临的难题的。在小说的结尾，屠格涅夫以手稿的一位不知其名的读者的名义，加写了一段幽默的附笔：

这部手稿读过了
它的内容并不好
彼得祖多杰申
姆姆姆姆
先生、阁下
彼得祖多杰申
我的阁下

一眼即可看出，屠格涅夫的观点是每部悲剧的后面，均应继之以喜剧，而世界观的本质也就在于此。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这一判断问题上，屠格涅夫并非孤零零的一个人，在他身后，有整个欧洲哲学，或确切地说，有整个欧洲文明。在俄国作家中，屠格涅夫是最有教养、最有文化的一个。他的一生几乎全部是在国外度过的，他吸收了西方教育所能为他提供的一切。他本人也深知这一点，尽管他本着自己特有的、稍稍有些过分谦虚的精神——有时，他的不加任何掩饰甚至使人激怒——从未直截了当地谈及这一点。他深信，只有知识，亦即欧洲科学，才能打开一个人看待生活的眼界，解释那些要求给予解释的一切。而他也就是以这样一种

标准来看托尔斯泰伯爵的:“这是缺乏真正自由的一个最可悲的例证。”几乎已近60岁的屠格涅夫,在自己的文学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的最近一部作品(《战争与和平》)向我们表明,真正自由的缺失,其根源在于缺乏实在的知识,而与此同时,后一部作品,由于它富于创造力和诗才,所以成为1840年以来出现于我国文学中的所有作品之首。不!没有具有教养、没有最广泛意义的——在对待自己本身、对待自己的偏执观念甚至对待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历史——自由,要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不可思议的;没有空气就无法呼吸。”何妨听一听屠格涅夫是怎么说的吧——你便会以为他的的确确在西方搞到了那一最大的秘密,因而使他有权在别人都陷于绝望、都张皇失措时却不失勇敢和镇定……在写完文学回忆录——上文我所引用过的那段有关托尔斯泰和教养的话,即出自此书——一年以后,屠格涅夫亲眼观看了处死一度曾名扬全国的杀人犯特罗普曼的场面。在一篇名为《特罗普曼的死刑》的短文中,屠格涅夫以无与伦比的笔法表现了他的印象。这篇文章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如果我说,这是屠格涅夫最出色的至少也是最有力的作品之一的话,我以为我并未言过其实。当然,托尔斯泰伯爵对这一死刑场面的描写,也具有同样力度,所以,作为一个读者,一旦真的了解了这一点,也许就不会过分为艺术家的表现力所蛊惑。然而,当屠格涅夫讲到,在决定性的时刻,即当刽子手如蜘蛛扑向苍蝇一般向特罗普曼扑上去,将他压倒在地时,屠格涅夫讲述到,彼时彼刻,特罗普曼“脚下的土地悄无声息地游移开了”时——由不得你不信他。鲜有人能对自己身边发生的恐怖事件做出反应。然而,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即当我们处

境的令人触目惊心的、野蛮的不协调性和屈辱性，蓦然以一种无以言喻的清晰性展现在我们眼前时，它能迫使我们从外在角度反顾我们自身。每逢那时，我们脚下的土地便会悄悄地飘移。但这不会持续过久。丧失根基的恐惧感会令人迅即清醒。只要人能重返亲爱的土地——哪怕失去一切也在所不惜！在这方面已届六秩高龄的屠格涅夫与写作《多余人日记》时的年轻时代一样，仍然是那么胆战心惊。他对特罗普曼被处死情形的描写，是以这样一段话结束的："谁人不知，死刑问题是现代人类难于解决的、迫切的、刻不容缓的问题之一呢？如果我的叙事哪怕能为主张取消死刑或至少是主张取消当众执行死刑的拥护者们提供几许论据，那我也就满足了。"大山又一次生出只小耗子！悲剧之后上演的是喜剧，世界观行使起自己的权力，土地重新又回到人的脚下。我要重申和强调的是：屠格涅夫并非此类诊断的唯一责任人。整个欧洲文明都在借他的嘴在发言。任何无法解决的问题原则上都遭到了欧洲文明的否决，它以其数千年的经验，研究出一套方法，借助于这些方法，人类学会如何从一切之中，甚至从自己亲人的鲜血里，汲取利益。无论什么样的恐怖行为甚至犯罪，都可以通过"利益"一词获得解释。而屠格涅夫，如众所周知，是一个温柔的、"人情味儿十足"的人，毫无疑问他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在青年时代甚至接受过黑格尔的洗礼。他从黑格尔那里懂得，教养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懂得一个有教养的人，如何必须具有完整的、完善的而且必定得是完善的"世界观"。

18

人们公认，夸耀自我是可耻的骄傲，而夸耀自己的党、自己的哲学和自己的世界观，则几乎是最崇高的义务。至少，就连那些优秀作家们，也热衷于颂扬自己的世界观甚至为其“提供根据”——然而，他们在前一件事上，远比在第二件事上所获得的成功多。无论其理念是否得以证实——理念自身乃是生活中所最必需的：理念在人悲伤的时刻是安慰者，而在困难时刻则是聪明的谋士。有了理念，即使是死也不那么可怕——理念会作为人世间唯一不会腐朽的财富，和人一起埋进坟墓。关于自己的理念，哲学家们全都是众口一词地这样说的——他们说得十分雄辩，丝毫也不比那些为自己的顾客、为小偷和骗子辩护的律师差。然而，关于哲学家，任何人连一次也未曾说过“受雇佣的良心”这句话，而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19

有些野蛮人满以为他们的酋长根本就不需饮食，而且，从来就不吃不喝。可实际上，酋长们不但吃喝，而且比普通人更喜欢吃喝，所以，他们甚至不愿意只为了体面的缘故而斋戒得时间过长，因此，他们常常中断拖得时间过久的宗教仪式，以便为自己那易朽的躯体加足燃料。然而，这件事却不能让任何人看见，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因此，每次酋长想吃东西时，总是要人们用一块紫色苫

布把他苫住以免让人看见。在我看来，那些形而上学论者便与这类野蛮人的酋长极其相似。他们想要让大家以为经验主义，亦即现实生活，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人们所需要的，仅仅是纯粹的理念罢了。而为了保持这一幻觉，他们便总是穿着由崇高的语词织就的朱罗衣向人们显现。公众清楚地知道，人家是在骗他们，可是一方面由于公众比较喜欢富丽堂皇的场面和鲜明耀眼的色彩；另一方面，又由于公众较少虚荣心，又不愿显示自己的洞察力，所以，公众极少显示他们对这幕喜剧的含义是了解的。与此相反，他们宁愿故意装傻，因为他们凭自己的本能知道，演员越是拼命想要演好自己的角色，越深信他们的表演，已然被人当作严肃的、真正的事业了。只有那些对这个世界假定性的全部伟大意义不甚了了、没有经验的少年和孩子，才会时不时地为此而愤怒、而害羞，并像安徒生那则有名童话里的孩子那样，以一句“可要知道国王并没有穿衣服呀”，突如其来地、不合时宜地打破众人普遍自愿给予认可的幻觉，而揭穿那些演员的伎俩。可要知道，即使那孩子不说，大家也都知道，那国王是光着身子的；也都知道，形而上学论者不但无法给任何东西以解释和说明，而且，迄今为止，也未曾臆想出一个没有任何矛盾的假说来。然而，关于这一点，是绝不说出声来的。我们必须相信：野蛮人的酋长是不吃东西的；哲学家们已经洞察了世界的秘密；理念要比经验主义的好处更值得珍重，等等，不一而足。但问题在于：我们可以让成年人相信一种预先假定的谎言，可对那些孩子们，又该怎么办呢？对待孩子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被黑格尔大力宣扬过的毕达哥拉斯式的教育体系。在孩子们不明白并非一切皆可说之前，必须让他们学会沉默，学会小声嘀

咕。在我们这里实际上也正是这么做的。在我们这里，学生一直都在沉默，长期处于沉默状态，不是毕达哥拉斯派要求的五年，而是十年以上，直到他们终于学会像老师那样说话为止。在此之后，才会给他们以自由，而这自由，他们已经不再向往了，而且，甚至也不会利用了。在他们身上，兴许或至少还能长出一些个翅膀来，可是，由于他们一辈子都是在模仿老师、在地上爬来爬去中度过的，所以，现如今你又何能指望他们会向往飞行呢？一个有文化的饱学之士，有可能哪怕是在瞬息之间脱离大地的想法本身，就能使他恐慌万状——那情形倒好像是他早就知道，这会引出什么结果似的。

20

最好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法，是从无可指摘的众所周知的判断开始证明。当听者的最后一点疑虑也被打消，当听者心中甚至滋生出一种信心，即您想要给予证实的，恰好也正是他所最珍视的理念时，那也正是开诚布公的最好时机，但是，开诚布公必定得是漫不经心的，要用平静的语调，要采用以前人们说老生常谈时的那种语调。至于逻辑关联则可以不管不论。一般说来对人作用最大的，是语调的连贯性，而非思想的连贯性。因此，只要你能够，那么不妨在不破坏语调的情况下，在一大堆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之后，推出一大套预先准备好的、大可怀疑的、不被认可的见解来，那你准会成功。读者不光不会把你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反而会被你的话所折磨、所纠缠，直到同意你的见解为止。

21

逻辑思维的习惯会杀灭幻想。人都深信通向真理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经由逻辑，一旦偏离这条道路，也就意味着走向荒诞。一切的一切，一旦抛开逻辑，便会导致迷误。而且，我们离存在的终极问题越近，这迷误也就越是不可救药。在此，逻辑的阿里阿德涅线团早已经全部都展开了，但那条线本身却将人牢牢捆缚住，不让他往前走。于是，人便开始原地踏步，而丝毫也未想到，他之所以堕入如此愚蠢的地步，正是由于他所采取的预防措施过分严厉的缘故。他太担心陷入迷误了！可那样一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待在家里不出门。你既然已经上了路，既然想当泰西和杀死牛身人面怪物，那就不要过分看重安全，还要注意任何时候都不要走出迷宫。当然，这样一来你要冒失去阿里阿德涅线团的危险——因此，只有当家庭欢乐已经使你厌烦的时候，你才应登程去往远方。这样一来，你就得故意扯断把你同家园捆扎在一起的那根线，以便在良心面前，你能拥有一个不回家的合法理由。哲学不应与逻辑有任何共同之处。哲学是一门艺术，它力求挣脱思辨逻辑的锁链，把人带到幻想和幻想性的无边大海之上，在那里，一切的一切，都同样既可能又不可能。毫无疑问，一个有成家之习惯的人，是很难成为一个好的哲学家的，至于说哲学的命运总是掌握在教授们手中这一情况，其原因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那些嫉妒成性的神祇们不愿意赋予凡人以全知全能。只要人们在寻找真理时总是定居一处，知识树之果是不会被人所摘取的。寻找真理这件事，只能由那

些无家可归的冒险家和天生的游牧民来承当，对他们来说，人情是故乡(ibi patria, ubi bene)。我认为，托尔斯泰伯爵如果不是因为有家庭和家庭习惯，活到如此高龄的他，准保会告诉我们许多有趣和重要的事情……而如果他不结婚的话，他也许会和尼采一样，终而至于发疯的。向右走，是成婚，向左走，是被杀死。哲学家从来不会选择中间道路，他不需要财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使用金钱。但是，无论他是向右走还是向左走，等待他的，都不是善。

22

把俄罗斯人剥了皮，你会发现一个鞑靼人。文化教养是一种继承性禀赋，几乎从未有人能一下子在自己身上培植起它来。在我们这里，文明是在我们还都是野蛮人的时候突然出现在俄罗斯的，它一出现就占据了驯兽师的位置，先是用诱惑物，而后来，当它感觉到自己的统治权之后，便也使用威胁。而我们很快就屈服于这种文明，并在最短时间内，大剂量地吞下了欧洲人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点一滴服用的、渐渐习以为常的那种毒药，有的甚至是剧毒，正因为如此，欧洲文化在俄罗斯的移植压根就不是一件无害的小事。俄罗斯人只消一呼吸欧洲的空气，他的头脑便开始发晕，他便会以一个野蛮人应有的、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解释和说明他所见到和听到的西方文化成就。人们在跟他谈论铁路、农用机械、中学、自治，而在他幻想中出现的却是奇迹：普遍幸福、无限自由、天堂、双翼等诸如此类的玩意儿。而且，他的幻想越是不寻常，他就越是乐于把它们都当作现实。可当西欧派赫尔岑不得不一连数十年生

活在国外时，他曾是何等失望啊！可要知道，尽管他有最敏锐的理性，他也丝毫未曾想到，欧洲与他的失望之间毫无任何关系。欧洲很久以前就早已把奇迹忘得一干二净了：她不会比理想走得更远；只是在我们俄国，人们才会至今仍把奇迹和理想混为一谈，似乎这两个相互之间无任何共性的概念，具有完全同一的意义。要知道一切恰好相反：正是由于在欧洲人们已经不再相信奇迹了，才使他们懂得，人类的全部任务就是安顿好他们在大地上的生活，于是，才开始发明理想和理念。俄罗斯人刚从熊穴里爬出来，就前往欧洲寻找活水与死水、飞毯、日行千里的魔靴一类奇迹了，天真幼稚的他们以为，铁路和电气，这不过是个开端，它清楚表明，老保姆从未在童话里说谎……而这一切刚好是在欧洲已经永远抛弃了占星术和炼金术，从而走上通向化学和天文学的实证探索之路时发生的。

23

任何形而上学都喜欢的假设是：一种概念的辩证发展可以导致一个完整体系的建构。而实际上仅就这个结论而言，往往就是假的——遑论其他。可是，由于在抽象概念领域里，把真与假区分开来极为困难，所以，形而上学体系往往具有非常使人信服的外观。它们的主要缺陷，只是偶尔才会被揭示：当一个人对思维辩证法游戏的兴趣减低时，他会和屠格涅夫一样，在生命的暮年，突如其来地相信所有哲学都是不必要的。传说有一位数学家在听完一首交响乐后问道："可这究竟证明了什么？"当然，音乐什么也无法

证实，仅仅证明这位数学家不喜欢音乐。对于那些对辩证法不感兴趣的人来说，形而上学同样也什么都无法证实。因此，那些对形而上学的胜利抱有兴趣的人，应当致力于在社会中支持一种信念，即对辩证法的兴趣，会给一个人增添光彩，证明他的灵魂是高尚的。

24

人都习惯于拥有信念，这是一个事实。如果没有食客，我们大家全都无法过活，尽管在内心深处，我们对他们是十分鄙视的。

25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曾竭力想在永远变动不居的表象下，找到那常驻不变的本质。这一追求在柏拉图的"理念"中得到了体现。可见的、永远也不等同于自身的、采纳数百万种各类外形的现实生活本身，还不是真正的现实。现实的东西应当是常在的。因此，事物的理念是现实的，而事物本身则是虚假的。于是乎，柏拉图世界观的根源，也就成为人类思维的基本缺陷——而这却是一个被认为是最高优点的缺陷。哲学家很难把握骚动不安、恣意任性的生活。因此，他就断言，这不是生活，而是幻觉。辩证法只能支配一般概念，而一般概念却被提升为理想。从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时代开始，获得巨大成功的恰好就正是那样一些哲学家，他们教会人们如何只注重那些不变的、与可变相比永远都只与自身等同

的、常在不变的东西。那些过着无意识生活的普通人，亦即那些从不对自己心灵的收支状况进行总结的普通人，总是把哲学视作自愿为自己工作的会计师。早在雅典时代，那些青少年们便曾怀着爱心和兴趣关注着，苏格拉底是如何巧妙利用自己的辩证法，设法探明隐藏在人类行为后面的“终极根据”。如众所周知，在会计学里，哪怕是一个戈比，也不应消失得无影无踪，而苏格拉底也就没有辜负人们对他的期望。在他那里，人身上资产与负债的平衡达到了十分理想的状态。下述奇特情形，即，就连如阿尔西比德那样颠三倒四、七上八下的个性，也会一门心思追随苏格拉底，个中秘密，也许就在于此。阿尔西比德早就对自己的状态心中无数了，因此，他不得不不时地求教于苏格拉底，而苏格拉底则以其话语和推理，向他那位年轻朋友混乱的内心注入了秩序与和谐：阿尔西比德在苏格拉底那里得到了休息。当然啦，阿尔西比德的休息，为的是其后能再过放荡不羁的生活：对于一个身心疲惫的人，休息该会是多么甜蜜呀！然而，如果我们由此而得出结论，说休息对所有人来说永远都是必要的和主要的话，那么，还有什么能比这个结论更为荒谬吗？而苏格拉底也恰好正是如此对待自己的理念的。他想要让人永远都只休息，并把休息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而由于我们这里有一个托尔斯泰伯爵，所以，评论苏格拉底对我们来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儿。也许，关于托尔斯泰，相面术士佐比尔所说的，也会与他关于苏格拉底所说的一样，即在他身上，潜藏着许多不良品性。佐比尔早已存在了，而托尔斯泰自己讲述了自己，说他是一个怎样的坏人，说他如何不得不与自己斗争。就其天性而言，托尔斯泰并不是一个十分大胆的人；只是在经过了长期的意志训练以

后，他才使自己学会勇敢。他在年轻时代曾是多么害怕死亡呀！而他又是如何善于掩盖自己的恐惧呀！而到后来，当他成人以后，当他写作其《忏悔录》时，对死亡的恐惧就曾是他灵感的来源。他克服了自己身上的这种恐惧感和所有其余的恐惧感，他想，由于自己身上的恐惧感很难被战胜，所以，学会不怕危险比恐惧和害怕要好得多。可是，谁知道呢？也许，可怜兮兮、备受诋毁的"胆怯"和地下室式的胆怯，根本就算不上什么罪过。也许，它甚至可能是一种美德了呢！请你们回想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笔下的人物，回想一下哈姆雷特。如果地下室人无所畏惧，如果哈姆雷特就其天性乃是一个斗士的话，那么，我们至今也不会有什么悲剧的诗和什么哲学了。如众所周知，死亡恐惧感永远都是哲学家的鼓舞者——如有必要，我可以从古代和近代作家那里，列举无论多少引文以资证明。也许，使苏格拉底成为智者的那一诗魔，只不过是恐惧的化身罢了。抑或不过是他那警觉的梦境罢了！在白日里使他骚乱不安、备受折磨的一切，就是在夜里也不让他安宁。已经是在被宣判以后，苏格拉底才梦见，自己原来应当从事艺术；原本不该让神祇与自己作对的，于是，已是 70 高龄的他，开始写诗了。同样，托尔斯泰也是在 50 岁上才开始行善的，而在那以前，他对那些连想都不愿去想。而如果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里，用神话方式表述是可以允许的话，兴许就连托尔斯泰也会向我们讲述他的魔鬼和梦境的吧。但托尔斯泰说的是科学的语言，并和道德清了账，可和财富及魔鬼，则尚未结账。许许多多当代的阿尔西比德们，在一周的六天当中沐浴在混浊的生活之浪里，可一到礼拜日，便会跳进未曾被污染的托尔斯泰理念的净水里洗浴。会计都对这一小小不

言的成功十分满意，他们认为，既然这些理念能每周一次吸引公众普遍关注自身，这也就意味着，它们是生活的本质，除它们之外，人别无所需。而依据同样的理由，一个澡堂主人也蛮可以根据那么多人每逢周六便汇集到他这里来这一点，得出结论，即在一周当中不必要从事任何活动，以免出汗，这能使你永远保持干净清爽——就和刚出澡堂一样。

26

在一位法国老作家、帕斯卡尔同时代人的笔下，我读到极其出色的一段话：人无常性。“但无论一个人因而摒弃其意图的那一无常性是多么卑微渺小，它在某种意义上乃是最大的一种美德，因为它以此而能发现一个人身上还隐藏着某种伟大的残余物，正是这种东西，能迫使一个人弃绝那些不值得爱戴和尊重的事物。”(L'homme est si misérable que l'inconstance avec laquelle il abandonne ses desseins, est, en quelque sorte, sa plus grande vertu; parce qu'il temoigne par là qu'il y a encore en lui quelque reste de grandeur qui le porte à se dégoûter de choses qui ne méritent pas son amour et son estime.)甚至对于提出这样一种推断的可能性来说，当代思想界，也离得是多么的遥远呀！居然想要它去承认无常性是人类的最高美德！可要知道，要想在此尘世间达到某个目的，就必须善于把整个自我、自己的整个一生，统统奉献给某个目标。要想在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上达到登峰造极、表演大师和一代宗师的地步，就必须以一种天使般的或是蠢驴般的耐

心，数十次、数百次甚至上千次尝试表达自己思想情绪的各种手段，并且丝毫不吝啬自己所付出的劳动、时间和健康。一切的一切，均应放在次要位置上；而达到艺术的境界，这，才是最重要的。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悬崖》中，讲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说的是一位大提琴家，为了在晚上即将举行的演出中能更好地演奏，整整折腾了一个白天，如鱼撞冰。[①] 而这种事儿可是太寻常了。令人憎恶的、枯燥的、使人神经疲惫的劳动，是一个天才成长的条件。正是为此，实在说，人们中才鲜有达到目的者。是天才那就得承认，驯化自己身上的驴性，这个条件是如此令人感到屈辱，以至于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屈就于它的。多数人宁愿在庸常和天才的两极对立中取其中，是即所谓才华。并非每个人都愿意以其整个生命为代价来换取艺术。有过多少天才在其事业临近顶峰的关头，对他们当初的选择表示后悔了呀！“最好是能不惊动这个世界，而在它之中安安静静地活着”——易卜生在其所写的最后一个剧本中，如是所云。天才是一个可怜巴巴、目无所见的躁狂者，人们往往有鉴于他们身上的乖戾反常所能给人们带来的利益而对之加以原谅。可尽管如此，我们大家还是对执着精神和天才——当代社会对之依然保有信仰的唯一的神——顶礼膜拜，而对无常性的赞誉之词，未必能在我们当代人中的某一个人那里，找到同情。更有可能的是，人们甚至根本就不会认真对待它。

---

① 如鱼撞冰，乃俄国俗语，意为“拼命挣扎”，比喻苦心孤诣地想要做成某事。——译者注

27

我们经常以十分决绝的方式说出一些在我们看来也十分可疑的判断,甚至坚决认为它们是无可怀疑的。我们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想看一看,这种表述在人们身上,究竟能引起多大程度的反应,而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才有可能,那就是:不是把一种判断作为任何人都不会认真对待的一种推测,而是把它作为一种不可言说和普遍必然的真理,来给予揭示。一种推测,其对我们所具有的意义越大,我们便越是要小心翼翼地向他人掩盖其所包含的问题。

28

文学所探讨的问题,永远都是我们生活中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所以,文学家们也因此便以为自己是最重要的人物了。依据同样的理由,总是围着金钱跑来跑去的一位银行家的仆人,也便自以为是百万富翁了。难以索解和无从解决的问题,其重要性本应辱没作家在我们心目中的声望的,可是,那些作家是如此善于讲述自己以及自己那崇高的使命,以至于到后来他们不但说服了大家,最主要的,是连他们自己也对此深信不疑了。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心灵的局限性所起的作用,远远不是最不重要的。古罗马占卜官头脑要比当代文学家们更缜密、更灵活一些:为了去骗别人,他们用不着先来骗自己。在自己人的圈子里,占卜官们并不忌

惮说出自己的机密，相反，他们还相互以之取乐，因为他们完全相信，当着外人的面，一旦必要的话，他们是不难证明自己的，而且依据具体场合做出相应的庄重的神情，在他们来说，也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可如今的作家，无论他想对公众讲述一件怎样匪夷所思的事儿，他都得先把自己给说服了。不然他就不会说话（撒谎）了。

29

“作家堆字儿，读者认字儿”，这种状况，令谢德林十分恼火。而他所愿意要的，与此完全不同：作家的话儿刚一出口，读者便激动得要命。可是，读者远非人们所以为的那么简单：他宁愿自己水波不兴，而要求作家自己激动得要命。正因为此，一般说来，只有那些以“心血”写作的作家，才能在公众那里获得成功。约定的竞技，即使再华丽，也从未能吸引广大公众，至于艺术行家们，那就更不用说了。人们之所以跑着去看斗士角逐，是因为那里有真正的肉搏、火热的血腥气；是因为那里有真正的、而非想象出来的牺牲品。

而许多作家，和真的斗士一样，为了取悦恺撒——人群——不惜放自己的血：你好，恺撒，赴死的人们在欢迎你（Salve，Caesar，morituri te salutant）！

30

安・巴・契诃夫之所以说真话，并不是出于对“真理”的挚爱

和尊重，也不是因为——如康德所想的那样——听从义务的吩咐：即使死亡加身，也从不撒谎。

在他身上，也没有如此经常地把一些年轻火热的心灵推向疯狂和无畏之境的那种动机使他挺直腰杆、昂起头颅。相反，契诃夫总是伛腰驼背，低眉顺眼，从来不仰望天空，因为对他来说，天上没有任何标志。如果说契诃夫仍然还是讲了真话的话，那不过是因为，彻头彻尾的谎言已不再能使他醉倒，尽管他所服用的谎言，远非唯心主义所提供的小剂量，而是最大的剂量——能容十分之一维德罗[①]的桶。

契诃夫兴许感到了谎言的苦味儿，但尽管如此，谎言仍无法使他头脑发昏，像席勒、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是苏格拉底那样。众所周知，苏格拉底的酒量要多大有多大，可是，最平常的一两句谎言，也能使他酩酊大醉。

31

高尚使然(Noblesse oblige)，康德将之差不多作为道德概念的唯一术语而提出来的义务、强制和职责要素，到最后，只不过成了一种标志，它表明：他在职责向之发出祈求的自己本身和他人身上（康德本是个十分谦虚的人，即使是在内心深处，他也不曾在自己和他人之间做任何区分），所能看到的，只不过是一种道德，是能产生使人高尚、使人应当如何有效力的物质。高尚使然这一公式，

---

① 维德罗，俄国液量名，等于2.3升。——译者注

不是为了那些善于把自己的责任当作一种主要特权的世袭贵族制定的，而是为那些受过教育的、一日京兆的暴发户和觊觎夺取显赫头衔的人制定的。后者已经惯于撒谎，惯于胆小如鼠，惯于骗人，惯于一毛不拔；“公而忘私”地说真话，勇敢地迎着困难往前冲，赈散家资的必要性，令他们胆寒。而他们，为了不致忘却，每日每时都在对自己和自己那些血管里还流淌着其撒谎成性、奴颜婢膝的父辈的血液的子孙说：你不该说谎，不该胆怯，你应该宽宏大量、慷慨大方。而他们做所有这一切肯定是无私的，要做得天衣无缝，不叫任何人知道，这是愚蠢的、费解的和荒谬的，可是——高尚使然。

32

人对人是狼（Homo homini lupus）——这是永恒道德的一个最不可动摇的前提。我们怀疑我们亲人中的每个人，都是危险的敌人，因此我们十分惧怕他。“这人太毛躁，如果我们不用法律约束他，他会害死我们大家”——当有人脱离传统轨道时，这样的念头总是会不期而然地浮现在我们脑际。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我们是那么贫穷、那么软弱，我们是那么容易被毁灭、被戕害！我们又怎么能不害怕呢？然而，在那些危险而又具有威胁性的行为之后，往往隐藏着某种十分重要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我们理应关切而又同情地给予考察。可这真是草木皆兵——我们在建设道德，却终生躲在道德身后，像藏在堡垒墙内一样躲避着敌人，只有诗人才敢于歌颂危险人物——唐·璜、浮士德、唐豪塞。可是，没人愿与诗人计较。常识之看重商品推销员或

副教授，远甚于拜伦、歌德和莫里哀。

33

生活中呈现给一个人的可能性，比较而言十分有限。人不能见识一切，不能理解一切，不能爬得离地面太高，也不能潜入地心深处。从前总是隐蔽着的，将永远隐蔽——我们无法测知，或许也无法知道，我们身上永远也长不出一对翅膀来。现象的规律性一成不变，它为我们的追求和向往设定了边界，将我们逼进一条狭窄的、日常生活的老生常谈之路，也不让我们在其上纵横驰骋。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看着脚下，每迈一步都得停一停，因为在生活中只要稍不留意，我们就会遭遇到死亡的威胁。可要知道，可以设想还有别样的生活。在那种生活里，“死亡”一词根本就不存在；在那里，对行为所负的责任，即便不是被彻底取消，也不会像我们这里那样，具有致命和偶然的性质；从另一个角度说，在那蒙昧的生活里，“规律性”是不存在的，所以，那里有的只是无以计数的可能性。在那里，恐惧感——这是一种使人万分耻辱的感情——消失了。所以，在那里，就连美德也跟我们这里完全不同。面对危险，勇敢无畏和慷慨大方以及挥金如土，即在我们这里也被认为是美德，可我们的这种看法没有任何根据。当苏格拉底证明说，并非所有勇敢都是勇敢，而只有预先估测到了危险性和胜利的几率的勇敢，才是真正的勇敢，他是对的。与此相同，那些谴责挥金如土、事事节俭、好精打细算的人，同样也是对的。无所畏惧和挥金如土，于凡人并不相宜。对凡人来说，有鉴于他的软弱和贫穷，总是觳觫战

栗，核算好自己的每一文钱，才是体面行为。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人们中间，以上这两种有德之士，是极罕见的，而一旦见到，便会引起民众对有这种德行的人的近乎迷信的崇拜之情。“此人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在乎：说实话，他不是人，而是半神，甚至，也许还是个神呢。”苏格拉底不信神，所以，他想用核算法来为美德辩护。康德同样也不信神，因此才会从“规律”中演绎出他所谓的道德来。可是，假如上帝存在，假如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子民的话，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在乎。

这样一来，一个人如果疯狂地耗费自己或他人的生命和福祉以至于自己的才华和天赋的话，那么就比那些好精打细算、徒劳地在人世间寻找人类秩序的哲学家们，要更加正确。

34

有道德的人，乃是报复欲最强的人，他们把自己的道德，当作最称手、最精致的报复武器来使用。光是鄙视或谴责自己的邻人已经不能令他们满足了，他们想要让他们的谴责成为普遍必然的谴责，也就是说，他们想让所有人都能跟他们一起扑向被他们谴责的人，以便让被谴责者的良心，也能站在他们一边。只有这样，他们也才能彻底满足而心定神安起来。除道德以外，世上任何东西也无法得出如此辉煌的战果。

35

恶的劣根性。异教徒们常常会因为微不足道地违反了占据统治地位的信仰的缘故,而受到严酷迫害。他们在细枝末节上顽固不化,最令人恼火。“为什么他们就连如此空洞的让步也不肯呢?他们是不可能有什么正儿八经的理由的。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故意气我们,让我们不快。”于是,仇恨一步步渐强(crescendo),于是,便有了火刑和拷打,有了用以对付恶的劣根性的手段……

36

记不清我是在哪本书里,是在屠格涅夫还是在托尔斯泰的书里,读到过这么一句话,意为上过法庭的人,都会有一副异常高尚的面部表情。尽管逻辑学建议我们,在得出相反结论时须得十分小心从事,可是,不管怎样,这一次我要放任自己冒一次险,并做这么一个结论,那就是:面部表情高尚表明此人上过法庭,当然,使他上法庭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犯了政治罪,而是因为他犯了盗窃或行贿罪。

37

最要紧、最意味深长的思想和启示,是赤裸裸地、不带任何语词包装地来到世上的:要想为它们找到相应的语词,是一件非常难

以做到的事，这完全是一种艺术。与此相反，倒是愚昧和下流，一出现就盛装异彩，尽管身上披挂的都是些陈旧的破布条——所以，对这些玩意儿，你可以毫不费力地、直截了当地把它们端给公众。

38

近来，俄国作家们不知何故都变得不耐烦了。大家全都争先恐后动身去寻找那“最后一句话”了。他们似乎觉得，那最后一句话十有八九就要被找到了——问题仅仅在于，谁能先逮住它……

39

苏格拉底在哲学地平线上一出现，就受到所有历史学家的欢迎，把它当作一个伟大的事件。风俗开始动摇，祖邦（雅典）受到毁灭的威胁。苏格拉底的使命即在于给被极端利己主义和诡辩者的相对主义弄到绝望动荡地步的道德判断，画上一个句号。而这位伟大的智者，如众所周知，尽其所能地做到了。他放弃了自己的日常工作和家庭，他没有考虑明天，而是诲人不倦地开导着、教育着人们——普通人和显贵、聪明人和蠢货、学者和目不识丁者。可尽管如此，他还是未能拯救自己的祖邦。雅典在伯里克利时代，一度曾在没有苏格拉底的智慧同时也不取决于他的智慧的情况下，达到繁荣鼎盛状态。在伯里克利以后，尽管苏格拉底学说有了如柏拉图这样天才的继承者，雅典的作用和意义仍是在下降，而亚里士多德也已成为马其顿腓力二世之子的老师。这也就是说，苏格拉

底的智慧并没能拯救祖邦，而由于拯救其祖邦乃是其学说最重大的使命，因此，苏格拉底的智慧也就不配享有传统对它的崇拜。我们必须或是为它寻找到某种别的理由——而这是极其正确的——或是彻底丢弃形而上学者最喜欢的在其社会意义方面寻找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的方法。这种方法包含着极大的冒险性质。一般说来智慧有其自身的发展道路，而社会也有其自身的运行轨迹。这任务把二者人为地结合起来——那些演说家们就是这样教导公众和哲学家的——他们认为只有这个任务才值得人们去关注，而这个任务，绝对是囊括一切的：无论是社会利益还是道德抑或是形而上学的智慧……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呢？假如有一个新方案是有益的，就足够了！哪里还需要获得道德和形而上学的恩准呢？与此相似，既然道德法则应该是独立自主的，而理念应当在人类的经验需求之上，那也就是说，不能把它们与社会观念甚至国家可能面临的毁灭对立起来。即使世界毁灭，哲学也将存在(Pereat mundus，fiat philosophia)。即使雅典是因为有了苏格拉底的智慧才毁灭的，也根本无法成其为反对智慧的理由。对于自主的思想家，本应这样来评价。但是，实际上(de facto)，思想家并不十分乐意与祖邦争吵。

40

当一位作家需要阐述自己的某种最缺乏根据而偏偏不知何故又最为他所珍爱的，同时又想要使之获得普遍承认的思想时，通常他会暂时打断自己的叙述，好像是为了喘口气似的，来一小段，有

时是一大段插笔，证明各种观点而且往往是与其本质毫无关联的观点的无根据性。作家以胜利者的姿态消灭掉一个或几个愚蠢的想法，以此而给自己戴上了一副智者和根据充足者的面具后，便会重新回到自己所面临的任务上来，而与此同时，他心中指望人们将会以极大的信任，像对待其根据业已得到证实的人那样来对待他。而他有这种指望是完全正确的。对于如此灵活的辩证论者，读者是不敢反驳的，而宁愿赞同他，因为，在这样的场合之下，与其争论是非常危险的。任何人甚至包括那些最伟大的智者，尤其是哲学领域里的智者，是断然不会忽视这种手法的。正因为如此，那些唯心主义者在捍卫其理论之前，首先要做的，是攻击唯物主义。而唯物主义者呢，一度也曾如法炮制，而且，如众所周知，还曾取得过巨大成功。

41

众所周知，连贯性只对学生是必要的，而对老师则不然。伟大理念的创造者对待自己的创造物是极其淡漠的，很少关心它们在世上的命运问题。同一位哲学家生出的孩子，相互之间往往是如此不同，以致根本不可能在其之间寻找到某种最隐秘的遗传性相似的容貌特征，在力难胜任的、寻找不存在者的任务的重担下疲惫不堪的、诚实肯干的学生们，不止一次由于自己所面临的任务而陷于绝望。而那些比较聪明的人，解决起这一难题来却十分简单。他们既然已经猜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们永久抛弃了想要调和业已揭露的矛盾这种想法。但他们坚持研究哲学家的必要

性，而这种研究又必须是详尽无遗的、历史的甚至是语言学的。这样一来，哲学史就被创造出来了，而到今天，它已经完全取代了哲学。可要知道，实际上，哲学史是可以成为一门科学的。因为，通过历史研究的途径，的确往往得以极其精确判明，某一位哲学家当初所想的究竟是什么；他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各种术语和概念的。而由于曾经有过的哲学家有很多，所以，研究和解释他们，也就显得十分艰难，而这一值得尊重的事业，也就完全值得人们把它称为一门科学。一个人如果他是康德主要论著的好的译者或好的注释者，就可以给他授以哲学博士学位，亦即承认其在最重要的世界性难题研究上，已经达到足够深度。还有什么必要再去构想什么新的体系甚或去写作新体系呢？

42

创造的喜悦！这是人所能杜撰出来的一个空洞的字眼儿，而这种人就其个人经验而论，其实从未有过这样的机会，让他得以通过思辨途径得出自己的判断，从而判定究竟什么是创造：假如创造能给我们带来如此大快感的话，那么，创造者本人的体验又该如何呢？然而实际上，创造者通常所能体验到的，就只有沮丧罢了。任何创造都是虚无的创造。我们所面对的材料，即便是在最好场合之下，也都是丑陋的、无意义的，多数情况下既执顽又坚硬，很难予以加工。况且，我们也无从知道如何来加工它。每一次，当头脑里有了一种新想法时；每一次，当一种新想法在刚一出现的一瞬间里，显得光彩熠熠十分迷人时，即刻就得把它像丢弃一块无用的废

料一般扔掉。创造是不间断地从失败走向失败的过程。创造者的一般状态，是不确定的、未知的，是对明天失去自信的精神的一种炼狱。人类所担负的任务越是重大、庞大、独特，他的自我感觉便会越是痛苦。正因为如此，多数人，其中包括许多才华卓著的人，最终(à la longue)无法忍受创造活动的痛苦。创造者刚刚获得一种技巧，便即重复起自我来，因为他知道公众并不太苛求，并且非常乐于忍受其宠儿的单调重复，甚至会把它视为一种优点。任何艺术鉴赏家，一旦他从新作品中认出一位艺术家的手法，便会满意了。很少有人能知道，得到一种手法也就标志着一种终结业已开始。而艺术家们却对此知道得很清楚，他们会很乐于抛弃自己那在他们眼中业已成为老生常谈的手法。然而，这一切要求创造者最大限度地积聚力量，体验新的痛苦、怀疑和未知的折磨——谁但凡体验过一次"创造的喜悦"，下一次便再不会受它的诱惑了。一个人宁愿本着业已创造出来的模型来"工作"，只不过是想以此使自己保持心绪宁怡，并对工作结果保持自信——更何况，除他以外，任何人都不会知道，他已然不再是一个创造者了。世上的谜是多么多呀，而且，把谜底对放肆而又大胆的目光遮掩起来，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一件事儿呀！

43

作家使自己兴奋起来，以便达到迷狂状态：要不然的话，他也就不握笔了。然而，并不是任何人都善于把迷狂与其他几种比较而言不那么激烈的精神亢奋状态区别开来的。而由于做一个作家

就得总是不断地写，所以，作家通常并没有耐心长久等待，而是在灵兴勃发的最初表征刚一出现，便开始宣泄。正因为如此，人们常常会以迷狂的名义，将一些廉价的、无任何动人之处的精神情绪端给我们。人们尤其易于把迷狂，同业已十分普及的、我们的语言为其发明了一定的、准确的形容词的春天的欢乐，混为一谈。最后，“孩子们像牛犊似的跳跃狂喜”，比真正的灵感和深层次的迷狂更易于为公众所乐于接受。对他们来说，越是易于理解，就越是亲切。

44

中学生的逻辑前提是：根据充足的怀疑定义，是在自己否定自己，因为否定认识的可能性，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肯定。然而，第一，怀疑主义并非必定得是根据充足的，因为它没有任何想要取悦于将充足理由归结为律法的教条主义的愿望。第二，请问哪里有一种哲学，如果把它推导到极致，它也不会自己否定自己的？因此，为什么我们对怀疑主义的要求，要比对其他理论的多呢？何况，怀疑主义经常声称，它无法提供其他理论总是觊觎的那些结果呢。

45

业已作为当代逻辑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进入当代逻辑学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如众所周知，是作为与古希腊人十分喜爱的永恒理论辩难的一种结果而产生的。的确，为了要进行争论，就必

须有共同的基点，换句话说，就是要先约定好前提。然而，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辩证法论争与任何其他论战一样，已经不再能吸引人了。这是不是说，我们已把逻辑学放到次要位置上去了呢？

46

在果戈理的《肖像》里，一位艺术家只要一想到自己为了“生活”而牺牲了艺术，便陷入了绝望。而在易卜生的剧本《当死人苏醒时》中，同样也有个名扬世界的艺术家在后悔自己为了艺术而牺牲了生活。现在，你不妨来选择一下，哪一种懊悔更合你的口味。

47

当一个人尚拥有成功时，他往往会对它表现得相当冷淡；可当他对人的影响力刚一开始丧失，他便会陷入沮丧。反之亦然。

48

英萨罗夫作为一个时刻准备去战斗的人，极大地调动了叶莲娜的想象力，因此她选择了他，而放弃了艺术家舒宾和学者别尔谢涅夫。从远古时代以来，女人就更喜欢好斗的军人，而不喜欢温顺和平、非军职的军人。假如屠格涅夫没有给这种思想穿上一套理想主义形式的外套的话，作家兴许也不会成为青年一代心中的偶像了。我们当中有谁不曾为叶莲娜及其选中的宠儿而入迷呢？总

而言之,又有谁不曾为屠格涅夫笔下的女性而倾倒呢?可是,他笔下的女性全都投身于最强的男子。“高等人类”与动物世界一般无二:公兽相互厮杀,母兽则坐观其斗,而在厮杀过后,它承认自己乃是决胜者的奴仆。

49

幼虫变成蛹,并长久生活在暖暖和和、安安静静的巢里。假如它拥有人类的意识,它兴许也会说,它的那个世界,是所有世界里最好的一个,甚至是唯一可能的世界。可是,时候一到,便会有一种不可知的力量,驱使它从事破坏工作。假如其他幼虫能看见它是在从事着一桩多么可怕的事情的话,兴许它们也气愤填膺,而把它称作是无道德、不信上帝的家伙:会大谈特谈悲观主义、怀疑主义以及诸如此类事物的。居然要毁坏花费了许多劳动创造出来的东西!况且,这么暖昧、舒适而又完美的世界,有什么不好!为了保护这只小巢,得构想出多么神圣的道德和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呀!而至于说从那只幼虫身上,长出了一对翅膀;而且,那幼虫在把它的旧巢吃掉以后,变成一只轻盈美丽的蝴蝶,飞进一个自由的天地里去了这一点,就谁都不管了。

双翼即神秘主义,而自我谴责,也就是现实生活。那些创造了它们的人,应当赐之以拷问和刑罚。而在世界之上,有监狱和自愿的刽子手就足够了:书本多数也都是监狱,而所有作家,往往也全都是刽子手。

50

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乃是“相互冒充者”。尽管他俩在精神上都是病态的，却要故意装出精神健康的样子来。他们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有病，却把自己的病态表现到那样一种地步，以使怪僻看起来倒有几分像是独特。他们以所有经常处于危险中的人所特有的敏锐，从不超越某一特定界限，社会舆论是这断头台上的巨斧，永远都在他俩头上：只要一不小心笨拙地拽动了绳子，死刑便会自动发生。于是，他俩都善于避免多余的动作。

51

那些所谓的终极问题，在创世之初和我们今天，都在同等程度上使人类激动。亚当和夏娃便早就想要“有所知”，为此，不惜冒着全能的造物主对自己的怒火，从知善恶树上摘取了果实。由于自己的牺牲不为上帝悦纳，该隐向自己的亲兄弟扬起了手——他似乎觉得他诉诸凶杀乃是为了正义、为了恢复自己那被践踏了的权利。从该隐那时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能明白，世界的创造者为什么偏偏喜欢接受他兄弟的牺牲，而不喜欢他自己的牺牲；而在我们今天，萨莱里重复了该隐式的惩罚，毒死了自己的兄弟和恩人莫扎特：“人都说地上没有真理，可天上又哪儿来的真理呢？对我来说，

这一点像简单的伽马[1]一样清楚明白。"世上任何人都能从这一段简洁而又深刻的话里，体认到自己那痛苦万分的怀疑。悲剧——迄今仍神秘地被所有人视为一种高级类型创作——的创作，其源盖出于此。一切都是可以猜想和解释的。如果把我们的知识与古人的知识相比，我们便会是伟大的智者。可是，对于永恒的正义之谜来说，我们和初人、和杀人犯该隐一样，知道得同样少。进步、文明及人类理性的所有成就，都未能给这一领域带来任何新东西。看到丑陋、疾病、疯狂、赤贫、衰老和死亡，我们也会和我们的先人一样，惊恐而又困惑。智者们迄今为止所能做到的一切，就只是把尘世的恐惧转化成为问题：也许——他们对我们说——一切可怕的事，其可怕仅在于外表，而一种全新的东西，正在这条充满痛苦的道路的尽头等待着我们。也许！然而，一个当代最有教养的人，一个有可能接受四千年人类历史生活所积累下来的全部智慧的人，对这一问题的了解，并不比一位由于自己的恐惧而开始解答世界性难题的古代歌手更多。我们是一个正在衰落的文明的孩子，我们是一些生来的老人，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初人一样年轻。

52

人们都说，我们无法在"我"和社会之间划出界线来。这是多么幼稚啊！鲁滨逊们不仅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之上，而且，就是在人烟密集的大都市里，也可以找到。当然啦，他们并没有穿兽皮衣，

---

[1] 伽马，希腊文中的第三个字母。——译者注

也没有黑腿的星期五做随从，正因为如此，任何人都不认得他们。可要知道，星期五和兽皮衣是最后的道具，可使之成其为鲁滨逊的，并不是它们。孤独，被遗弃，无边无际的大海——我们这些现代人在如此这般的条件下生存得还不够吗？难道说这样的人还不是鲁滨逊吗？对他来说，人，已然变成了一种不费力便无法把它与梦境区分开来的遥远的回忆。

53

做一个无可挽回的不幸者是一件可耻的事。一个无可挽回的不幸者往往得不到尘世法则的庇护。他与社会之间的所有关系，都被永远打断了。可是，由于或迟或早每个人都命定成为无可挽回的不幸者，所以，哲学所能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孤独。

54

“宁做一个不幸福的人，也不做一头幸福的猪”——实用主义者想要通过这条金桥，跨越将他们与理想主义乐土隔离开来的深渊。可是，心理学来了，它粗野地报告说：“不幸福的人是没有的，而所有不幸福的人，都是猪。”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人、拉斯柯尔尼科夫、哈姆雷特等等，并不是不幸福的人，人们蛮可以选择他们的命运；至于那些个不幸福的猪，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对此了解得十分清楚……一个人只要有耳朵，他就不可能听不见。

55

假如你想要人们能羡慕你的悲伤甚至你的耻辱的话，你不妨装作你居然为此而自豪。假如你有足够的演技，你就放心吧，你很快就会成为风云人物。自从有了那则法利赛人和税吏的著名寓言以来，有多少无法在上帝面前履行其职责的人，成了福音书里的税吏，而引起了人们对自己的同情甚至嫉妒呀。

56

哲学家极其喜欢把自己的判断称为“真理”，因为，一戴上这样的头衔，判断便成为普遍必然的了。可是，每个哲学家都是亲自杜撰自己的真理的。这也就是说：他想让他的学生能被他杜撰的方法所欺骗，他把以特有方式行骗的权力，留给了自己。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就不能赋予每个人以其所愿有的方式而受骗的权力呢？

57

当桑蒂帕将一桶泔水往刚下了哲学课回来的苏格拉底头上泼下去时，据传说，那位哲学家只说了一句“狂风之后总是要下雨的”，“搞过一些哲学以后，你反正会觉得自己被浇了一头泔水”，而桑蒂帕所做的，不过是苏格拉底内心活动的一种外在表现罢了，我

不知道这么说，够不够得上真理（非智者，而是真理）的水准。象征并非总是那么漂亮美观。

58

《地下室手记》里有这样一段话："我读书很少，写字不多，而且，看来也很少想问题。不喜欢我的人肯定会把这当作我的一大缺点，说我懒，或许还会管我叫奥勃洛莫夫。与此同时，他也许还会想起这样一句老生常谈，即懒惰是万恶之母。而朋友却会说这种状态是暂时的；说或许我身体不大好——总之，他会找出理由为我辩护，尽管他对用以辩护的情况也不甚了了，而只是一心想安慰我，而不是对我说真话。而我自己却会说：我们等着瞧吧。假使在我生命的尽头才发现，原来我所做的，一点也不比别人少，那也就是说……也就是说，或许倒是懒惰成全了我呢。"

59

论敌解释，说他之所以写了带有火气的文章，是因为他患了肝病和胃病的缘故，这使博尔纳非常生气。他觉得，为了恶在人世间居然大行其道而愤慨、而怒火填膺，要比因自己机体内偶有小恙而发火要高尚和崇高得多。撇开感伤成分，且看他是否正确，以及这样做是否更高尚。

60

真正的作家不屑于侈谈那些只是耳闻而未得亲见的事物。古典中学里的作业——“用自己的话”转述从别人书中读到的东西——会令他感到屈辱和枯燥乏味的。更何况他根本没时间做此等无聊之事。

61

只要在有教养的人民之间横亘着良心作为唯一可能有的中介者的话，就不可能有什么相互理解。良心要求供品，并且也只是要求供品而已。它对有教养者说：你多么幸福，生活优裕，学富五车；而人民又是多么贫穷、愚昧而又不幸呵。不妨放弃你的好运，或用谄媚的话蛊惑你的良心吧。只有那已然无可牺牲、已把自己的一切都丢弃掉了的人，才能以平等姿态走向人民。

正因为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才不怕以自己的名义发言，而且，他们并未感到自己受到某种强制，也无需装腔作势、虚伪做作，以便能与人民站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62

不知道自己所愿知道的东西，被认为是最可耻的事情之一。而承认这一点也就等于永久败坏自己的——不仅是作为作家的名

声，而且，也包括自己作为人的名声。可尽管如此，“良心”仍然还是在要求人们如此坦白。当然啦，在这种场合下，几乎和所有场合下一样，只有当良心的要求已不再以过分严重的后果威胁人时，它才能得到满足。除此之外，现而今已经很少有人会害怕一度曾十分可怕的社会舆论的谴责了（公众已经被调教和驯服了，他们以极其崇拜的心情倾听人们的话，从来就不敢加以评判）——到了后来，人们竟然把“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要的东西”这种坦白，当作是为某种极端重要的东西提供的保障。因为，那些知道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的人，通常所向往的，不过是些空洞的东西，而他们也的确获得了低价值的福利，如财富、名望，往好了说，则还有进步或世界观什么的。对此不妨以一笑了之。或许，我们离哈姆雷特复活的时代已经不远了，到那时，哈姆雷特会骄傲而非羞涩地宣称：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究竟想要什么。而公众则会给他大鼓其掌的：因为，公众为其鼓掌的，总不外乎英雄和骄傲的人。

63

恐惧死亡的原因主要来源于自我保护感。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老人和病人身上，理应不会再有此类感觉了，他们理应能平平淡淡接受死亡。然而，面对死神，所有活的生物都有恐惧感。这是否意味着，恐惧也还是具有某种意味呢？可是，既然这种感觉无法保护活的生物不受死亡的威胁，那为什么它仍是必须与合理的呢？为什么自然科学观点在这一次，和几乎每次一样，中途止步，未能履行它的诺言，把人类理性引导到底，引导到它许诺的

地方去呢?

64

道德义愤只不过是古代复仇的一种比较精致的方式罢了。以前,人们用短剑表达愤怒,而如今用话语就够了。想要并且喜欢处死自己的侮辱者的人是幸运的,因为,既然侮辱者已经得到了报复,侮辱也就不成其为侮辱了。正因为如此,取代血腥镇压的道德,用不了多久,便会丧失吸引力。可要知道有一种侮辱是十分深重的、是难以忘怀的,因为它不是来自于人,而是来自于"自然法则"。如何才能摆平这样的侮辱呢?对付这样的侮辱,无论是短剑,还是怒气冲冲的话语,都无济于事。对于那些冲撞自然法则的人来说,道德或暂时或永远地退居于次要位置上了。

65

人惧怕幻想,尤其是那种形式的幻想,它认为一切——无论是过去发生的,还是现在发生的,抑或是将要发生的——都是可能的,都可以说:是的,会这样的。现实生活中既然充满如此之多的恐惧,又如何能为它辩护呢?然而,"热爱命运"(amor fati),又绝不意味着与现实生活缔结了永久和约。这和约只在或长或短的一个时间段里有效。为了搞清敌人的实力和意图,需要时间:昔日的仇恨在友谊的面具下仍在持续,可怕的复仇正在酝酿。

66

在探讨"存在的终极问题"方面，我们并不比我们最遥远的祖先，离真理更近。对此，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然而，仍然还是有许多人继续思考永恒问题，但对是否能取得某种满意的结果这一点，不抱任何希望。显然，结果——就此词的通常意义而言——是并不需要的。到后来，我们最终不得不即使是在哲学领域里，也依赖直觉，而在哲学中，按照一般人的信念，占据统治地位的，乃是理性及其所以拷问人的"为什么"……"为什么"善于嘲弄各式各样的"所以"。而直觉却从来不嘲弄人：它只不过是瞧不起"为什么"，只是引导人通过最为艰难、无法通行的道路，走到特定的——如果我们神圣的理性得以预先猜测到的话，兴许也会把它称为荒谬绝伦的——目标的。可是，理性是一个蹩脚的猜谜者。所以，当我们抵达于它来说是出乎意料的目的地时，它无计可施，只得承认既成事实。这还不算，它甚至还会论证它、颂扬它。因为——"现实的是合理的"这一论断，不仅适于一个领取薪水的哲学家——如社会主义者针对所有哲学家，如某些哲学家（其中包括我国的弗·索洛维约夫）针对黑格尔所说的那样——而且，即便其薪水被剥夺净尽时，也同样适用。而且，甚至比这更厉害：在以上所说的后一种情况下，而且，恰恰也正是在这后一种场合下，尽管社会主义者和弗·索洛维约夫不愿意承认，现实也会变得极其合理。一个哲学家，即便备受迫害、迭遭痛苦、忍饥挨饿，根本得不到任何薪水，几乎永远都是极端幻想家，尽管如此，也根本不妨碍他——当然

啦——痛骂现存制度，如众所周知，连贯性只对学生是必要的：其所有的优点只在于合乎逻辑地发挥老师的理念。而老师自己呢，总是在杜撰理念，因此，他们永远有权以一种理念取代另一种理念。上层统治者颁布法律，同时又自行取消它；而下层机构的责任，在于准确地、始终一贯地、严格地阐述和履行上方意志的指令。

67

福音书寓言里的法利赛人，履行宗教要求于他们的所有职责：持斋、纳税等等。然而，他们是否便因此而有权为自己的正直而喜悦，从而鄙视那些有罪的税吏了呢？大家全都认为他们有权这样做，而法利赛人也一样。基督的裁判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最出乎意料的。他们良心清白，他们也不曾在任何人面前冒充圣人，他们自己对自己的圣洁深信不疑。可是，突然间，他们反倒成了戴罪之人了，成了罪人了。可是，如果一个有良心的人的良心尚无法使我们分辨清什么是善恶的话，那么，我们又如何能使自己避免犯罪呢？而那个像星空一样曾经给康德以安慰的道德法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康德在丰富而又深刻的内心生活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他平静地接受了死亡。他意识到他无论对谁、无论对什么，都不曾有过任何过错。然而，假如基督再次降临的话，他兴许也会为了康德的正直而谴责他的。因为，如果只要你意图是纯洁的，再加上你有诚实履行被你认为是义务的愿望，就是正直的话，那么，我要重申一句，法利赛人也是正直的。

68

我们之所以耻笑某人,决不是因为他相当可笑,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想开心、想大笑。同样,我们之所以发火,也决不是因为某行为使人愤怒,而是因为我们需要给胸中积累的情愫以宣泄的出口。当然,根据这一点所能得出的结论,决不是说我们应当永远保持心境宁怡、心平气和。那个居然想要在尘世间实现正义之理想的人,是多么不幸呀。

69

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刻,我们的思考也最为紧张;而只有当我们再也没别的事可做时,我们才会坐下来写东西。

所以,一个作家只有当他想要再现往昔时,他才能写出点有趣或有意义的东西来。当我们需要思考时,遗憾的是,我们顾不上写什么。正因为如此,所有书籍,归根结底,都不过是所曾体验过的一切的微弱回声罢了。

70

契诃夫有个短篇小说叫《不幸》,它很好地说明,当一种新的真理危及一个人牢固的地位时,要他掌握这一真理有多么的难。商人阿夫杰耶夫不相信他有罪,不相信他被诉之于法庭,不相信他被

审判，不相信审判他的理由居然是因为他在公众银行起哄。他一直认为，最后的判决还在后面……而在学术界发生的事，也与此相仿。学者们如此习惯于认为自己无过、自己正确，以至于绝对连一刻也不曾想到，他们自己会被诉之于法庭，而当威胁说要起诉他们的声音传来时，他们只会不相信地耸耸肩头而已。“这一切都会过去的”——他们想。喏，到最后，当他们确证他们的的确确遇到了如阿夫杰耶夫那样的不幸时，他们便开始为自己辩护了，他们的理由是：纸上写的字他们看不明白。而现如今凡是学者都被人当作可尊重的、聪明的、经验丰富的、无所不知的人。

71

假如有人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身边，说他自己是多么无望、多么不幸的话，那么，这位以描写人的痛苦为志业的伟大艺术家准定会在内心深处，耻笑他和他的幼稚。难道说此类事情居然可以当着人诉说吗？难道说一个人可以一面如此喋喋不休地诉苦，一面还是对来自邻人的安慰寄予希望吗？

绝望，这是我们生命中最庄严伟大的时刻。在此之前，我们一直得到外界的帮助，而如今呢，我们只能面对自己。迄今为止，我们一直是在与人和人类的法则打交道；而如今呢，我们将面对永恒和任何法则的缺失。一个人怎么会不懂得这一点呢？

72

别林斯基在他那封著名的信中，指责果戈理在《与友人的信》中屈服于死亡的恐惧、魔鬼和地狱的影响。我认为这一指责完全正确：的的确确，果戈理既怕死亡又怕魔鬼和地狱。区别仅仅在于：人们是否可以做到根本就不害怕所有这些个玩意儿，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无所畏惧是否能证明人类灵魂业已达到很高的发展程度了呢？叔本华曾经断言，死亡一直都曾是哲学的灵感来源。所有优秀诗歌作品，古代及近代各民族的所有奇妙神话，都以死亡恐惧为来源。禁止人们害怕死亡，要求人们平静对待死亡的，就只有现代科学。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哲学即源于此。你如果想要摆脱以上两种哲学，就必须重新允许人思考死亡，允许人不再为自己对于魔鬼和地狱的恐惧感而害羞。当然也许适当掩盖此类恐惧感依然具有某种意义：在面临巨大危险的关头仍善于保持冷静，这是一种大美。

然而，磨炼人的感受力，将其理性限制在可知范围以内——像如今人们常说的那样——这样的任务，则只能鼓舞那些有局限的生物。幸运的是，人类还没有一种对其自身实行阉割术的工具。被迫害的厄洛斯[①]的确在躲避敌人的视线，但却从未弃绝自我，甚至就连中世纪最严酷的僧侣，也无力从自己的胸腔里把心脏完全掏出来。在对待追求无限的问题上也同样如此：科学迫害着这种

---

① 厄洛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译者注

追求,一次次地将它的否定权(veto)强加在它的身上。然而,就连实验室里的杂役或早或晚也会醒悟的,他们会像僧侣冲破修道院围墙那样,怀着同样的渴望,冲出实用知识的樊篱的。

73

假如命运——据说有这样的法则存在——会处罚罪犯的话,那么,对于喜欢善的人,它也会拥有自己的法庭的。对前者,它会实施镇压;对后者,它会加以鄙视。对前者,它施以令其痛苦的拷打;对后者,则会令他羞耻。

74

哲学永远喜欢占据服从的地位。在中世纪,它曾是"神学的婢女"(ancilla teologiae);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它是科学的婢女。而它却称自己是什么——科学中的科学。

75

我不知道迫使人从不回头一直往前走的究竟是什么——究竟是以为身后有头上缠满了蛇的墨杜萨因而害怕变作顽石呢,还是以为身后是由因果律及现代科学提供了保障的稳固性和不变性呢?根据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根据人类思想在我们这个时代业已达到的紧张程度,应当认为,墨杜萨的脑袋并不像因果律那么可

怕。人为着要避开后者，他什么都愿意干：看样子，就连迷狂——非以华丽辞藻作结的诗性的，而是真正的迷狂，为了它，人们会把他关进疯人院的那种疯狂——人也乐于接受，而不愿意复归对现实的规律性认识的怀抱。

76

“体验悲伤与欢乐、胜利与绝望、寂寞与欣悦等等，却缺乏所以如此的理由，是精神疾患的可靠征象”，精神病理学教科书中这样写道……这是正在度过其最后时日的当代真理之一。

77

托尔斯泰伯爵的德裔传记作者，曾就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两人总是误会不断、争吵不断这一点表示过遗憾。他回想起了席勒和歌德的关系，于是，他认为，如果这两位杰出的俄国作家性情比较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总是十分友好的话，俄国文学肯定会从中获益良多，而他们俩也笃定会留下一卷论述各种哲学和文学问题的通信录以教导后人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也许会很好，但我却绝对无法想象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居然会就高尚的题目，进行长期友好的通信。屠格涅夫的几乎每个判断，都会或都可能会令托尔斯泰怒火满腔。有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情：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一样，也不喜欢屠格涅夫，而且还针对他写了一篇非常恶毒、带有侮辱性的谤文。它不像是与本人相像的漫画，而毋宁说它

不是一幅漫画，而是一篇诽谤文。看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一样，最仇恨不过的，是自己那位有名的作家同行身上的“欧洲人习性”。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拥有一位心理学家的洞察力，但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错了。但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仅仅因为屠格涅夫穿的是欧洲人的服装，竭力做出一副西方人的模样这一点，就够他受的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所做的，恰好与此相反；他千方百计想要从自己的内心中，把欧洲主义的根子统统扔掉，尽管，顺便说说，他的这一努力并未完全成功，因为连他自己也并未彻底搞清楚，欧洲的力量何在，其影响的危险之处又何在。然而，已故的米哈伊洛夫斯基依然把他称为探宝人，而这绝非平白无故。要知道，的的确确，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文学创作的第二个时期中，已经不再寻求生活中所谓实实在在的福利了。在他身上苏醒了的俄罗斯人，乃是一个十分渴望奇迹的、自发的人。与他所需求的东西相比，欧洲文明里所有的才俊，都显得平淡乏味、可怜巴巴、无足轻重了。我们那些有文化的全部人们，以他们多少年以来的经验告诉他，从来就未曾有过什么奇迹，而且，看来，今后也不会有的。而他那位依然未被文明所驯化的全部存在，却向往一种伟大的、强有力的和未知的东西。而外表满足的进步论者、“渐进论者”屠格涅夫，只能引起他的愤怒和仇恨。关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我恨他那双民主主义的大腿。”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可能会附和他的这句话……且慢，看在这位德国批评家的面子上，让俄国作家们和解了吧，要他们就高尚的话题诚挚地交谈去吧！可要知道就连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他临终前不久，为了一部《安娜·卡列尼娜》而与托尔斯泰吵了起来。

在他看来，就连托尔斯泰也太好说话了、太忍让了……

78

我们极少夸耀那些对我们来说重要而且必要、为我们所十分珍视并且真正喜欢的东西。相反，对那些我们根本就不重视的东西，我们却乐于向人显示，因为我们还不知道，这种东西是否还有别的更好的用处。人们往往喜欢把卖身以求的情人带到剧院，置于大庭广众之下，而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却宁可待在家里或去绝少有人的地方。我们那些"慈善家"的情形，亦有类于此。每次当我们察觉自己身上具有某种我们根本不需要的特征时，我们总会尝试一下，看它是否于人有益，并急切地将它展示给人们。如果它得到嘉许，我们就十分高兴：毕竟还有点用处。演员、作家和演说家，往往对矫揉造作厌恶得要死，可要是没有做作，也就不可能在公众那里获得成功，于是乎他们便把自己那矫揉造作的能力，当作才赋；而且，与其要他们失去这种本领，倒不如要他们去死更好。甚至，一般说来，"才能"之所以被视为天赋，仅仅因为它总是外在的，因为它无论如何对社会有益。我们所有的判断从里到外渗透了实用主义，而如果你想要把这类成分统统清洗掉，那么，现代人的"世界观"里究竟还能剩下什么呢！而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年轻的、不够老练的思想家总是对先定和谐（harmonia praestabilita）笃信不疑的缘故，即使他们压根就没听说过莱布尼茨也罢。他们迫使自己相信，在理想追求和利己追求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他们相信，比方说，追求功名和追求有益的活动，这些都不过是对同一件事采

用了不同的词罢了。这样的“前提”,甚至在那些具有坚强勇敢头脑的人身上,往往也会很活跃,并且保持很长时间。我觉得,即便普希金活到了耄耋之年,也不会放弃这一前提。屠格涅夫如一个有着他那样气质的人总而言之所能信仰的那样,对此笃信不疑。托尔斯泰则时而相信,时而不信,这由他在彼时彼地需要做什么而定:当需要摧毁别人的思想时,他对此有怀疑;而当他捍卫自己的思想时,他相信它。值得认真关注并首先是模仿的例证是:人类真理只有在被用于辅助目标时,才是适用的。

79

人是一种保守的动物,任何变化,哪怕是向好的方向变,他也害怕,所以,通常人宁愿要习惯,哪怕它并不好;宁愿要旧的,哪怕新的很好。一连多少年以来一直都是信仰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说什么灵魂不朽,哪怕人们用几何学方法(more geometrico)向他证实这一点也罢;哪怕他是一个最胆小如鼠的生物,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福斯塔夫一样害怕死亡也罢。在所有这一切之外,还得加上自尊心!人们不喜欢承认自己有迷误。这很可笑,但实情如此。人,这个微不足道、可怜巴巴的生物,正如历史和通常的生活实践所证实的那样,每一步都在犯错的人,却以为自己不可战胜和无所不知。而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坦率并公开承认自己一无所知呢?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非一件易事。卑鄙的理性,不顾我们的意愿,将伪真理偷偷塞给我们。而对于这种伪真理,即便我们看穿它们是伪造的,也无法摆脱它们。苏格拉

底认为他什么也不知道也无法知道：他对自己的知有很深的信仰，他认为除了他教给人们的东西外，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是“真理”，他从神庙里接受了神谕，并真诚地认为自己是最富有智慧的人。而我们大家也都为他的智性所蛊惑，它迄今仍在俘虏着我们。笛卡尔懂得，必须怀疑一切，但他却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在哲学家们最终认识到教导和拯救人乃是自己的职责以前，一切仍将如此。而谁若想帮助别人，谁就不能不说谎。必须有所怀疑，但不是为了以后复归这样一种信念，即这是无目的的；经验表明，这一过程只会从一个错误走向新的错误——而是，当然啦，为了引向终极问题领域，必须使怀疑成为一种常在的创造力，让我们生命的存在本身能为它所充满。因为，硬知识是知觉不完善性的一个条件。软弱的、尚不强壮的精神无法应付过分急遽的、毫不间断的变化；这样的精神总是需要左顾右盼才能定下神来——为此，就必须长久体验同一种东西，它所需要的，是习惯所能提供的牢靠性和稳固性。但一个成熟的精神却会藐视这些拐杖。但是在地上匍匐爬行早已使它厌倦了，它想挣脱“亲爱的”土地，向上飞升，向远处进击，直到进入无限空间。而要知道，任何人都懂得，我们注定不能永久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可是，恐惧感妨碍我们坦率地对自己说出这一点。因而，在时机到来之前，我们会一直保持沉默。可是，不幸、疾患、沮丧以及我们想要将其从我们身边赶开的恐惧，它们成了我们生命中常在左右的伴侣。我们已经无法摆脱它们了，所以，不由自主地，我们怀着好奇心，开始仔细打量这个可恨的伴侣。于是，我们发现，它不光拷打我们，而且，它还和我们一起或代替我们，做着一件奇特的、不怎么常见的事儿：它咬断了所有把我们与先前的存在

捆缚在一起的绳索。有时我们甚至会感到,再过几秒钟,任何东西再也无法将我们支撑住了;而匍匐在地上的人的永恒理想也已实现:人摆脱了重力,远离可诅咒的尘世间的烦恼……这是痛苦不堪的灵魂的一种预感,还是幻觉呢?……

80

道德论者之所以受人攻击,是因为他们总是向人推荐“道德的抚慰”。然而,老实说,这种指责并不完全正确。也许,只要有可能,道德论者倒是更乐于以较实在的东西来取代自己那抽象的才能。青年时代的托尔斯泰曾经想要造福于人类,可是到了晚年他才确信他是无力造福于什么人的,于是,他便开始宣扬绝欲、听天由命等诸如此类的说教。而当人们不愿意接受他的学说时,他是多么愤怒呀!可要知道,假如托尔斯泰没有把自己的学说当成是解决终极问题的最终答案和乐观主义;假如托尔斯泰宣扬满意的答案是不可能有的,并以悲观主义者的面目出现的话,人们肯定会非常乐于听他的学说的,而极少可能会去反驳他。如今他之所以令人恼怒,主要是因为,虽然他无法不让邻人的命运轮回,但却要求邻人自以为自己轻松愉快,或要求其装出一副因他的学说而变得幸福无边的样子来。对此,鲜有谁会同意:何苦要自愿放弃自己的权利呢?要知道骂人和诅咒命运的权利,尽管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权限,可毕竟也还不失为一种权利呀……

81

契诃夫同名剧中的主人公伊万诺夫，把自己比作一个受了工伤的工人：工人死了，所以，伊万诺夫也只有一死。可是，如众所周知，逻辑学总是在要求我们对待类比推理要万分谨慎。要知道，喏，就拿契诃夫本人来说，他，显然曾在内心体验过如伊万诺夫那样的矛盾，可他却并没有死，而且，也没有成为多余人！他总在做着什么、寻找着什么，而他的事业在我们看来，和其他重要的人类事业一样重要、伟大。伊万诺夫开枪自杀了，而契诃夫的斗争还未结束。可戏剧却必须结束，当代美学虽然已经摒弃了亚里士多德的三一律，但不允许有没有结尾的戏剧。再过一段时间，剧作家们连这些限制也会给摆脱的：人们将允许他们公开承认，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或以什么来结束一部戏剧。如今，没有结尾的中篇小说已经开始大行其道了。

82

主题同上。伊万诺夫说："呵，我的出路何在？在哪儿？假如一个并不愚蠢、很有教养、身体健康的人，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突然开始大诉其苦并沮丧万分的话，那么，他的堕落已是不可挽回的了，他已无任何出路了。"办法只有一个：承认一落千丈和不可挽回的堕落是正常现象。甚至可以比这更进一步：把这当作是自己对他人在精神方面所占优势的一种证明。当然啦，要做到这一点，就

得走到一边去,既不向年轻姑娘求爱,也不和与大家一样活着的人称兄道弟,而是孤独自处。“爱情的梦话,温存而甜腻,干活没意义,唱歌和火热的话语,既陈腐又可恶”——伊万诺夫想到。这些话在年轻人萨沙听来十分可怕,而伊万诺夫对之无所谓,他受得了。至于说连他也在动摇,那并没有什么:要他开枪自杀还太早。只要他的创造者——契诃夫——还活着,他也将活着。而我们倾听到的,是一种左右摇摆不定的世界观。严谨合理、完美无缺,和中产阶级的自我满足感一样,已经令我们厌烦了。

83

从以上所说,我们可以看出,契诃夫早在其早期作品之一的《伊万诺夫》中,就扮演了一个“魔鬼的辩护士”(advocatus diaboli)的角色。伊万诺夫无论出现在哪里,都会给那里带来死亡和毁灭。当然,契诃夫并不敢公然站在伊万诺夫的立场上,甚至,显而易见,他也不知道,究竟该把自己的人物怎么办好。因此,契诃夫竭力想要摆脱他,以一种司空见惯的虚构手法,解脱开自己的手脚:伊万诺夫在众目睽睽之下开枪自杀了——他甚至都没来得及躲到暗处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好让人无从知道。对诚实的漫画化——利沃夫医生——是对伊万诺夫的唯一证实。利沃夫并非一个活人,这一点任何人都清楚。但是,使他出色的也恰好在于此。值得注意的是,契诃夫需要使冯维辛喜剧中那位已被人忘怀的斯塔罗杜姆复活,但其目的已经不是像以前那些剧作家那样,迫使人向美德的化身顶礼膜拜,而是恰恰相反,为的是让人能有机会对他痛骂一

场。只须看一看这位诚实的化身——利沃夫——就够了。他本着过去的习惯总是挺着胸，大声说话，语调是命令式的，可是，他以前的那些个下属实际上根本就瞧不起他。他们甚至根本不理睬他的玩笑而对它不屑一顾，并且把他像把令人讨厌至极、下贱的寄食者一样推出门外。可怜的正直呵！它居然活到如此地步了！由此可见，即便是行善者，也不该在尘世上活得太长久。

84[①]

契诃夫笔下的“瓦尼亚舅舅”，情愿一头扑到自己的朋友兼情敌医生的胸口，像小孩子一样搂着他的脖子哭泣。可他感觉得到，就连医生本人同样也有着不可抑制的、想要寻求安慰和鼓励的渴望。而可怜的索妮亚同样也已经无力承受少女的忧伤了。他们全都大睁着惶惑的、六神无主的、备受惊恐的眼睛，四处寻找一个人至少能缓解他们的部分不幸，可看哪，同一条大街上大家都像他们一样，全都无比沉重烦恼，没有人能承担自己的重负，更别提帮助别人了。最后一点的安慰被夺去了，抱怨也没有用：没有人会给予同情，所有人脸上都带着无助与绝望的表情。每个人都默默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没有人会哭泣，或发出完全可怜的哭声——这一定是不适当和不体面的。当时瓦尼亚舅舅，还没马上意识到他危险的处境，开始喊道：“我白活了！”没人想听他的，“白活了，白活

① 本节原文在俄文原版中似乎被漏排了，在新版中这个错误已得到更正，兹据英译本补入。——编者注

了！大家都知道白活了！"闭嘴吧，嚎哭也没用：手枪响也许会解决些问题。我们大家或许会跟着你叫——可我们没有，我们或许会喊：

"——你认为我会哭；

不，我不哭：我完全有理由哭，

可就在我哭前，

我这颗心会碎成百片，

千片。

唉，傻瓜，我要发疯了！"

渐渐，沉寂下来，变成一种可怕的、墓地般的永恒宁静。大家都疯了，一声不吭，他们认识到他们心中发生了什么事，下决心采取最后一步：在人前永远藏起自己的悲痛，在公共场合讲话，琐碎的话，会采用明白严肃，甚至高傲的方式表达出来，任何人将不再会喊道"生命浪费了"，并把他的感觉强加于邻人。大家清楚一个人生命浪费了是可耻的，这种羞耻理应避开人们的眼睛。这地上最终的法则是——孤独。

恭顺吧，我的心灵，做一个无言的造物的梦吧！

(Résigne-toi, mon cœur, dors ton sommeil de brute!)

85

无任何根据的理由。之所以"没有任何根据"，是因为，它似乎

是从对人类生存的意义所作的一般推断而来的，而要知道它实际上是我们愿望的孩子，而且，也许还是个非婚生的孩子……普希金在《吝啬骑士》中将一个守财奴诗化了；反之，果戈理却通过波留希金，塑造了可怕的吝啬的形象。显然，果戈理更接近现实。吝啬是丑陋的——无论你怎么看——是从外往里还是从里往外看。但果戈理毕竟还是不该教导人们直至暮年仍保持少年时代的理想。既然有老年，就没必要修正它，更不必为此而抱歉。必须接受它并努力弄清它实质何在。波留希金是一个肮脏、愚昧、令我们憎恶的躁狂者，可谁知道呢，他所做的事，也许乃是自然赋予他的一桩严肃而又重要的事业呢。他浑身上下只浸透了愿望——而对世上所发生的一切均淡然处之。别人说他什么，他一概无所谓。对于自己是饱是饥，是冷是热，是干净还是肮脏，他全都无所谓。总而言之，任何外部事件都无法把他的注意力，从我们无从看见的内心活动中引开。如果可以的话，不妨说他是无私的吝啬。而且，他根本就不需要他的财富。他让财富令人厌恶地成堆成堆地腐烂，他甚至不像普希金笔下的骑士，成天梦想拥有财富，如果他愿意，他蛮可以建造宫殿和活泼欢快的山林女神。可他究竟致力于何处呢？对此，便没人有时间加以思考了。一看见波留希金，大家所能想到的便只有他所带来的害处。人们当然是对的：波留希金们，腐烂中的财富，都是有害的。而社会舆论几乎永远都是适当的。但只有一点，那就是“几乎”。有时，不妨让道德和社会舆论也先住口——保不准能猜出吝啬、丑陋和衰老之谜呢……

86

我们有充足理由不信任生活。多少次,生活使我们朝思暮想的理想落了空。可是,我们有更多理由不信任理性:要知道,如果说生活有可能欺骗我们的话,那也只是因为软弱无力的理性结果成了一场骗局的缘故。也许,是理性自己给自己设好了这场骗局,只不过出于虚荣才嫁祸于人的。所以,最终,在生活与理性之间从事选择时,人们一般会宁愿选择前者。于是,你已经不再努力于预见和解释,而是期待着,把无可挽回当作是理所当然。因此,当尼采看到他的所有希望在逐渐破灭;当他明白往日精力已然不复能再;看到他的境况从此将一天不如一天时,他写道(1883 年 5 月 28 日的私信):"我是如此痛苦,它是一个人的痛苦所能达到的极限;然而,也只有在这面盾牌之下,我也才能获得良心的安宁,不多几人才有和有过的东西,那就是使人能以寓言表述的翅膀。"(Ich will es so schwer haben, wie nur irgend ein Mensch es hat; erst unter diesem Drucke gewinne ich das gute Gewissen dafür, etwas zu besitzen, das wenige Menschen haben und gehabt haben; Flügel, um im Gleichnisse zu reden.)理解尼采的关键,即寓于这几句简短而又朴素的话。

87

"阿波罗暂时还不要求把诗人用作圣祭——在世界上那些渺

小可怜的孩子们中间，也许，他比所有其他人都更渺小可怜。”您如用普通语言转述普希金的思想，精神病理学中的一页，便会展现在眼前：神经衰弱症患者通常总是会经历一个由极度兴奋状态转向彻底消沉沮丧的过程。诗人也同样如此，而且，他们以此而自豪。

88

腼腆的人往往是以倒填日期的方式接受印象的。当事情在他们眼前发生时，他们往往什么都未曾注意，只是事情过后，当他在记忆里复现过去的片断时，他才会搞清自己看见的是怎么回事。于是，在他心里，委屈、怜悯、惊奇的感情，便会以回顾既往的方式，栩栩如生地浮现。仿佛不是在回顾过去，而是当时的所见。所以，腼腆的人总是行动迟缓，总是多思而不善断：思考永远也不晚。当着别人，他们非常胆怯，只有独自一人时，他们才会胆大包天。这样的人往往是蹩脚的演说家，但往往会是出色的作家。在他们未成名之前，他们的生活很贫乏枯燥，人们往往不会注意到他们。而当名声来到时，他们已不再需要公众的关注了。

89

假如拉耶夫斯基（契诃夫《决斗》中的人物）是个作家，而且富于文学才华，那人们就会说，他十分独特，而且，正在和——比方说——加勃里埃里·丹农齐奥一样，研究“性神秘论”。而如今的

他仍是一个下流鬼，而且，人们责备他无所事事：人们想要他至少能抄写公文。

90

对儿童的观察。人身上的个人主义之所以令我们不快，主要是因为它证实了我们的贫穷。“我不能把我多余的东西给邻人，因为我自己剩下的也很少。”我们都向往自己能以上帝一般的姿态，慷慨散发自己的财产。而当我们看见某人以一句“私有财产是神圣的”而遮掩自己那些破破烂烂时，心里便会觉得堵得慌。神圣来源于神祇，神祇所有的一切却多得多，可他们算计起来，也和凡人一模一样。

91

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在为自己的行为忏悔时，我们会由此得出结论：这种行为应当避免。这是一个外表无可挑剔但结论却虚假的例子。过一段时间后，我们看到同一个人再次为自己所做的同一种行为而忏悔。假如我们珍视逻辑，那就得承认，这证明我们的每个结论都是正确的。而如果我们并不尊重逻辑，我们便会说：对一个人来说，做某个“行为”和为此而忏悔，同样都是必要的。可是，有时候，第一个结论的错误是以别的方式加以改正的。当一个人得出结论，认为忏悔说明有必要避免某事，因此此人终生不做此类事，可是，突然有一天，此人异常清晰地忏悔了起来，原因是他竟

然“没做这种事”。然而，这样一来，结论实际上已经毫无用处了：生命已走到尽头，被光明照亮的理性却不知道如何才能摆脱不必要的光明。

92

《黑暗的统治》中有一个场景，与梅特林克的一部独幕剧非常相像。当然，在此根本说不上什么借用不借用：在《黑暗的统治》写成的时候，还没人听说过梅特林克的名字。显然，托尔斯泰想要尝试一种新的手法，从而摆脱数十年以来自己顽强地通过一本本著作形成的风格。可是，他冒的风险太大。他宁愿用通常方法根治怀疑，那就是劳动、合乎卫生的生活，并且亲自下地扶犁。

93

每只鹬都夸自己的沼泽好：莱蒙托夫以为衣服白得耀眼是精神贵族的特征，因此总要让自己心爱的人物衣着入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完全相反，他看不起“外貌特征”；他笔下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穿着肮脏的衣服，人们却把这当作他的一个功绩或几乎就是他的一个功绩了。

94

还在年轻时代，当屠格涅夫写作其小说《够了》时，他就看出自

己生活中面临着某种十分可怕的东西。看出这一点的屠格涅夫并没有害怕，尽管他明白自己应该事先害怕才是；对他来说，明白缺乏经常性的内心焦虑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

95

拿破仑以熟知人类心灵而著称，莎士比亚也一样。可他俩的知相互之间并无任何共同之处。

96

被我们称为幻想以及我们在伟大诗人身上最珍重的那种东西，实质上是一些不受羁绊的、放荡淫逸的、如果可以甚至不妨说是淫荡的想象。这种想象力若表现在普通凡人身上，我们认为是罪孽；可对诗人，我们却会因他们的作品所能给我们带来的愉悦和益处，而往往给予谅解。尽管我们有非常高尚的理论，但我们在作判断时，却总是表现为十足的实干家和实用主义者。只有柏拉图一人曾毅然决定把诗人逐出自己的理想国。从那以后，又过了两千五百年，托尔斯泰才最先以自己的方式，向诗人提供了一种选择：再不品德高尚，那就停止创作，并放弃导师的声望。如众所周知，托尔斯泰之所以未被人们所耻笑，那也仅仅是出于对其经历和白发的尊重。但无论如何，任何人都没有把他的话当真，但是，诗人还从没有像在我们这个时代那样，感到自己在道德的束缚下居然会如此之自由。假如席勒在今天写作他的那些剧本和哲学论文

的话，兴许任何人都会愿意去读。托尔斯泰使我们感兴趣的，与其说是他的美德，而毋宁说是他的罪过。我们在对他的全部创作进行阐释时，不是根据他对理想的追求，而是根据从外部强加于他的理念和他那并不高尚的心灵需求的宣泄和企求之间的矛盾性质……尼科连卡·伊尔杰耶夫一连数小时地坐在平台上，偷看他的哥哥瓦洛佳如何勾引侍女的女儿，可他却从未敢驱使自己效仿瓦洛佳，尽管他想干这种事"甚于世上的一切"。侍女对瓦洛佳说："为什么尼古拉·彼得洛维奇从不到这儿来胡闹呢？""侍女不知道此时此刻，尼古拉·彼得洛维奇正躲在楼底下，情愿拿世上所有的一切，来与瓦洛佳这个坏蛋换个位置呢。""世上的一切"这句话，重复出现了两次。托尔斯泰对其小主人公的行为，从心理上做了解释："我曾是一个"，尼科连卡讲述道，"生来怕羞的人，可是，确信自己丑陋，这只会加重我的羞涩！"丑陋及对其丑陋的意识，会导致羞涩——一种来源如此可疑的美德，又能有什么好呢？我们又怎么能信任托尔斯泰笔下人物的道德感呢！丑陋意识产生羞涩感，羞涩感则把情欲驱赶进内心，不让它自然发泄。在幻想及其需求以及实现幻想的能力之间，一种奇特的对立有了些微进展。持续终生的饥饿和消化不良、对幻想及其无从实现和无法兑现的希望的仇恨，即源于此。今天，任何人也没有像托尔斯泰在《黑暗的统治》中那样，对爱情做了如此激烈的抨击。然而，一位生在乡间的唐·璜，其功勋根本没必要非得以悲剧了结。但是，托尔斯泰对唐·璜们的仇恨，"甚于世上的一切"，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对那些仪表堂堂、胆大妄为、情场走运、充满自信、敢于把思想付诸行动、总能成功地征服女性、敢于向活的石头雕像伸手的

唐·璜们，进行了报复。

97

未来戏剧中的情境，会与当下截然不同。首先，所有复杂的将被取消。人物有过去，它表现为回忆，但却没有现在：没有妻子，没有未婚妻，没有朋友，也没有事业。他孤孤单单一个人，并且只与他自己一个或与想象中的听众对话。他远离人群而生活。舞台上的所有布景，不是荒无人烟的孤岛，就是人烟稠密的大城市里一个孤零零的房间，人可以在里面像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上生活。剧中人不可能向后退到人群里或社会理想上去。即使现在，当观看波留希金时，也已无人会像果戈理一样，激情洋溢地号召人们，直到人生的暮年，也要珍视自己，并不是为了去嘲笑他，或是把他那可怕的形象当作对自己的一个警告；而是为了瞧一瞧，在他那里，在他那一堆脏兮兮的、最不可能有什么奢望的破烂里，是否恰好有那么一颗珍珠……李库尔赫得已把斯巴达人冻结了数百年，可是解冻天气来临，包裹在他们身上的冰块，全都冰消瓦解了。多利斯山下石化艺术的最后一些残余，也都被送进了博物馆……今天还会有什么吗？

98

他的仇恨只持续一天就足矣。假如我春天没播种，秋后我也就不会有收成了。可怜而又软弱的人，每天都有足够的忧虑和忙

乱。他只要有一分钟把事情丢在脑后就得死掉——不是死于饥饿,就是死于严寒。我们之所以必须积聚起我们全部的脑力和体力,仅仅是为了能保存自己。不但如此,我们还必须把环绕我们的整个世界,想象为是最适于我们获取必要生存资料的地方。我们没工夫思考真理,并且真理在此又当得何用!正是为此,世上才出现了讲述自然演变论的实证主义。而实际上我们眼中所见到的一切,都十分神秘。小蛇和大象,小树和大山,这一切从何而来?为什么、为什么人们总是不断祈求,却从未把它说出口:为了日常所需,哲学被永远挪到次要位置上了。而只有那些不善于、不会或由于生活优裕而不愿关怀自我保存问题的人,亦即那些病人、懒汉或奋不顾身的人,才去思考。他们重新捡起那被实干家们怀着自己正确的深刻信念而将其变作"自然而然"的谜。

99

康德和在其之后的叔本华,非常喜欢"无私的"这个形容词,即使在他们所掌握的赞誉之词的全部储藏都已预先耗费殆尽的情况下,他们也乐于使用它。不追求任何实用目的的、"无私的思想",这是叔本华所谓人所能为自己树立的最崇高的目标:他认为这是一条先验的、普遍必然真理。可是,假如机遇使他得以置身于俄罗斯农夫的圈子里的话,那他的观点就得变一变了。在农夫们当中,思考命运、世界的意义和无限等诸如此类问题,无论如何也不会被当作是无私的——假如一个献身于此类思考的人,如一位哲学家所应做的那样,同时声明他企望人们能彻底摆脱体力劳动时,就更

是如此。这样的人必定是个哲学家,哪怕他不过是一个被冠以"懒汉"这么一个万分可耻的外号的柏拉图也罢。在那里,一种旨在达到某种严格确定的实际目标的自私自利的活动,被认为是高尚的。而如果农夫们善于如学究那样讲话的话,他们兴许也会把构成其判断之基础的原则,称作是先验的呢。从人民当中取得其道德信念的托尔斯泰,同样也在抨击那些学者,而其理由,恰恰不是因为他们不愿劳动,而是无私的探索真理。

100

任何一个不带成见的观察家都能清楚地看到,一个人——几乎每个人——一天当中总会有十次改变自己的信念。对此人们所说的已经够多了,这已经成为许多作家讽刺幽默描写的对象。任何人都从不怀疑,在信念方面动摇不定,是缺点。我们的教养有四分之三是用来教会我们,以极其小心翼翼的方式掩盖自己在判断和情绪上的易变性的。一个不善于三缄其口的人,是最差劲儿的人;对他,无论在什么事上也不能信任。同样,对一个不具备牢固信念的人也同样如此:和他共同工作是不可能的。在此,道德,由实用主义意图而来的道德,推出了"永恒"的"原则":你必须永远忠实自己的信仰。在文化人圈子里,这一信条是如此不可动摇,以致文化人即使面对自己也生怕信仰不坚定。文化在信仰方面变得如石头一般坚硬,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是比承认自己改变了观念更为可耻的事。而当一些如蒙田一样心直口快的人,公然说他在观点和情绪上动摇不定时,许多人甚至会把它当作诺言和对自己的

诽谤。对你周围正在发生的事，你既不必看见，也不必听见，更无须朋友理解：既然你已经形成为你了，你也就丧失了生长变化的权利，你应当成为雕像，对雕像的性质和缺陷，大家知道得都很清楚。

101

任何一种哲学“世界观”，都在想要根据其对人类生存普遍问题的某一种解决方案来指导我们的生活。但欲要解决普遍问题，我们却既缺乏力量，也没有手段。因此，我们的所有道德结论，或多或少（实话说，这里所说的其实只是或多而不是或少）是任意的，它们只能证明我们的偏见——如果我们生来胆怯的话——或是证明我们的禀性和趣味——如果我们习惯于信任自己的话。然而，一个人是不甘于去做支持偏见这样可怜巴巴的事的，看起来，任何人也不会对此有何异议。因此，观点的分歧已不再令我们烦恼，而且，我们还希望这样的分歧将来能尽可能更多一些。真理是没有的，剩下的只有一种推断，那就是真理存在于人变化不定的趣味之中。由于这是共同（即社会）存在条件所提出的要求，所以，且让我们来努力达于一致吧：但千万别过分强求，每一种不是出于必然性的协议，都是对圣灵的犯罪。

102

契诃夫善于清晰阐释一种甚或多种世界观体系，而且，还在多篇小说（如《决斗》中的冯·克伦在讲台上发言一般）中不止一次这

样做过。可是，契诃夫却不懂得，除了纯文学以外，体系究竟有何必要、有何用处。当你写小说时，你就得迫使你笔下的人物，说起话来清晰而又连贯，这就用得着体系了。可是，当你独身自处时，难道你也当真会回想起“世界观”来吗？显然，甚至就连德国人，也未能在其“唯心主义”方面，走得这么远。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小说《好人》里的年轻作家）真挚而又深深地信仰自己的理念，可是，即使对于他——尽管他喜剧的局限性显而易见——我们也不能说，他在其理念中所能见到的要比习以为常的、已经成为一幅画的第二自然还多。毫无疑问，他非以理念为生。正因为如此，当契诃夫说，对于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来说，歌唱“就这样，让我们欢快吧”(gaudeamus igitur)[①]和写作富于人道主义内容的文章，同样都是重要的事。而当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的妹妹开始思考，她哥哥那些最高尚的、先前连她本人也对之拜服得五体投地的思想，在她眼中就变得卑下而又可耻了。她哥哥既不理解妹妹，也不理解她何以会仇视进步、人道、塔娅雅娜和“就这样，让我们欢快吧”(gaudeamus igitur)。而契诃夫却懂得。当然啦，只不过“却懂得”这个词儿在此的意义，与通常的用法有所不同。只要婴儿吸食母乳，他永远都会感到自己平静而又安详。当必须断奶的时刻来临而开始喝伏特加时——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天必然到来——人类的法则便是如此——幼儿时代的白日梦便永久进入一去不返的领域里了。

① 一首古老的大学生歌曲的头一句。——译者注

103

哲学家们颂扬心灵的安宁(aequanimitas),把它当作我们生存最高尚和最有价值的目标。可这样一来,动物便理应成为我们的理想,因为在“心灵的安宁”这方面,没有什么能比它们更好。你们不妨去看看正在吃草的绵羊或母牛,它们既不回忆过去,也不憧憬未来,完完全全生活在现在。而现在只要有一块好牧场,就能使它们完全满意了。

104

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得到一块面包和几句温存体贴的话,他会感到温存的话语比面包更贵重。可是,假使人们仅仅用温存的话语抚慰他,却不给他食物,那他也许就会憎恨温存的话语了。因此,在做结论时,我们永远都必须十分谨慎才好,其中的缘由,当然是出于这样一种推断,即真理比抚慰人心的谎话更为人所需。孤立现象之间的联系,很少能被我们观察到。引发一种后果的原因,往往一下子就有好几种。由于我们具有一种把事物理想化的倾向,所以,我们总是会把在我们眼里最高级的原因,推至前台来。

105

这是多么奇特的一种矛盾呀:我虽然眼见自己周围有成千上

万的人在死去，可仍然还是不忘走路时小心翼翼，以免踩死一条虫子！我们身上固有的怜悯之心，仅与我们自己生存的条件相适应。怜悯之心无法拯救所有生灵，所以，当其面对生活中的恐惧时，它却一声不吭。怜悯之心有时也会予某人以帮助，它常常就一些小小不言的小的不公正而掀起骇人的哭诉。可叔本华却想让怜悯成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

106

否认逻辑是认识的手段、手段之一或方法之一，是很不明智的。况且，否认它又有何必要？是为了连贯性吗？也就是说为了逻辑性吗？然而，把逻辑当作认识的目的本身或当作唯一的认识方法，却是另外一回事：遇到这样的场合就得去斗争，哪怕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所有权威都与你作对也罢。

107

“当金黄色的田野翻滚着波浪，当碧绿的森林在小风中哗哗作响……我体验到尘世间有多么幸福，我看见上帝就站在天上。”我们有时会这样，有时却与此完全不同。有时，虽然田野在翻滚着波浪，森林在小风中哗哗作响，欢快的小溪流呢喃地讲述着优美的童话，而人依旧未能体验到什么是幸福。而且，也无法忘却他们从童年时代即已学会的一条真理——天空不过是一种光学幻觉。可是，假如连天空和无边无际的田野也无法令人信服，难道康德及数

十位多数无任何才华的、以阐释康德为职责的哲学家们，又能有何作为呢？

108

最大的诱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中，蕴藏着一个十分可怕的思想，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以比喻的方式说的，他说，当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说“天主呵，你为什么抛弃我”时，谁敢保证他不曾想起恶魔的话呢。恶魔曾向他提示，只要他肯俯首下心，恶魔情愿把统治世界的权力交给他，谁敢保证想起恶魔这一番话的基督，不曾对他没有接受撒旦的提议而后悔呢……可有关此类的诱惑，似乎大可不必告诉读者。

109

关于当代欧洲，未来的判断是这样的：19、20世纪的欧洲，向我们展现出一幅奇特的画面。基督教蜕化成了道德，而道德又斩断了把人与上帝联系在一起的所有线索。随着宗教的唯理化，整个生活染上了彻头彻尾的唯理论性质。骑士阶层被常备军队所取代，而军队则是按照全民兵役制原则强行招募来的，主要用于检阅和宫廷礼仪。寻找哲学之石的炼金术，被探索以最优方式廉价加工产品的化学所取代；根据星相猜测人命运的占星术，被预告日食和天空何时出现彗星的天文学取代。甚至连这一时期人所穿的衣服也令人奇怪地缺乏色彩：不光男人，甚至就连女人也几乎全都一

模一样，大家都穿同一色调的服装。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代不仅并未察觉自己是多么渺小，反而以此而自豪。这个时代中的人似乎觉得，人类从未给全世界共有的精神财富的宝库贡献出如这个时代那么多的宝贝。如今，我们当然会耻笑他们那么天真。可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假如有这么一个人，他居然敢于轻蔑地对待其当代文化的原理的话，人们便会即刻宣布他是个非道德论者，并把他关进疯人院，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惩罚，可在那个野蛮的时代里，这却是司空见惯的事；现而今我们几乎很难想象它所能导致的后果。可在那个年代里，一个人一旦有了非道德论者的恶名，或是被关进了疯人院，那比死亡更可怕。19 世纪著名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曾经写道："要我发疯那可不得了，当乞丐也比当疯子好。"总之，在那个时代，人们被迫总是说谎话、作假，所以，有些最聪明的人，虽然已经看穿了这个时代的错误，往往也会装出一副信仰科学和道德的假象，其目的不过是为了逃避社会舆论的审判。

110

依照莎士比亚的典范写悲剧的人。要想取火，就必须用铁锤奋力敲打石头。敲打过程中会弄出很大的叮咣声，于是，便有许多人以为，响亮的叮咣声远比一丁点儿小火星更重要。正因为如此，一些说过太多大话的作家们，往往深信自己已经履行了神圣使命，因此，他们非常惊讶，为什么大家并不都来分享他们的喜悦，而且，还有许多人甚至见了他们就跑，或是捂住耳朵呢。

111

变形。聪明和愚蠢根本不是人的自然属性。一旦真正必要，连蠢人也会变聪明的。例子不必到远处去找：《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多么像一个傻瓜，他的样子多么令人瞠目结舌，至于《穷人》，我就不去说它了吧。可在《地下室手记》和他的其他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成了最聪明、最有洞察力的人了。对尼采、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也可以说同样的话。《悲剧的诞生》中的尼采，样子完全像一个诚实但傻乎乎的、蓝眼睛的德国外省大学生，而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有人甚至觉得他像马基雅维利。可怜的莎士比亚为了一个布鲁图斯受了许多苦，但任何人也无法否认《哈姆雷特》表现了伟大的智慧。然而，最好的例子还是托尔斯泰伯爵：迄今为止，只要他愿意，他就能表现得比最聪明的人更聪明，可有的时候，他的样子看上去却像个中学生。这是托翁身上最有趣也最令人羡慕的特点。

112

在莎士比亚的《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中，威耳西威斯针对埃阿斯说："可是他会打我，我就会骂他，（总算也生了气了。）要是颠倒过来，他骂我的时候我也可以打他，那才痛快呢！"[1]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的对手也可以说同样的话。他用尖刻恶毒讽刺和愤怒

---

[1] 此处俄文与中文版有异。兹从中文版补充这几句台词。括号内文字是中文版衍出的。见《莎士比亚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页。——译者注

来对付他们，而他们却能以其平静和自信而使他达到气得发疯的地步……当代那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们心境宁帖地信仰着其导师的思想。这是否意味着事实上（de facto）他们已经出卖了导师，而转到其敌人的立场上来了呢？

113

我国文学中有一种牢固的观点，即屠格涅夫笔下理想的女性（娜塔丽娅、叶莲娜、玛丽安娜）是按照普希金笔下的塔姬雅娜及类似于她的模型塑造出来的。这种观点未必正确：批评家们都被外表的相似给骗了。普希金笔下的塔姬雅娜是一个贞洁的少女，其使命是捍卫高尚道德之圣火的，而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这事轮不到男人做罢了。《鲍里斯·戈都诺夫》中的自称为王者对宣扬温顺服从的皮缅老头说"你在喀山要塞打过仗"等等。打仗，这才是男人的事。男人在休闲和休息时，需要家庭的温暖，而他想要确信的是，在家里，权力为他提供的保障是可靠的。塔姬雅娜的最后一句话，其意即在于此："我已经嫁给了别人，因此将忠实于他直至终老。"而在屠格涅夫笔下，女性不过是胜利者——男人的法官和奖赏（有时还会是鼓舞者）。其间的差别可谓天壤。

114

一本德文版《哲学导论》[1]这样写道："我们主张这样一种观

[1] 寇尔帕（1862—1915），德国心理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符兹堡学派的创建人。见其《哲学导论》第 261 页。——原书注

点，即作为专门科学之终结的形而上学是可能的、受欢迎的，它的首要任务，是从事一种介于理论与实践、经验与希望、理性与感情之间的，旨在估测概率、平衡证据、调和分歧的工作。”于是乎，形而上学不过是在估测概率而已。因而（Ergo），它的结论无法超越或然性的范围。可形而上学论者们为什么还在觊觎普遍必然和牢固永恒的判断呢？要人不是凭官衔。在形而上学领域里，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牢固信念的。“牢靠性”在此已经失去任何意义。倒是谈论永恒的摇摆和思想的动摇，反倒更为适当。

115

另一本同样也是德文版的《哲学导论》中，则是这样写的：“与唯物主义的错误相比……一个以为一切莫不清清楚楚，甚至就连对一种伟大意义和事物本质的预感也无不豁然明朗的人，乃是天底下最不幸的偶像崇拜者。”[①]这一思想兴许是极其偶然地混进另一位值得尊敬的哲学家思想的庞大种群里去了——因为它与这位哲学家平常宣扬的一切，是那么不同。然而，即便如此，它也不失其意义。如果我们这里所说的、过去的、19 世纪的唯物主义者全都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如众所周知——站在当代自然科学教育的高度，但在哲学领域，他们的知识远不如一个未受到文明开化的野蛮人多的话，那么，可以说，科学不仅与哲学无任何共同之处，

---

① 保尔逊（1846—1908），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见其《哲学导论》第 325 页。——原书注

而且，它简直是在与哲学作对。因此，我们必须走向野蛮人，其目的不是为了在他们当中普及文化，而是为了向他们学习哲学。由巴布亚人或火地群岛的居民，向柏林大学的编内教授林里德利希·巴乌尔森开哲学讲座，这该是一个多么有趣的场所呐！我之所以只说巴乌尔森，而不说布赫尼尔或莫里松特，是因为要知道巴乌尔森同样是个有教养的人，而正因为他是个有教养的人，所以，他的哲学预感，想必在与科学碰撞之后，感到疼痛了，即便疼得没有唯物主义者那么重，但无论如何，也足以使他有理由把来自一位红皮肤导师的帮助，视为必要的了。可为什么德国的教授们会如此缺乏勇气和感受力了呢？难道就是为了让巴乌尔森能自觉自愿地到澳洲去深造哲学吗？抑或至少是把自己的弟子们送到那里，或送到可以宣扬新朝圣思想的所有地方去吗？但他却杜撰了一个独特而又富于成效的思想，怀抱它躲进了遥远的角落里，以至于即使他有此愿望，也无法弄清它是什么样儿。而这个思想却十分重要而且严肃，那就是：当代哲学家不妨向野蛮人学学呢……

116

伦理学史中，有这么一段话：“怀疑任何一般道德法则的存在，或怀疑认识此类法则的可能性，理所当然会引起人们对之重新进行思辨证明，正如否认认识的可能性只能导致人们进一步探索认知条件一样。”当然，这位作者并没有像巴乌尔森一样，怀抱着他的观点躲藏了起来。在这位作者那里，这一观点被置在其著作的贵宾席上，安置在最醒目的位置上。而且，还指定了一个“理所当然”

来陪伴它。然而，实际上，这里真正理所当然的只有一点：以上引述的那段话，出自依沃金教授，而多数学者，与他观点相同。所以说，伦理学的前提，以观点一致（consensus sapientium ）为根据。这还不够明确吗？

117

在德国如此风行，而在俄国亦有不少信徒的“标准理论”身上打着无忧无虑的自信心的烙印。而任何满足感却以具有此种自信心为特征，它甚至都不愿意即便是为了使理论上完整，而顾及通常与不满足感相伴随的心灵的分裂性。文德尔班（《序曲》3131）以一种几乎可以说是非生物体一样的、幼稚的坦率，证实了这一点——而且，他不光丝毫不窘迫于自己的论证，反而，还为此自豪：“哲学研究，”他说道，“只在那样一类人中才有可能，他们深信普遍必然标准高于个别人的活动，而只有这样，它也才能被找到。”并非每个证人都会如此诚挚地出庭作证的！原来，哲学研究并非是在探索真理，而不过是存在于一些人当中的一个阴谋，其目的是要推翻真理，以便把普遍必然标准推上它的宝座。这个任务倒的的确确是伦理学的任务：道德一直都曾是，今后也将会是实用的。它的原则是：谁不拥护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118

“假设在我们所能触及的现实之前，还曾经有过一个混沌的、

不知法则为何物的现实的话，那这现实也绝不可能成为思维的对象。”(里尔:《当代哲学》,127)这是批判哲学的前提之一。当然，它是未经证实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若要换句话说，则这里还表达了上文引述过的、文德尔班理论中因果律的伦理学基础的那一思想。这样一来，当代思维的前提越来越清晰地向我们证实，本能并没有欺骗尼采:我们世界观的根，并非出自客观的直观，而是出自我们“心灵”的需求，出自我们“心灵”的、主观的和道德的需求，因此，要想战胜科学，除了先消灭道德外，别无他途。

119

高尚的老生常谈如是说:“哲学家了解情欲并战胜了情欲，而艺术家则表现之。”而若用德语说，听起来则似乎要更高尚一些，只是，我们并不因此而距真理更近:哲学家对付激情是要去理解，艺术家却是去描绘。(Der Philosoph überwindet die Leiden schaft, indem er sie begreift——der Künstler, indem er sie darstellt.)(文德尔班,《序曲》198)

120

德国人一直都在努力达到普遍意义(Allgemeingültigkeit)。然而，假如认识的任务是穷尽现实生活的全部底蕴的话，那么，要知道，由于经验总是在一味地重复，所以，它没有意义，或至少可以说，它即使有意义，其意义也十分有限。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尚无

人知道，甚至都未尝感觉到的东西，因此，我们必须要走的，不是普遍意义的大路，而是要走人的双脚尚未涉足其间的、新的小道。正因为如此，制定一定规则并通过规则，在特定时间内保护生活使之不出任何意外的道德，其所具有的意义是相对的。而且，归根结底，它终将在个别人类追求的非道德的特性面前，低头认输的。法则——一切的法则——都具有调节性意义，它只为那些寻找休憩地、寻找支撑点的人所需。但是，生活最初的和最本质的条件，却是无法无天。法则不过是一场越做越酣的梦。无法无天则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

121

A＝A。人们都说，这一法则，其实，逻辑学并不需要它，它可以轻松地避开它不用，来引导出自己的结论。但我不这样认为。与此相反，依我之见，如果没有这一论点，逻辑学绝对无法存在。可实际上，这种观点有其纯经验主义的来源。实际上，A 总是的的确确或多或少与 A 相等。但是，相反即不等，也是可能的。我们的世界既有如此这般的构造，它能容忍最荒唐无稽的变形。此刻与 A 相等的东西，过一秒钟便会与 B 相等，随后，又会与 C 等诸如此类的相等。现而今石头就是石头，而且，在相当长久的时间之内，石头仍然还将是石头，植物仍将是植物，动物仍将是动物。可是，完全有可能的是，即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石头变植物了，而植物又变成动物了。进化论的存在证实，这种观点并无任何不可思议之处。它只不过是用数千年取代了数秒钟，也就是说，那短短的几

秒钟时间,可以与永恒相比。所以,我敢于不怕来自著名的伊璧鸠鲁原则的虔诚崇拜者方面的指责,说我恬不知耻。我不得不再次重申,一切的一切,无论其为什么,都可以从无论什么中转化过来;A 可以不与 A 相等;因此,逻辑学以其确定可靠性,是根据经验可以观察到的、自外于我们而存在的事物的相对不变性法则所必需的,而这样一来,逻辑学及其理论也便丧失了它所以吸引理性的确定无疑性和普遍必然性。

122

想要理解人、生活和世界这种企图,妨碍着我们认识所有这一切。因为"认识"和"理解"是两个概念,它们的意义非但不相等,反而是直接相反的,尽管人们常常认为它们意义相近,有时甚至差不多用作同义词。当我们得以把一种新现象与另外一些已知的现象联系起来时,我们便认为自己已经理解它们了。而由于我们的理性追求的是理解世界,所以,许多不能被纳入当代世界观范围以内的事物,我们拒绝去认识。例如,被当作康德当代理性批判之基石的莱布尼茨的那个问题:既然外在于我们的事物并不能进入我们内部,那我们又怎么能认识它们呢?这是不可理解的,也就是说,它无法与我们关于理解的概念相调和。这就意味着:必须把它逐出我们的视野,正如康德企图做到的那样。然而,看来一切似乎正好相反,即,为了认识,必须要有所牺牲——而且要十分情愿地把理解给牺牲掉,因为理解毕竟是次要的玩意儿:世界与生活都太零碎(zu fragmentarisch ist Welt und Leben)!

第二章

只为头脑不发晕的人！

Nur für Schwindelfreie!

《来自阿尔卑斯山的回忆》

1

光把美呈现给人们，但它同时也把丑显现给了我们。假使你把硫酸泼在美女脸上，美便会顿然消失。世上是否有一种能迫使我们以先前那种愉悦之情观看她那张丑脸的力量，我不知道。最深刻真挚的爱情，是否能战胜这样一种变形——唯心主义者当然会说能克服的，一般说来他们总是急着发言，因为他们完全有理由担心，如果他们哪怕只卡壳了一分钟；而在其所提问题和所得答案之间，为了要能看清需经过一段必要的时间间隔的话，那么，一些一般多半搞不大清楚的问题，便会被搞清。正因为此，唯心主义者们总是坚定地站在逻辑的立场上，逻辑能在一眨眼间引导我们得出最妙不可及的结论和预言——任何现实也追赶不上它。爱是永恒的，因此，在我们眼中，一个被毁了容的女人也照样可爱，就好像她身上根本不曾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这一切当然都是谎言，可

正是由于有这类谎言，旧的趣味才得以保留，威胁着他们的危险才会视而不见。然而，要知道现实危险任何时候也无法凭话语和理论给予排除。无论席勒怎样歌颂永恒的爱，归根结底，或迟或早，胜利者总归是硫酸，品格高尚的小青年总归不得不遗弃自己的爱人，承认自己是个骗子的。而曾是其生命和希望之源的那一束光明，终将既毁掉其生活也打消他的希望。到那时他该怎么办好呢？他不会回到唯心主义那儿去，逻辑只会令他仇恨。而先前在他眼中曾是那么美妙的光明，如今却令他恶心。于是他开始寻找黑暗，因为黑暗能给他自由；因为在黑暗中统治万物的不是必然导致一定结论的逻辑，而是幻想及其任意性。如果没有光明的话，我们兴许永远也不会知道，硫酸可以使美变丑。没有光明我们便会是现实的胜利者。任何科学、任何艺术，也无法提供黑暗所能带来的一切。当然，在我们的青年时代，当我们刚刚步入生活，当我们身上还一无所有时，当我们在外部世界里寻找印象时，光明曾经给过我们多少幸福和欢乐呀。我们仍怀着感激之情怀念我们的青年时代，但却把它当作一个已经不再为我们所需的行善者。如其不然，则即使不感恩戴德，也完全过得去。要知道感激之情毕竟属于那样一些小市民式的行善者，他们精打细算——我给，为的是你能付出(do, ut des)——乃是其生活的法宝。因此，让我们把什么光明、把感激之情和忧心忡忡的唯心主义的担心统统忘掉，勇敢地前进，好迎接正在到来的黑暗吧。黑夜以对自己和现实的伟大统治给我们做出了许诺。可为此而摒弃旧的趣味和高尚信念，这是否值得？……爱和光明是对付不了硫酸的。想当初，当我们乍一想到，整个席勒，都可能被这区区一个短句所扫除时，我们是多么恐

惧呵！为使自己能抵御这一小小的真理，我们蒙上眼睛、捂住耳朵，我们建构了庞大的哲学体系。可现而今呢——现而今我们觉得，无论是席勒、伟大的体系还是过去的信仰，往往一无足惜。如今我们之所以找寻语词和音响，都是为了歌唱自己那不久前的敌人。黑夜，漆黑、无声无息、伸手不见五指、充满恐惧的黑夜，它是否曾一度令你感到无限美妙呢？对你来说寂静而又神秘、如无底深渊一般美妙的黑夜，是否比有限而又好大喊大叫的白天更具有吸引力了呢？看样子，再过那么一会儿，人就会感到，把我们抛到这个世界中来的、教会我们如植物一般向往光明的、让我们逐渐为自由生活做好准备的、那一关怀我们的不可知的力量，会把我们引领到新生活以及新财富期待我们的那一新境界中去的。愿意走的，命运引导他；不愿走的，命运拖着他走（Fata volentem ducunt, nolentem trahunt）。也许，过不了多久，一位激情洋溢的诗人，会勇敢而又欢乐地歌唱道：

让太阳熄灭吧，黑暗万岁！

2

心理学探索往往会使一个客观研究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人类最高尚的追求归根结底来源于自私的动机和驱力。比方托尔斯泰所宣扬的“爱邻人”，初看上去似乎是无私和富于牺牲精神的，仔细一看，却原来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爱自我。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康德甚至包括柏拉图本人。尽管他们都把理念置于首要位置并且宣扬要为理念服务，可实际上，他们同样难得能摆脱“利己主义”的魔

圈。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与那些最普通的、身上没有才华的烙印，甚至没有机会接触文化果实的凡人们，一般无二。在我眼中，这“几乎”可以说是一条绝对真理。（这里的限定词“几乎”任何时候都不妨进一步做些补充，那就是说：真理同样可能骄傲自大起来，从而滥用自己的神圣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对其加以限定，也就意味着保障自己不受其独裁专制和任意妄为的侵害。）因此，任何人都是利己主义者。我们可以从中得出许多结论：我甚至认为，这一观点可以为“形而上学的结论”，远较迄今为止一直使人觉得很成问题并且由于这一点而更吸引人走向先验主义结论的同情和爱邻人，能提供更多的理由。人们不知何故总以为爱自己比爱他人更易于理解也更合乎自然。这是错误的。而我认为无论前一种还是后一种感情，都同样既不可能又不可解。爱邻人与爱自己比，只不过相对来说比较罕见、不那么普及罢了。可要知道，即使在热带，在自己的故乡，河马和犀牛，也和马和驴一样少见：难道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它们不够自然、不够先验吗？即使对嗜血的多神教徒来说，实证主义也不是必不可少的。如众所周知，许多野蛮人并不比当代学者更少实证精神。比方说，他们把未来的生活当作无疑的实在，与之签订了长期责任书，旨在到彼岸世界后给予清偿。而德国的形而上学论者，尽管浑身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却不愿意做这样的事。这意味着叔本华所教导的、认识彼岸世界的道路是通过爱、怜悯和弃绝自我铺就的，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甚至倒不如说与之相反。对人的怜悯和爱，是形而上学起飞时的障碍。正是由于有了它们，人类的眼光才被固着在充满如许悲伤和痛苦、为爱的活动展开如此广阔领域的大地之上了。如众所周知，唯物主义

者绝大多数都是些善良人，这一情况令许多哲学史家感到困惑。他们一面宣扬物质，一面又对什么都不相信，同时情愿为了邻人做出任何牺牲。所有这一切如何才能调和与理解呢？可要知道，我们在此所面对的，是最清晰、最典型的逻辑推论之一：人之所以爱他的邻人，是因为他发现，上天对尘世间的悲伤漠不关心，因此才毅然担当了善良天意这一角色。假如说他对他人的痛苦漠不关心，那他很容易便会成为一个唯心主义者，而把邻人的命运交付给上天，自己则忙自己该操心的事儿去了。爱邻人和同情心，会杀死一个人身上的信仰，使之在哲学观上成为实证主义者或唯物主义者的。一旦他发觉别人在痛苦中，他的思维便会停止，因为，他想要采取行动。一个人只有当他确信自己已经无事可做、确信自己双手被缚时，他才会开始思想，才会以真正的方式开始思考。也许正因为如此，任何深刻思想皆始于绝望。与此相反，对于乐观主义，对于时刻准备急急忙忙从一个结论跳到另一个结论上去的行为，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称其为是有局限性的、不喜欢怀疑的自满自足，因而也是肤浅的可靠特征。如果一个人提议要我们解决永恒问题，那就说明，他尚未开始思考此类问题；说明他一般说来还尚未开始思考；说明他只不过是在“行动”而已。或许我们根本就不该有所思考：谁能告诉我们我们究竟是否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此外还有：当我们自己的存在对我们自己来说，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都将永远是一个不解之谜的时候，谁会迫使我们好好生活呢？毫无疑问，任何人都不愿意去思考，我在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指逻辑思维。任何已经说出来的意图，都与它没有任何关系。逻辑思维和任何大小便一样，能给人以巨大快感。因此，讨论我们

存在之终极问题的哲学体系，能引起公众对它们持久而又强烈的兴趣。无论这些体系构造得多么巧妙，它们都只要求人们进行合乎逻辑的脑力劳动，舍此无他。但要知道，思考也就等于对逻辑说拜拜；思考就等于过一种新的生活，意味着要参与变化，经常地牺牲自己最宝贵、最顽固的习惯、趣味、喜好；而且，对于这些牺牲究竟能否获得某种补偿这一点，没有一点信心。艺术家和思想家们总是把他们自己表现为必定采取一种给人以深刻印象姿势的思考者：严肃的面孔，深邃的、充满激情瞩望远方的目光和骄傲的气息——犹如一只展翅欲飞的鹰。思考者首先是一个在日常生活而非悲剧意义上的失去平衡者，他摊开双手，两脚在空中乱晃，脸上的表情半是惊恐、半是疯狂，总之，这是一张表现可怜无助、张皇失措的最可怜巴巴的漫画。作为例证——也许，将信将疑的读者早就在等候例证了吧——可以举出屠格涅夫老头，可以以他的散文诗以及致托尔斯泰的最后一封信为例。关于与屠格涅夫的会面，莫泊桑是这样讲述的：只见一个满头银发的巨人走了进来。而我们大家也全都习惯于把我们喜爱的这位导师当作一个伟大、骄傲和安详的族长。他是个巨人，他有一颗银白的头颅，不然的话，我们也就不会向他顶礼膜拜了，也就不会向他学习了。一个有关巨人和银白色头颅的神话，早已流传在人们当中。而忽然间跳出了散文诗，它们是那么贫乏、那么可怜、那么惊恐颤抖，像一只惊弓之鸟。屠格涅夫开导过我们大家，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无所不知——而他怎么会如此张皇失措、如此惊恐万状了呢？他怎么会写出给托尔斯泰伯爵的最后一封信了呢？他是一个富于洞察力的聪明人，难道他不知道他的劝说不会产生任何作用吗？难道他不知道

托尔斯泰伯爵已经把他所有的老题材都已挖到底儿了吗？难道他不知道托尔斯泰伯爵创作的源泉已经枯竭，他得去寻找别的事情干了吗？屠格涅夫当然知道，如果说他仍然还是写了自己的那封信的话，那也根本不是为托尔斯泰、为俄国文学写的。至于俄国文学，她当然不是靠她的支柱们的一两封临终遗书或遗训什么支撑的。处于可怕关头的屠格涅夫，尽管他有着巨人般的身材和满头银发，却不知道说什么，该把自己那行将熄灭的目光投向何处，该到哪里去寻找支柱和安慰。于是，他想起了他为之献出了一生的文学……他想试试看，他为之如此长久而又忠实地服务过的文学，究竟是否愿意哪怕只为他服务那么一次——把他从可怕的、三倍无意义的噩梦中拯救出来。他伸出自己那双干枯僵硬的手去抓那张纸，那上面还残留着一个活着受苦的人精神劳动的痕迹。他给自己这位先前的敌人一个最可意的称号——俄罗斯大地伟大的作家，他回忆自己也曾是他的同时代人，自己本人也曾是俄罗斯大地伟大的作家。这句话他并未大声说出来，他只是说："我不能做得比这更多了"——而假如他居然回忆起自己的功勋来，人们该会多么恼火，该会怎样哈哈大笑呀！他受过文学和上流社会的严格教养，所以，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努力保持一个有着银白色头颅的巨人十分体面的气概。而我们也彻底满意啦！那些曾因果戈理的通信而恼火的人，会怀着崇敬的心情援引屠格涅夫信中的话。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在做姿态罢了。屠格涅夫善于极巧妙地假装，人们认为这是他的一大功绩。世界想要被欺骗，那就让它被人蒙骗好了（Mundus vult decipi-ergo decipiatur）。而实质上，果戈理和屠格涅夫有着同样的体验。假使屠格涅夫临终前烧掉了自

己的著作，谈论自己而不是谈论托尔斯泰的话，他会被人当作疯子的。道德论者则也许会责备他利己主义表现得过分极端了……而哲学呢？哲学似乎得以从某种偏见中解脱。果戈理和屠格涅夫把他们个人的命运置于俄罗斯文学的命运之上，而且，他们是在人们最不可能对自己虚伪和说谎时这样做的……他们究竟是否向我们透露了“谜”了呢？我们是否应当把极端利己主义当作人类天性中一个不可分割的、伟大的——是的，伟大的——属性呢？对道德谴责不屑一顾的心理学探索，究竟是否得出了新的认识了呢？……尽管上文已经作了说明，但人类仍然会照旧把所有想要在“高尚”的激情之下寻找人类动机的企图，视之为“揭露”的。做人意味着屈辱。现如今，人们则会把我对屠格涅夫那封信所做的解释，当作揭露的，无论我如何劝说也无济于事了。

3

论方法学说。某个自然科学家做了这样一个实验：在一个用完全透明的玻璃隔板一分为二隔为两小间的玻璃容器里，一个小隔间里放了一条狗鱼，另一个隔间里则放了各种各样通常是狗鱼之美食的小鱼儿。狗鱼没有觉察到透明隔板的存在，一次次扑向自己的猎物，可是它这样做，当然只能是徒劳地磕碰它的嘴巴而已。狗鱼一次又一次重复着自己的尝试，结果总是无济于事。到后来，眼见它的所有尝试，得到的都是同样可悲的结果，狗鱼便不再打算捕获猎物了。所以，几天之后，当隔板被抽去以后，狗鱼仍宁静安详地在小鱼儿中间游弋，而人们也不必担心它会向小鱼儿

发动攻击了……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是否与此相仿呢？人们有关将“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分隔开来的那条界线所作的推测，其实质或许也是起源于一种实验，根本不像康德以前的人们所想的那样，植根于事物的本质；也不像康德之后的人们所断定的那样，植根于我们人类理性的本质。或许，的的确确是有那么一块隔板的，它使得人们日复一日地想要超越特定认识极限的努力归于徒劳；然而，与此同时，也还有另一种可能，即在我们的生活中，终归会有一段时间隔板被抽掉了。可在那时，我们心中一种信念已然根深蒂固了，那就是特定界线是不可超越的，一旦超越便会大祸临头。而这种信念是以经验为依据的。于是，便不禁会令人想起休谟老牌的怀疑主义，而在唯心主义哲学中，人们通常认为休谟的怀疑主义不过是在康德的批判之后已然丧失任何意味和意蕴的精细的游戏罢了。所做的实验时间再长、再丰富多样，也无法得出任何普遍必然的结论。相反，所有我们那些曾经带来很大实际利益的所谓先验(priori)，或迟或早总会带来巨大损害的。哲学家应当敢于蔑视怀疑主义所带来的痛苦，无休止地坚持进行自己的尝试，不因先前的尝试毫无结果而气馁，也不怕狠狠撞伤自己的嘴巴。也许，使形而上学惨遭失败的原因，恰恰在于表面上无私无畏的形而上学论者，实质上是一些极其善于精打细算胆小懦弱的人的缘故。首先，他们得到了安宁——要知道在哲学的语汇里，安宁意味着最大的幸福。而他们本应给予高度重视的，是长久安宁，哪怕它既没有计划也没有目的也罢。我们怎能知道隔板什么时候会被抽去呢？极有可能的是，正当一个人不再追逐猎物，解答了自己的所有问题，安于小成而不求上进，亦即停滞下来一动不动时，他反倒只

需以一个勇敢而有力的动作，就可以跨越将他与不可知领域隔离开来的那一道施了魔法的界线的。根本没有任何必要使一个人的每个动作都是预先深思熟虑计划好的。这已经是一种即使牺牲也不为过的纯审美要求。就让人徒劳无益、头脑昏昏地用头撞墙去好了，即便这样，只要墙最终还是屈服了，难道说我们便会因此而不大事庆祝自己的胜利了吗？我们的不幸在于我们为自己构造了这样一种幻觉，即只有周密的计划才能为我们的胜利提供保障。天呐，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误解啊，要知道实情无疑与此恰恰相反。天才的所有最杰出的创造都是异想天开、没头没脑、令大家觉得荒谬可笑、毫无必要但又勇敢顽强地探索的结果。哥伦布难道事先就知道大洋彼岸有一块新大陆吗？他不过是因为在一处地方总也坐不住，于是就驾船西驶寻找一条通向印度的新航线罢了。况且，一般来说，无论社会上普遍的偏见有多么深，天才实际上是最没头没脑，因此也就是最不安分的一些人。无怪乎早在古代，人们便把天才与疯子画等号了。天才之所以往往会左右摇摆，其主要原因，在于他缺乏刻苦耐劳的精神（Sitzfleisch），而后者是勤劳肯干的庸常之辈获得成功的保障。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尘世间的天才人物远比《名人录》上所登载的要多得多。要知道一个天才只有当他为人类做出某种有益的事时，才会得到大家的承认。而一旦天才人物不安分的追求未能取得任何能令人感觉得到的结果——而我们应当说，多数场合下正是如此——时，他便只能引起周围人们对他的厌烦和憎恶。假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莱蒙托夫生活在一个对书籍无任何需求的时代的话，他们就不会被任何人所关注。因此，人们也就不会为莱蒙托夫的过早去世而惋惜了。兴

许，还会有另外一个品行端正、稳健持重的公民，对莱蒙托夫那一套永恒而又危险的奇思妙想厌恶至极，而脱口说道：一条狗就该如一条狗那样死去！对果戈理、托尔斯泰和普希金，也同样可以这么说。可如今人们却在颂扬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留下了有趣的著作！……因此肯定怀疑主义无结果也不必要的论点，根本就不值得给予关注，即便这里所指的，是那种不以寻求某种新体系（如众所周知，人们认为此种怀疑主义是有权存在的，而哲学家们甚至坚信，除此种怀疑主义之外不会有别的怀疑主义）为目的的自足的怀疑主义也罢。出于对墙的憎恨，更是出于对人们以之作为永恒之谜的真正谜底而交给我们的所有“理念”的憎恨而以头撞墙，这样一种前景难道还不够迷人吗？可要知道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并不是我们所谓的“理念”，而是最广阔的可能性和未知领域呀?！难道这还不够诱人吗？最高幸福在于安宁吗？我不想争论：说到口味不是不错，就是很好（de gustibus aut nihil aut bene）。……顺便说说，难道说这条原则还不够优越吗？可是，即便是这么一条原则，和许多其他优越原则一样，完全是在偶然中被人发现的，而且，遗憾的是，发现它的不是我，而是契诃夫《海鸥》一剧中一个具有喜剧性的人物说的。此人把两个拉丁谚语给搞混了，结果反倒说出了一个非常出色的综合判断，而此判断只不过由于缺乏一种普遍必然性，才未能成为先验的。我担心教条主义者是不会如此容忍其敌人的口味的。他们很可能会破口大骂、怒发冲冠。因为，教条主义者怎么可以不发火呢？他们手中既没有证据，而他们那备受称誉的顽强和执着，又仅仅只建基于“道德”之上罢了。

4

形而上学论者赞扬超验，却又小心翼翼地避免与之打交道，尼采仇恨形而上学而歌颂大地——弟兄们，让我们永远忠实于大地吧(bleibt mir der Erde treu，o meine Brüder)——但始终生活在超验的王国里。谁想当导师，谁就得宣扬形而上学的观点：它能令一个从未闻过火药味的人有可能英名远扬。可是，由于导师有责任使自己的弟子有可能达到显著目标而又无须冒任何危险且使力量的损耗限制在最低限度，所以，在惊恐不安的历史时期中，当实证主义在人们眼中、在表现生活的全部复杂性上显得不够全面彻底时；当——与此相应——人们觉得把自己表现为正派已不够十分体面时，他们除了诉诸形而上学以外，没有更好的出路。有了好的形而上学理论的帮助，甚至就连无须少年，一个连实证主义的十分之一都不到的小青年，也会蓦然间具有一种神秘有趣的、无所不知的智者的仪态。他甚至有权鄙视实证主义——而更重要的是——也有权鄙视实证主义者。在整整一大批凡俗之辈——甚至差不多是无缘问津学术书，因此也不懂任何理论的整个人类面前——他成了佼佼者。而所有这些辉煌的成就，是通过阅读十几本当然稍稍有些枯燥乏味并不怎么有趣的著作得来的。当然，弟子和导师都对超验怀有深深的敬意，因为，它能在这里，在这个对所有人都无可置疑的世界上，而不是在一个充满问题的生活中，给我们的自尊心提供如此宝贵的特权。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里，一个少年犯不着对早在少年时代即已征服了整个世界的马其顿国王

亚历山大表示羡慕。如今,借助于书籍,人们不但可以征服地上的国家,还可以征服整个宇宙!形而上学是帮人绕过可怕的生活经验的一种伟大的艺术。正因为如此,形而上论者也可以被称为高度的、主要的(par excellence)实证主义者。他们并非如他们所断言的那样,鄙视所有经验,而只鄙视危险的经验,他们身上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适应环境的能力是那么发达,以至于早在敌人出现以前,就已为自己做好了准备。而且,他们采取了最安全的斗争手段,此即英国人所谓的"仿造、模仿、拟态"。转意为:"随世浮沉"(mimiecry)。超验刚刚逼近,形而上论者便以几乎是条件反射似的、不需付出任何意志的努力,换上了超验的色彩,变得认也认不出来了。自由意志、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难道有谁会怀疑此类以及与此相似的判断不是实证主义的吗?而如此易于分享"形而上学需求"的形而上论者们,难道会不喜欢超验吗?他们又如何能不与尼采及其对超验的仇视相和解呢?既然超验差不多已经成为尼采日常生活中的空气了,因此规则是为弟子制定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即使没有我,导师也知道的——谁要是想当一名真挚的形而上论者,谁就应极其小心谨慎地避免进行充满危险的实验。席勒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悲剧怎会给人以快感呢?他的答案,如果"用我们自己的话说",是这样的:"只有从舞台上看戏,才能从悲剧中体验到快感。"而要想喜欢超验,同样也必须只从舞台上或是哲学家的书本里来观照它。而这,就叫作唯心主义——这是喜欢喋喋不休的人类迄今为止所发明的最美妙的一个词儿。

5

诗人是天生的(Poëtae nascuntur)——人是多么奇怪的生物呀！一旦他有所不能，就会断言，客观不可能性是有的。在电报和电话尚未发明的上个世纪，人就敢于充满自信地说什么欧洲和美洲是不可能对话的。而如今这个已经能办到了。我们不会培养诗人，于是就说，诗人是天生的。假如我们强迫一个孩子学习从远古至近、现代以来所有各类文学典范作品也无法把他培养成一个诗人，这正好像无论我们在欧洲如何狂喊乱叫，美洲的任何人也不可能听见是一样的。要让一个人成为诗人，根本没必要以公认的方式来“培养”他。兴许，把书本对他隐藏起来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或许，得对他实行某种手术，而此类手术在我们眼中，只不过对他构成一种危险甚或可能置他于死地，那就是，比方说，打破他的脑壳，或是把他从四层楼上丢下去。我明白这类手段有多么危险，所以，我绝对不想推荐它们，从而取代旧的教育方法，以供公众使用。然而，问题并不在这里！你不妨读一读伟人和诗人传。除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及其他三两位有学问的父辈和积德行善的母亲的正派思想家外，杰出人物当中，任何人都无法夸口——也许在此我该说的是——任何人都对正派教育叫苦连天。在他们一生中曾经起过决定性作用的，往往都是一些兴许被我们的理性称为——假如理性即使是在它的反对派拥有无可争议的成功时，也敢于大胆提高自己的嗓门的话——荒谬绝伦的偶发事件。这类事件有点儿与被凿穿的颅骨或从四楼跳下来相仿——这么说不光是一种比

喻，而常常是在直义上——天才往往正是如此这般开始工作的。有时，这种工作可以为人所见，而多数情况下，是隐蔽进行的。而我们却断定诗人是天生的，并深信，这一非同寻常的真理是如此之崇高，以致都无须对之加以检验核实。

6

阿波罗暂时还不需要
让诗人充当神圣的供品，
他漠然地沉浸在
喧嚣尘世的忧患之中。
他那神圣的竖琴默不作声，
灵魂啜饮着冰凉冰凉的梦境，
也许，他不过是最渺小可怜的一个
在世界那渺小可怜的芸芸众生当中。

皮萨列夫早就对这几行诗恨得咬牙切齿了，可以设想，这几句话假如不是出自普希金之手，整个批评界兴许早就对它群起而攻之了，恐怕连它的作者也不会放过的。因为我们怎么可以只谴责作品却为其作者辩护呢？这几句诗是多么可疑、多么奇特呀！诗人在未受到阿波罗的召唤以前，他不过是世上凡人中最渺小可怜的一个。普通人在摆脱了必要或是自愿劳动的闲暇时光里，总是能给自己找到多少有趣和高尚的消遣的：打猎、看展览、观剧，最后，还可以待在家里休息。诗人却不然，他不善于过正常的生活，

阿波罗刚从劳务中解脱出来，他就开始做一些下流而又无谓的事，而把祭坛和奉献丢诸脑后。抑或干脆放任自己无所事事，这是缪斯的所有宠儿通常用以消磨时间的方法。必须指出不光诗人，而且，一般说来，所有作家、演员和艺术家们，多数人的生活方式都非常不好。你们不妨回忆一下托尔斯泰伯爵在其《忏悔录》及其他作品中，讲述的五十年代文学界优秀代表人物的生活故事。而要知道，他所讲的，可都是实话。也就是说，与普希金在其诗中讲的一样。作家只要他是在作文、思考和写作，他终归还有点价值；一旦他不再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就是人们当中最渺小可怜的一个。于是，问题就来了："为什么阿波罗和缪斯那么糊涂，他们非但没有赐给品德高尚者以优异的才华，反而让自己宠儿的行迹有涉于罪过呢？"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神——尽管是已被推翻的——有任何不良意图。阿波罗喜欢品行端正者，可显而易见的是，品德高尚者往往都是些绝对没指望的庸常之辈，根本不适于做艺术的献身者。所以，如果品德高尚者中有谁想要侍奉光明的诗歌之神的话，他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自己的美德说再见。人们通常很少能想及这一点，他们往往以为，只有品德高尚者，才最易于赢得阿波罗的欢心和仁慈。而由于在尘世间人们一般把热爱劳动当作最重要的美德，所以，他们总是在尽心竭力、手不释闲、没日没夜、彻夜不眠地干活。而，当然啦，他们活儿干得越多越没用。他们弄不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就开始怨恨、发怒、抱怨不休。他们甚至会把他们想要为之服务的神圣的艺术忘在脑后，丢开忘恩负义的劳作，而沉湎于懒惰及其他罪孽中。还有的时候，当一个人自己包括他的所有亲人，都绝对认为他不配享有神的仁慈时，那期待已久、

总也不理他的召唤的缪斯，却突然间开始造访他了。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其他许多大诗人。似乎，终于成功地把阿波罗给骗了的，就只有一个席勒。但或许是他骗了给他写传记的人：德国人太轻信，骗他们那真是太容易了。比方说，德国人就从不认为席勒在写作时喜欢把脚搁在冰水里的习惯有什么奇特之处。他们也不理解，假如席勒生活在赤道——那里的水贵比黄金；那里的诗人不光不能每天洗脚，而且，还并不总是能尽情尽兴地喝足水——的话，也许，波扎侯爵的话语里，崇高的语调便会流失掉一半这句话，究竟包含有什么意味。或许席勒同样也不是什么无缺陷之人，既然他必须借助于人工的激发，才能写出崇高的话语来。总而言之，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相信普希金的证言。诗人一方面是优选者，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当中最渺小的一个。假如你愿意，那么尽可由此推导出一个十分抚慰人民的结论，那就是：渺小可怜的人根本就不是什么百无一用之人——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他们不适于当官或是当教授，但在帕尔纳斯及其他高处，却有人张开双臂来迎接他们。罪过是阿波罗赏赐的，而美德呢，如众所周知，它是如此自满自足，以至于根本不需要任何人的赏赐。悲观主义者们是在为什么而战呢？莱布尼茨说得太对了：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可能有的当中最好的。如果是我，我甚至建议去掉那个限定词——“可能有的”。

7

俄语作家笔下的永恒的女性(Das ewig Weibliche)——普希

金和莱蒙托夫不怕女人，他们都喜欢女人。忠实于自己天性的普希金，一生中爱过多次，总是不断歌颂着他在彼时彼刻沉湎于其中的那种爱情。当他为酒神的女祭司而入迷时，他便歌颂那些女祭司们。而一旦结了婚，他就把他年轻时曾迷恋过的女性统统都忘光了，而开始万分珍惜谦恭温顺的女性——他的妻子。或许，恐怕就连综合理性也搞不清，究竟该如何分析普希金那种类繁多的爱情。究竟哪一种爱情更好？而不从中选择一种又不行，因为不然的话，统一性自何而来呢？至于莱蒙托夫，他的情况比普希金好不到哪儿去。莱蒙托夫对女人总是骂不绝口，然而正如别林斯基在与莱蒙托夫一见之后就指出过的那样，莱蒙托夫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莫过于女人啦——而且，他爱的并不是特定类型特定精神气质的某种女人，而是爱所有有趣且迷人的女性——贝拉、可爱的梅莉、塔玛拉，总而言之，所有女性，不论其属于什么种族，使用什么语言，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地位。而道德论者（抑或综合理性——反正它俩是一回事儿，你把任何一位综合哲学家的皮剥掉，都会发现他是一个道德论者）对于莱蒙托夫，同样无可奈何。每次当莱蒙托夫有所爱时，他都会信誓旦旦地证实，他爱得既深又符合道德，他讲述这一切时，是那么热情而又真挚，以致你不忍心去谴责他。敢于出面揭露他的就只有弗·索洛维约夫一个人。弗·索洛维约夫根据其所违反的各种道德法则起诉普希金、莱蒙托夫，他甚至断言，判决他们的，其实不是他本人，他本人只不过是命运的代言人。无论莱蒙托夫还是普希金，都以其浮浪行为而理应去死。然而，事实上除了弗·索洛维约夫外，任何人都不曾染指这两位伟大诗人的英名。当然啦，托尔斯泰伯爵不在此列。托尔斯泰伯爵最无法

原谅的，是普希金放荡的生活方式。他甚至认为对普希金实施判决，都无须征得命运之神的许可。托尔斯泰伯爵身上的道德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他无须任何帮手，就能对付得了如普希金这样的巨人。当需要做某件大事时，托尔斯泰身上的道德力量便会增强。对于那些性格软弱、很容易就肯让步的对手，托尔斯泰身上的道德无须经过长久谈判，当下便会给予原谅并免于对其起诉的，但对于傲慢和自信，它永远不会给予宽恕。假使把托尔斯泰的判决付诸实施的话，人们为普希金树立的所有丰碑便早就垮了。托尔斯泰之所以谴责普希金，主要因为这位诗人对"永恒的女性"的癖好。托尔斯泰在此类场合下是执着的。他所承认和理解的就只有那种以家庭为基础和目的的爱情。别样的爱情他是不会承认的。在他看来，唐·璜似的爱情不啻为死罪。我们何不回想一下列文有关可爱却堕落的人和焊接的那段议论呢？只要能听不见斯蒂瓦·奥勃伦斯基的故事，列文宁愿闭上双眼堵住双耳。他恼火、他气愤，他甚至把他必须具有的对堕落者的同情也给忘了，他粗鲁地把堕落者称为"牲畜"。在托尔斯泰伯爵那里，"永恒女性"的观念与诱惑、罪孽、蛊惑以及巨大的危险性密不可分。既然有危险，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做的，就是要加以提防，也就是说，要尽可能离得远远的。可要知道危险性是这么一条龙，它纠缠着尘世间所能有的一切稍许重要、重大而又迷人的东西。况且，无论一个人多么小心翼翼，命运迟早都不会放过他，总归会与那条龙相遇的。要知道这可是一条公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都喜欢冒险，因此也才会勇敢地走向女人。为了自己的勇敢，他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却潇洒而且自由地活了一生。可实际上，假如他们想要偷窥一眼命运簿

的话，他们本该能适时避免悲惨的结局。但他们宁愿不假思索地依赖自己的幸运之星。托尔斯泰是我国文学中（这里所说的与果戈理无关）不怕生活也不信任生活的开先河者。他也是起而公然宣讲道德的第一位作家。而由于宣讲道德需要有社会舆论和个人的自豪感，所以，他虽然迎着危险上了，却多一步也不肯往前迈。正因为如此，他才逃避女人、艺术和哲学。在他看来，爱本身（an sich），亦即非指向家庭的爱，和不受制于实际目的的思维本身即智慧，以及为艺术的艺术，都是必然会戕害人类灵魂的最可怕的诱惑。而当沉湎于思考的他走得太远时，他便会感到极端恐慌。“我开始感到我即刻便会发疯的，于是，我便动身到巴什基尔人那里喝马奶去了。”此类及诸如此类的供白，您在其著作中经常可以碰到。可要知道抵御诱惑没有别的办法，必须一下子打断自己的思路，不然的话就来不及了。托尔斯泰伯爵凭着他天生的本能，才得以明哲保身，他的本能总会适时提醒他摆脱困境的可靠出路何在。假如他没有这么一种自制力的话，他兴许早就和普希金或莱蒙托夫那样不得善终了。当然，他或许真的能从自然那里打探并向人们讲述几个重要的秘密，从而不再宣扬节制、恭顺和简朴了。但这“幸运”却落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上。如众所周知，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道德打交道的过程同样也十分复杂、夹缠不清。他整个被疾病和环境给完全败坏了，以至于就连道德法则也只能去俯就他。精神和肉体的卫生学，只适合于身体健康者，而对病人，除了害处，没有任何好处。陀思妥耶夫斯基越是与有关道德的崇高学说打交道，越是被搞得一塌糊涂。他想要尊重女人身上的人性而且只尊重其人性并且尊重到了那样一种地步，以致他对任何女人，

无论她长得多么丑陋，也无法做到无动于衷。费多尔·卡拉马佐夫及其与利扎韦塔·斯梅尔嘉夏的故事这样的形象，又能在谁的幻想中产生呢？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骂了费多尔几句，而他这样做，所根据的，是我国文学批评界现存的习俗，而他的这种做法，却被认为足以打消对他的任何怀疑了。但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法庭。假如一个作家向我们报告，说以其丑陋能令我们忘掉她是个女人的丑八怪是没有的，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讲述费多尔·卡拉马佐夫，丑陋的白痴、半系动物的利扎韦塔·斯梅尔嘉夏的故事，正是为了说明这一独特思想的，那么，面对这样一种“创作”，而又保持习惯的信任感，是极不适当的。而要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趣味，则是另一回事。我绝不想要证明，说我们这些倾向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观点，善于只在有趣、美丽而又年轻的女人身上发现永恒的女性的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会具有无论什么样的优势。当然，没人会禁止我们本着自己的趣味生活，甚至也没人禁止我们像托尔斯泰那样，把一些女人斥为畜牲。谁能赋予我们权利要我们断定我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高、更好呢？假使要诉诸“客观”评判的话，那么，全部证据会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更好一些，至少他比我们见识多、看得远。在我们一无所见的地方，在哪怕是歌德本人也会掉头不顾的地方，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善于找到一些特殊的意味，发现永恒的女性。利扎韦塔·斯梅尔嘉夏并不是什么畜牲——假如是列文便会这么说的——而是一个女人，一个能在哪怕是某个瞬间唤醒人身上的爱情的女人。可我们却以为她一文不值，甚至比一文不值更糟糕，因为她能引起人的厌恶。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出了发现，而有着细腻感受力的我们却闹了个

大笑话?! 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畸形的、非正常的感觉使他具有一种伟大的感受力，而同样的东西却是我们那高尚的道德无法教会我们的……这一次和往常一样，通向伟大真理的道路，难道不是通过丑陋铺就的吗？唯心主义者们是不会赞同这种观点的。他们不无道理地担心，一个人非但无法抵达真理，反而会在泥淖里裹足不前。唯心主义者们都是些好精打细算的人，而且，根本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愚蠢，假使我们能认真考虑一下他们的思想的话。

8

新思想，哪怕它是自己的，也并不是很快就能赢得我们的好感的。对它们首先需要习惯。

9

观点——每位作家，或许还包括每位思想家、每个有教养的人，都认为必须具有一种恒常的观点。攀登到一个高峰上以后，直到临终前，他都不会下来。他把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所看到的一切，都称为现实、真理、真实和善；而他看不见的东西，他就不予承认。我们不能因此之故而过分责备一个人。况且，在观点之间来回徘徊，每次都从一个高峰移到另外一个高峰之上，这样做也的确没有什么乐趣可言。要知道我们身上并没长翅膀，而“长了双翼的思想”这种说法，也只不过是一种漂亮的比喻，当然啦，如果它不涉及逻辑思维的话。确实，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发现有一种非比寻

常的轻盈感，可要知道，这种感觉是以十足的幼稚同时又要避免说出无知的话为代价换来的。谁要是真的需要知道点什么，而不光是为了拥有一种“世界观”，谁就得无视逻辑的存在，并不受思想的诱惑。于是此人终其一生都不得不从一个高峰登上另一个高峰，而只在必要时到谷底里歇一歇脚。由于广袤的地平线会导致错觉，所以，为着要彻底认识某个对象，就必须走近前来，碰一碰，摸一摸，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从各个方向仔细地瞧一瞧它。即使不能采取别的方式，那也得根据自身习惯和体位来采取行动——弯腰、蹲下、拿大顶，总之，采取最不自然的姿势。既如此，那是否还有什么观点呀以及平常的观察点呀什么的吗？人的身体越是灵活敏捷，越是不重视身体的自然平衡态，越是频繁更换自己的岗位，他所看到和知道的事物也就越多。相反，假如一个人居然以为，从某个高峰之上鸟瞰世界和生活是最方便的话，那他就没指望了，他永远也不会有所知的。我甚至要说：他其实什么都不愿意了解，而只为自己的舒适忙活，而决不是为了他的事业。但他仍有可能取得名望和成功，并以此而雄辩地证实他自己的“观点”。

10

名望——人人给他一根线，光身乞丐有衣穿。当然，穷得连多余的一根线也找不出的人是没有的，任何人也不会吝啬得连一根线也不肯给没衣穿的人，即使对方有衣穿——总之，是随便碰到的什么人。我们应当认为，正是那些穷人，才总是乐于把自己的赤贫和简陋丢在脑后、自在逍遥，尤其乐于响应第一声召唤，甘愿献出

自己最后的几根线。而且,他们更愿把自己的最后几根线送给富人,而不愿送给自己那位穷得叮当响的兄弟。要知道恩赐一个富人,要做这样的善事,自己首先得是个富人才行。而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名望会如此易于制造的原因所在。一个爱慕虚荣的人,其所要求的不过是要大众羡慕和崇敬他罢了,而大众在这件事上,难得会拒绝什么人。嗓子是自己的不是买来的,手掌又结实,又怎么能不嚷叫几声、不拍手叫好呢！尤其是你这么一嚷嚷,那未来英雄的脑袋便会晕乎乎的,可他毕竟是个英雄,上帝知道,是个高居于万物之上的英雄,而不是一贫如洗的世上最差的什么人。一个被钉子钉住备受屈辱的小市民,在此之前,一直因其嗓门而得以置身于选区里的小市民,突然发现他的嗓子还值几个钱,颇受人看重哩。和他平等的人里,任何人从未重视过他的什么判断,因为他和他们一样,要知道实际上都一文不值呀,而如今差不多有七大都市,情愿为了他们而吵闹不休,就像当初为了争取荷马故乡的名义权而争吵一般。于是乎小市民满意了,大声疾呼地嚷叫了起来,甚至情愿做出力所能及的物质奉献。而英雄也满意了:欢呼声越大,他对自己便越是自信,对自己的天赋使命越是充满信心——而很快便会把他们的名望和财富究竟由什么成分组合而成的忘得一干二净的英雄们,还有什么能不相信的呢！要知道英雄们通常总是深信他们走到舞台上来并不是为了抚慰穷人,而是为了造福人类。假使英雄们能够想及他们当初的处境,想到当初他们如何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期待着第一个掌声、第一声嘉许;想当初他们如何在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穷人面前,张口结舌胆怯心虚的样子,他们兴许会缺乏勇气,而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放声宣扬自己的功

勋了吧。然而，我们对斯宾塞记忆犹新，尤其忘不了他的适者生存的法则，而这也正是许多真诚相信自己洁白无瑕、品德高尚的人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原因。

11

为正义一辩——缺乏经验和洞察力的观察者们，往往把正义当作一个负担，认为它是某些优选者们，出于“对法则的尊重”或出于其他高尚而又不可索解的意图，自觉自愿将它们担在自己肩上的。可实际上一个正直的人不光是有责任，而且还拥有权力。当然，有时，在另外一种场合下，当法律与他作对时，他也仍然不得不有所行动。然而，毕竟在多数场合下，法律会多么经常地给他以支持呀！只要他能不违反规则，他可以想多么冷酷就多么冷酷。不但如此，他还可以把自己的冷酷说成是自己天大的功劳，因为他所做的一切，不像他人那样，有着自己个人的意图，而是为了神圣正义的名义。总而言之，无论他做什么，既有制裁，他就会把自己的行为，当作是功劳。除了功劳还是功劳。虚心妨碍他过多谈论自己，可实际上，假使他想要坦诚直率的话，他准定会为自己大唱赞歌的！当他回忆自己所做过的事情时，他会频频夸耀自己，只是不敢大声，而是自言自语。美德概念本身的要求是：一个人应当为自己的德行而喜悦，并要尽可能更多地回想它。可在这样做了以后，人们又会断言，做一个正直的人——太累了！关于别的美德，我是不会这么说的，但能够说明何为正义的，也许不光是迷失于“思想”阐释的社会这一实用意图，甚至也包括纯粹自私的动机。还有的

时候，在重大利益驱使下行动，也同样值得赞许，因为事后你可以终生骄傲而又自信地运用被道德和社会舆论加以证明的其他权力。您不妨瞧一瞧一个尽自己力量向赈济穷人协会捐财的德国人！对于乞丐，他连一文钱也不会多给，哪怕那乞丐就在他眼皮底下饿死也罢，而他在这样做时反倒认为自己正直。为了永久使用最高原则的核准权，必须缴纳适当的税款。正因为如此，正义也才能在有文化的、好精打细算的民族中大行其道。俄罗斯人尚未进化到这一步。俄罗斯人害怕正义所能加在一个人身上的责任，他们不知道，正义还能赋予人以庞大的权力和优势。俄罗斯人总是与良心过不去，而良心对于俄罗斯人来说，远比正义对于一个有道德的德国人或英国人更重要。

12

要想摆脱令人生厌的真理，最可靠的手段就是不再如通常那样，对其表示尊重和崇敬，而是以熟不拘礼甚至虚与委蛇和鄙视轻蔑的方式来对待它。比方说，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做的那样——他把善、进步、自我牺牲、理念等诸如此类的语词，统统放在了括号内——仅此一点，我所能够获得的就比一系列最辉煌、最有学问的证据多得多。只要你是在为一种真理的权力而争论，那就说明，你仍然还在相信这一真理，对此，每个人，甚至就连感觉最不敏锐的人，也感觉得到。可是，一旦你觉得对其甚至不值得去争论，而只是偶然才会针对它漫不经心地或戏谑嘲弄地说它几句的话，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显然，它已经不再令你害怕和尊敬

了:这时,你可就有的可想了。

13

四堵墙——人们批评脱离现实生活而空谈理论的哲学,这是完全正确的。脱离实际的思想家往往为自己杜撰一些与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绝对有关的见解。他所感兴趣的都是有关世界市场的现状、是否存在世界精神、无线电报、阴间生活、穴中人、理念的善等无穷无尽的问题。他的主要任务是整理自己的判断,使之不致有内在矛盾,使之至少从外表看与真理相像。这种工作兴许也不是根本没有趣味的,它多少有些吸引力,但归根结底,其所得结果,毕竟是十分贫乏的。要知道与真理相像的判断毕竟还不是真理;而且,一般说来它们甚至与真理无任何共同之处。其次,那些居然敢于放言万物的人,最有可能反倒什么都不懂。正如天鹅既会飞又会走还会游泳,但却飞得不好、走得不好、也游得不好。书斋里的学者,受其书斋的四堵墙所限,除四堵墙外什么也看不见,而又不愿意谈论这四堵墙,他不认为这四堵墙有什么意义,甚至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然而,假如他偶然感觉到墙的存在并谈到它的话,则他的话肯定具有出人意料的巨大意义。假如把书斋换成监狱,有时也会发生同样的事。监狱同样也是四堵墙,可你要不思考它是不可能的。一个处于监狱的四堵高墙里的人,什么事情不会想呀——荷马,希波之战,未来的永久和平,以往的地理大发现——一切的一切都会与这四堵墙产生联想。于是,在心中,平静单调的书斋式情绪,便会被处于不自由的监禁下的伟大激情所取代。此

人虽然依旧看不见整个世界，并且和它也没有任何接触，但他却并没有昏昏欲睡，也不像以前那样幻想一些灰暗的世界观，但他却精神焕发，心灵的全部力量都在沸腾。这样的哲学值得一听。但人并不以观察力敏锐见长。假使他们触目惊心所见的，就只是孤独和四堵墙的话，他们就会说：这是书斋。按照他们的观点，生活只在喧闹声不绝于耳、充满许多外在可感活动的市场上，才有可能。难道不是这样吗？在充满五光十色、变化多端人群的市场上，人们往往会终其一生都沉醉在怡人的梦境里，而伟大的灵魂，却是在绝对孤独的状态下工作的。

14

斯巴达人把奴隶作为向高尚青年灌输教训和规则的例证：一个人一旦看见醉汉是多么丑陋，便永远不会受酒的诱惑。这方法妙极了——无可争议。可是，我们这些 20 世纪的人，又该怎么办好呢？没有奴隶你怎么灌输呢？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才搞文学艺术。长、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里，都描写了醉鬼、浪荡汉及所有背离了德行之路的人，并把他们描写得如此不堪和丑陋，以致任何读者都会因而打消其向恶的念头。只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艺术家们如果不是过分直率就是过于卖力了。他们不是像古代斯巴达人那样，尽其所能地把奴隶表现得尽可能更使人憎厌，而是力求如实表现罪恶。现实主义占了上风！你倒是想想看，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一种罪恶在作家的描写中，比其实际情形略有或是更加丑陋得多，那又有什么不对呢？难道人们发明正义仅仅是为了

保持一切甚至包括恶吗？要知道是恶那就得铲除，而且只能是连根铲除，应当一劳永逸地宣布恶处于法则，甚至处于道德法则的庇护之外。斯巴达人并不认为有必要与活着的奴隶客套，而我们的小说家们却担心在对待自己所想象的醉酒的奴隶方面，自己会显得不够诚恳！这好像是出于什么人性之类的……要想让人相信这样一种解释，一个人必须多么幼稚才行呀。然而，对他的话，大家全都笃信不疑，只有托尔斯泰一个人不信，而且，就连他也是直到老年才猜到，人性在此只不过是一个借口，我们之所以表现恶（不是在通俗小说而是在经典作品中），根本就不是为了让读者恐惧。"恶"这个词在当代读者心中所能引起的，不是憎厌感而是好奇心和求知欲。也许，人们驱逐它是徒劳的，正如人们曾经驱逐过尘世间许许多多好的东西一样？！也许，人们倒是该好好地端详一下它，或许人们还应当向它学习点什么？！……或许吧？！……这样的或许难道还少吗？正是以如此这般的"或许"为由，人们多少连道德也完全给抛弃了，而愤怒的托尔斯泰几乎是一个人在形影相吊。在文学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现实主义，而醉酒的奴隶在胆怯的读者心中，所能引起的，是羡慕，以致搞得读者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好了：是相信传统法则呢？还是听从语言大师的号召好呢？醉酒的奴隶成了一种理想！我们活到什么地步了呀！停留在利库赫[①]的旧法则上岂不更好？我们为了进步所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一点？

许多人以为是太大了。我在此所说的，已经不是在指托尔斯

---

① 利库赫（公元前9世纪—前8世纪），古希腊斯巴达人的立法者。——译者注

泰伯爵了，他的论断，由于其所具有的极端性，已经没有什么人会把它认真当回事儿，尽管人们仍然把他称为伟人。但即使是伟人也不可以为所欲为、无所不为，假如他自行解脱套在他头上的笼头，社会舆论也有足够多的手段把它给重新戴上，甚至无须诉诸暴力。谁会说“舒依查”[①]，谁会想虚无主义，谁又会侈谈无政府主义呢？这样的话刚说了没几句，喏，一堵墙出现在你面前，你就是嗓门再大也奈何不了它。任何人都不会认真对待托尔斯泰的议论的，这是一个事实，对我来说，这早已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任何一个中等水平的“记者”，也比这位俄罗斯大地伟大的作家所具有的影响力大。而事情本该如此。如今，托尔斯泰思考的问题，与人们当中的任何人，都没有任何关系。托尔斯泰早就从我们这个世界消失了，而什么地方究竟是否还有一个彼岸世界，托尔斯泰伯爵在彼岸世界是否依旧存在——这样的问题，谁又能回答呢？“托尔斯泰既写书又写信，所以，他还活着”——这个一度曾如此令人信服的结论，如今未必还能对什么人发生作用。尤其是当我们注意到托尔斯泰所写的东西时，更是如此。托尔斯泰在其最新写的若干封信中所表达的观点，从普通人角度看，绝对不具有任何意义。令人遗憾的是，我手头没有这几封信，它们多数登在外国出版物上。但这几封信所给人的总的印象，却可以用几句话来给予简短归纳：托尔斯泰在宣扬唯我论。这也就是说，托尔斯泰在进入暮年之后，在经过无以计数的想要爱邻人的尝试之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不仅不能爱邻人，而且，根本就没有邻人。整个世界就

---

① 按古语意为“左臂”“左手”。——译者注

只存在着一个托尔斯泰，而且，世界实际上也根本就没有，有的只是托尔斯泰伯爵而已。这种观点的荒谬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不值得给予反驳。况且，如众所周知，我们根本不可能对其给予反驳：难道你能只承认逻辑结论的非必然性吗？唯我论从早年开始就如影随形地跟随着他，但当时的托尔斯泰还不懂得该如何对付纠缠不休、荒谬绝伦的思想，所以，总是竭力漠视它的存在。如今他需要起它来了。人年龄越大，越易学会如何把荒谬思想实用主义化。在比较而言并不很久以前，托尔斯泰还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基督只是教人不要做蠢事。"除托尔斯泰外，谁敢如此冒险对福音书作如此这般的阐释呢？为什么除托尔斯泰外的所有人都清楚知道，这句话是对基督及其学说最大的诋毁呢？但从托尔斯泰方面说，这是想要从唯我论、其中也包括逻辑中拯救的最后一次绝望至极的努力：甚至就连基督，其之所以会向人显现，也是为了教会人以健全的理智。这也就等于说，对于"疯狂"的思想，人们可以良心平静地把它驳倒，优势依旧属于可解的、健全的、聪明的判断。业已为善和理性清理了地基。要知道善是无从解说的，它自身就是可解的。假如世上只有善，也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不会有原初和终极问题了。正因为此青春才永不提问。它有什么可问的呢？难道夜莺的歌声、五月之晨、丁香花、欢声笑语及青春所有的其他术语，要求人们给予阐释了吗？相反，任何阐释都可以归结到它那里去。真正的问题是在人与恶首次接触时产生的。老鹰把夜莺啄死了，花儿凋谢了，笑嘻嘻的少年被冷峻的鲍里亚取代了，那时，我们才会惊恐万状地提问。"喏，这可不就是恶么！老头们说的可都是实话！无怪乎就连书里也把我们的大地称作悲伤的泪谷！"而既然问

题已经提出来了，那就不能，况且也没必要急于给予回答。更别说想要棋高一着地预想到它了。夜莺已死，它再不会歌唱了，而曾经听到过它的歌唱的人也已冻僵，再也听不见它的啼鸣了。这一情境的荒谬性是如此显而易见，只有显然是想要无论如何也要摆脱这一问题的人，才会企求理性的答案。而答案将是也只能是荒谬的——您如果不愿意要，那就请停止提问。而您仍然想提问的话，那就请您预先为与某种和唯我论或现代现实主义相仿的东西"调和"做好准备吧，我不知道哪一种结果更好些，这只与趣味有关。我们的思想在两端论法的泥潭里裹足不前了，而且，一般说来它也不敢于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我们放肆嘲笑哲学，并且只要可能，就尽量避免恶。但大家几乎都感觉到了这一处境令人难以承受的压迫。每个人都出于自己的恐惧而竭力借多少比较机智的理论之助，而爬到彼岸来。只有不多的几个勇敢的人，才敢于道出真相，可是，通常他们总难以为别人所理解，别人甚至不相信他们的真诚。当人们从作家的话语里感觉到他们的痛苦是如此深刻、如此强烈，以至于形同谴责，也不允许真相提高自己的嗓门。于是人们开始大谈其处境的悲剧性，做出悲哀的姿态，发表在这种场合下十分体面的演说。而那些要求更加严格、知道此类话语和姿势很不适宜，但同时又不善于迫使自己长久思考别人之体验的人，夸张地做出一副严峻的表情："我们，他们说，深刻地体验到了，但不想发现我们的深层感情。"他们实际上什么也未曾体验到，他们只是很想让别人以为他们是非常敏于感受的，而只是由于生就的羞涩心理，才在严峻的面具下隐藏起了自己的感觉罢了。有时，这甚至在一流作家群中也会导致极为有趣的怪事。如阿纳图尔·法朗

士——迷人的讥笑的发明者，以其特有的方式要人们相信，他能感受并理解一切，而他之所以不号啕痛哭，只是由于一个男人即便面对极度恐惧也不宜哭鼻子。就是他，在其所写的某些小说中，担当起了反对犯罪的犯罪牺牲品的辩护士这一崇高的角色。“我们这个时代”，他说，“出于对罪犯的怜悯而忘记了成为其牺牲品的那些人的痛苦。”我要重申的是，这是表现对当代探索缺乏理解的最奇特的例子之一。的确，我们这里的人们常常谈论一般怜悯心，其中也包括对罪犯的怜悯心问题。就此而言，阿纳图尔·法朗士远非唯一一个以为我们最重要最突出的特征，就在于异乎寻常的感受力和软心肠的人。可实际上，尽管怜悯感无可争议地更适于站在受害者一方，但促使现代思想者转向罪犯的却不是这种感情，而是好奇心，也可以说，是求知欲。几个世纪甚至数千年以来，人类思想徒劳地在善之中寻找伟大生活之谜的谜底。然而，如众所周知，除了神正论和否定神秘存在及其可能性的理论外，人类什么也没找到。以幼稚乐观主义著称的神正论早已以其机械论使人类腻烦至极了，这种理论证明，人类生活并不具有足够现实性，以至于有关其出现和消失的问题，与表面看更具有可信度、但人们却不愿意相信的能量和物质保存的问题一样，同样具有存在权。可是，如众所周知，不愿意相信却连任何一种理论也抵挡不住。总之，善辜负了人们在它身上寄托的希望。而理性所带来的成果同样少得可怜。于是，疲惫至极的人类丢开了往日崇信的旧偶像，而把恶和疯狂抬到了宝座上。笑眯眯的阿纳图尔·法朗士又是争议又是证明，他的证明非常出色。可是，有谁不知道他的证明而他的证明又为谁所需呢？让他自己去笑好了，让他在对自己优越性的意识中

扬扬得意吧——我们这一代已经不会重新回到老路上去了。我们的子孙们也许会被我们所承担的任务吓慌的，会把我们叫作“败家的父辈”，而重新开始积聚各类精神和物质的财富。后来人会重新对理念、进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树立起信仰。至于我个人，那么，我可以说几乎毫不怀疑这一点。唯我论及对无根据性的崇拜是不会永久存在的，主要是它不具有连续性。生活中最终和最后的胜利，如旧式喜剧中那样，将属于善和理性。历史已经有过许多个与我们这个时代极为相似的时代，如众所周知，它能极其出色地对付像我们这样的时代，能够从大地上将一切要求过分严格、过分精细，其无所不知有所夸大的东西，扫除殆尽，并继续在求知欲驱使下进行的各种不够恰当的尝试之后，蹑踪而来。天才通常总不外乎不是没有子嗣，就是只有白痴。无怪乎大自然总是那么庄严肃穆：它将自己的秘密很好地掩盖住。我们可以假设，我们不必为此而惊讶，只要回想一下大自然在利用自己的手段方面，是如何一塌糊涂就够了。要知道，任何一度曾把大地的统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暴君和大恶之人，也未曾如自然那样，表现得如此冷酷和毫无心肝。只要稍不合它的意，稍一违反它的计划，就会把成百上千种最严厉的惩罚加于过失者的头上，哪怕此人原不过只是个吃奶的婴儿也罢。我们这位共有的母亲，为了让可怜的孩子们听话，什么样的恐吓和拷打是她想不出来的呀——什么疾病啦，畸形啦，疯啦，死亡啦。当然，颇有些乐观主义者，他们认为自然并不是在惩戒，而是在教育我们，就连托尔斯泰伯爵也曾说过类似的话：“死亡和痛苦像稻草人一样，从四面八方恐吓人，把人逼进一条从属于其理性法则，只向人开放的人类生活之路。”这种教育方法倒不赖！

完全跟对付狼和狗熊一样！可托尔斯泰伯爵的话还没有说完。很可能当人拼命逃离开某个恐吓物时，由于不善于把握方向，以至于并未走上睿智的、自然认为是唯一正确和必要的路，而在慌乱中一头扑进另外一个恐吓怪物的魔爪中。要是那样又该怎么办好呢？而这种事是经常发生的，我岂敢得罪乐观主义者们，但是，我仍然要说，或迟或早，这种事必然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想要逃跑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你终究无法挣脱开疯狂或疾病的魔爪！剩下的只有一种办法：置什么传统、神正论、智者以及首先是置自己本身于不顾，而依旧继续大肆歌颂自然母亲及其伟大的仁慈。就让未来一代人避开我们好了，就让历史把我们称作人类事业的叛徒好了，我们依旧要大唱其丑陋颂、破坏颂、疯狂颂、混沌颂、黑暗颂的。而在那个世界里——哪怕连青草也不长呢。

15

星相学和炼金术早已过时、寿终正寝、自然死亡了，但在身后留下了继承者：发明染料的化学和积累公式的天文学。事情总是这样：天才的父辈生出了白痴的子孙，而假如其母系亲属品德又十分高尚的话，就更其如此。这一次，我们碰到的就是如此：其母系亲属品德异常高尚，那就是社会利益与道德。炼金术曾经寻找过哲学基石——为此它白白浪费了时间；星相学则凭星相搞预测——以其伪知识骗人。后来它们就有了利益和诚实做生活伴侣，于是，世上便诞生了化学和天文学……家谱纯正——对此无可挑剔。根据概率，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蛮可以从白痴般的儿孙得出

结论，即他们的父辈是天才，对此大约不会有什么争议吧。要知道此事有人已经有过某种暗示了，尽管在这种事上，我们不可能比推测走得更远。但对我们来说，此类推断是可能有的就足够了，何况我手头还准备了另外一些理由。比方说，即以这样一种观点论，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深信，炼金术和星相学所做的一切，都既无意义又无必要。人们对此是如此深信不疑，以至于任何人也未曾想到是否应该认真检验一下自己的信念是否可靠。人们对我们说，炼金术士和星相学家里有不少骗子和谎言家。可难道这也算答案！各领域里都有利用人类的轻信行骗的平庸者和庸才。我们的医学即足以证实这一点，那里面积聚了多少专门敲诈病人钱财的江湖骗子呀！而炼金术士和星相学家却极有可能是他们那个时代里最杰出的人才。而我要说的更有甚于此：尽管当代科学界常以染料和公式而自豪，然而，甚至就是以其实际发明和发现而闻名的19世纪中叶最杰出最有才华的人们，也全都兼搞炼金术和星相学，也就是说，也全都寻找过哲学之石，猜测过人的命运。而这些人当中具有诗才的人，甚至能吸引全民的关注。公众舆论(Consensus sapientium)自古以来便特许诗人可以拥有极大自由：他有权谈论宿命、奇迹、神祇、来世，总之，有权无所不谈——只要他说得有趣即可。光是这也就够了：19世纪履行了它对不安分所承担的责任。任何时代也没有像发明电话和电报的19世纪那样，有过那么多灵魂战栗、忧心忡忡的作家。那时的人们认为以凡俗的日常生活用语谈论人类灵魂朦胧隐秘的追求和那些不管什么体面不体面、鄙弃体面，甚至以冲淋浴、暴饮食、闻溴剂来治病的人，是极不体面的。可这还都只是纯外在方面，它属于“时尚”史，所

以，我们在此可以对此存而不论。问题在于，炼金术和星相学并未彻底绝灭，如大家所认为的那样，它们只不过是在装死罢了，只不过是临时走下场去。看样子，现而今它们对闭门思过已经厌烦了，又想向人们东山再起了，于是，便把它们那些不走运的儿孙们丢在一边了。可这你又能有什么办法呢？祝你好运！……

16

我们的生活中往往有这样的时刻，那时，我们储备的所有经验，似乎全部告罄了。一个人无论他到哪儿去，无论他看什么，见到的都只是他早已熟悉的、早已见过的。对此类情形，多数人是这样解释的，即他们已经是无所不知了，因此，人们完全可以根据他们的体验，就什么是一般生活这问题做结论了。通常此类事件发生在 35 至 40 岁之间的人身上，这个年龄段，按照卡拉姆津的观点，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时期。一个眼中所见已无任何新鲜事物的人，往往根据这一点认为自己业已完全成熟了，断定自己有权评论一切了：他可以根据曾经有过的，预见到未来会有什么。然而，断言 35 至 40 岁之间是一个人一生中最佳时期的卡拉姆津错了；而那些断言对他们来说生活中已经不可能有任何新东西的喜欢做结论的人，同样也错了。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滥用精神体验的停滞时期，以之为据，根据现有可能判断生活中所有的可能性，而是恰恰相反，倒是应当以之为根据证明，即无论您的过去是多么丰富多彩，也不可能究尽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于万一：我们决不能以过去为据，断言将来会有什么。而且，不但如此，这样做无论对什

么都既无必要也无益处！难道说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欣赏虚构的思想成熟期，体验被卡拉姆津描述得如此堂皇的、生命最佳时期的无穷魅力吗?！这样的诱惑好大呀！这样一来，一个人就被迫不得不中止自己嗣后的体验，注定在发生新事之前一直陷于沉思之中，可是，这一在新旧两个帝王之间形成的"两个帝王之间的帝位空虚时期"(interregnum)、这一在我们的存在过程中出现的停滞时期，如能将其直接用于与此截然相反的目标，即在我们的过去中寻找这样一些表征，它们表明，未来拥有全部权力如它所愿的那样，或是与过去相仿，或是与过去无任何相似之处——这样是不是更好?这样的表征，只要你愿意，可以找到好多。偶尔你还会想到，比方说，我们及我们的前人所观察到的现象间的自然联系，对未来根本不必要，就连人们迄今为止以为不可能的奇迹，到某时，也会比已使人厌恶至极的现象规律更有可能，更好理解，也更合乎自然。要知道我们对规律早已烦得要命——您何不也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呢，你们这些来自科学界的人！即使你怎么费劲儿想，你也想不出什么新招来，不外乎再次证实一下旧有的规律罢了，这种想法，不过表现了此人对任何脑力劳动的不可救药的厌恶罢了。当法则已经多得超出了必要的限度，仍一味发现一个又一个的新法则！要知道假如想要有所思考的愿望占了上风的话，一个人所能做出的唯一推断恐怕就是，毕竟思维没有也不该有任何界限，而归根到底是以迄今存在过的认识史、以若干极为可疑的抽象观点为根据的认识论，不过是某些教派代表人物的、不对任何事物有约束力的杜撰罢了——"自然终有一天会认识自身"(und die Natur zulezt sich doch ergründe)。有时，当我们想到，我们不知道而且永远也

不会知道伟大的世界之谜时,我们变得多么暴躁呵！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在一生中的某一次,体验到想要猜详神秘的谜底的极度需求。甚至就连发明了认识论的黏液质哲学家,也悄悄地躲避开旁人的视线,一直都在时不时胆怯地尝试着一些不合方法论规范的偷袭,暗中指望着能凭这类方法,为自己开辟一条通往未知的道路,而这,却与他们所写的乏味枯燥的、颠三倒四地想要证明科学认识的伟大优点的、厚厚的大书大相径庭。人或是在生活,亦即在研究生活,或是从有限经验的拘禁下解放出来。其余的一切,全是鬼话。卡拉姆津为之陶醉并以之迷惑了自己的读者的那些诱惑力,同样来自魔鬼……抑或是与之相反？谁能解答这样的问题？于是乎,正如生活中常常发生的那样,一段激情洋溢的演说词,临到结尾时,你还是不得不诉诸猜测性判断。何不让每个人用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来行事呢？可是,那些虽有其愿望,但却不可能按卡拉姆津的方式生活的人,又该怎么办呢？对他们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每逢这种场合,席勒便会向人推荐希望。合适吗？坦白说:未必——安宁既已失去,便将永不复得。

17

自从康德终于使学者们信服,说现象界是一种根本不同于真正现实的某种东西,就连我们自身的存在也不是真正的存在,而不过是神秘,未知实体的一种可见的表现罢了。从此以后,哲学便在近代轨道上裹足不前,它甚至感到自己在这位伟大的哥尼斯堡人所指出的道路上,无力挪动哪怕一毫米。我们可以往前行,也可以

往后退，但却必须得在康德的轨道上。因为你如何才能摆脱现象与物自体的对立呢？而既然这一状况无可更改，那就是说，无论你愿意与否，你都得套上认识论的枷锁。多数当代哲学家恰好就是这么做的，他们这样做不但没有一句怨言，而且，还带着欢快的笑容。这样一来，一种怀疑便会油然产生，也许他们除了枷锁外，别的什么都不需要；也不需要让他们的“形而上需要”成为对索套的需要以外的任何别的什么。因为，如其不然，他们就得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吊在拷问架上——只有套上枷锁后才可以除外。要知道现象界和物自体的对立，是理性提出来的，而由此推导而来的认识论，同样也是理性提出来的，因此一个热爱自由的灵魂从一开始起就有充足理由止步——一动不动。众所周知，对待魔鬼，必须极其小心翼翼才是，哪怕您的一个指甲尖被他抓住了，也足以让他把您整个都带走。理性的情形亦复如是：您哪怕只在一个观点或一个前提上对它做了让步——喜剧该收场了（finita la comedia）。您从此以后永远都无法摆脱它，或迟或早，您都不得不承认它对您拥有主权。形而上学是不可能与理性共存的。一切形而上学的，都是不可思议的；而一切理性的，都是实证的。但在这里，我们即刻便会面临这样一个非常困难的两端论法：形而上学以不可思议性为其基本术语，可要知道，另一方面，许多实证主义论点也对这一可尊敬的术语拥有完全合法和公正的要求。对此我们又该如何是好呢？是否有某种可以帮助我们把一般的不可思议性和形而上学区分开来的标准呢？而在这一问题上，是否可以采用某种标准呢？而标准本身是否是狡猾的理性所设下的一个陷阱，目的是从另一端将奔向自由的人捕捉住呢？这一问题不可能有两种答案。为理

性所提供的所有服务，人们或迟或早，总归会付出弃绝自我的沉重代价的。无论您是否接受它以认识论的响亮称号或以谦虚的标准名义为您提供的帮助，归根到底，您必定会转到实证主义的路上去。这在缺乏经验的年轻人身上尤为常见。开头看起来他们似乎已经摆脱了束缚，在义无反顾地向前疾驰，可很快又都跑到了罗马，如众所周知，条条道路都通到那里，或是换一种不那么崇高的话说，跑进了单马栏，如众所周知，条条道路也都可以通到那里去。避免实证主义的唯一方法——当然，前提是由于某种原因，您已经不再喜欢实证主义了——是不害怕荒谬绝伦，无论它是实证主义的还是形而上学的，并在方法论上摒弃实证主义提供的所有服务。哲学里有过许多这样的例证，尽管对此人们一般是回避的，而我依然还是要建议大家对之给予关注。我相信，是因为它荒谬，这句话出自中世纪。近代史中则有叔本华和尼采，这两人都是完全漠视理性和逻辑的崇高例证。在这个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叔本华，身为一个康德主义者的叔本华，居然能以康德的名义，不仅敢于勇敢地狡猾地向理性进行偷袭，甚至敢于迫使理性为自己而害羞。这位令人惊奇的康德信徒，居然走到那么一种地步，即想要——当然全都是以导师的名义——克服时间和空间观念。他甚至允许有预见，而学术界迄今仍在为此而犯难，究竟该把这一假设划进形而上学领域还是普通的荒谬绝伦领域里好。而我，说实话，也不知道对此究竟该怎么办好，尽管我对此并不是十分感兴趣。聪明人，异常聪明的人，往往坚决主张极度的荒谬绝伦性，而我对此感到彻底满足了。总之，叔本华向理性发动的整个远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尽管他显系来自康德的理念，但在一条

人马践踏的小路上踉跄而行早就使他厌恶了。于是，他转了个方向，开始穿过无法解决的矛盾所组成的密林，逶迤曲折地独行，根本就不考虑自己这是在向什么前行。意志压倒理性的首要地位、音乐是我们最内在本质的表达，难道凭这些论断就足以确信，他已巧妙摆脱了康德在思维的道路上到处布满了的先验的综合判断了吗？而要知道在叔本华的哲学中，的的确确，音乐远比逻辑的成分更多一些。无怪乎人们不允许他的哲学走上大学的讲坛。但在大学院墙之外，却可以谈论他，当然，人们谈论的不是他的理念，而是他的音乐。现而今理念到处都在被大量生产出来，即使没有叔本华，整个欧洲的书市上，也充斥着理念。那些被打磨得精光、漆得油亮、舔得打滑的理念，是多么为自己的严肃性和严谨性自豪呀！叔本华这样的优点少得可怜。但这是多么活泼而又伟大壮观的矛盾呀，它自由而又勇敢地呈现在众人面前，多数情况下甚至连想都没想到，它们必须躲避开高度警觉的警察的视线。叔本华又是哭泣又是笑，又高兴又生气，他根本就没想到，这在一位哲学家来说是不能允许的。“不要说，而要唱”——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而他的遗训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叔本华完成了。哲学可以成为音乐，但这并不等于说，应该把音乐称为哲学。一个人只有当他结束了自己手头的所有事情，当他已经不再“思考”也不再“工作”时，当他把自己向自身和他人完全呈现出来，开始自由地观看和谛听，开始容纳一切并不向自己隐瞒一切时，他才会开始“研究哲学”。这样一来，那些抽象的公式于他又有何用呢？有何必要在思考之前首先要问一下自己：“什么是我能思考的，我思维的界限何在呢？”他将从事思考，而让那些自愿者们就其所思考的一切作总结去吧，让认

识论去建构去吧。谈论美是最不重要的，必须去创造美。任何一种美学理论还从未猜测到，一个艺术家的思想会向哪个方向发展；他创作活动的边界究竟在哪里。认识论的情形同样如此。它可以中止一位学者的工作，而学者本人也担心自己走得是否太远，但它却无法预先决定人类的思维。甚至就连康德的现象界与物自体的对立说，也根本无法以致命方式折断人类求知精神的翅膀。终有一天，实证主义的这一不可动摇的基础会摇晃起来。有关我们的思维可以做什么而不可做什么的认识论论争，在我们后代的眼里，会变得如中世纪经院哲学论战一样可笑。未来的历史学家会问："他们究竟为什么要争论真理应当是什么样的，既然他们蛮可以自己去寻找真理？"我们可以为他们预先准备好答案："我们的同时代人不愿意探索，因此才会耗时费力地侈谈什么认识论。"

18

不要想念自己，年轻的幻想家！——无论你如何真挚诚恳地寻求真理，无论你的祈祷如何深刻而又热情，无论在你的过去曾经有过多么大的痛苦和非人所能承当的恐惧——不要相信自己，年轻的幻想家！你所寻找的东西，是你注定找不到的。如果一切顺利，如果你具有文学才华，你会写出一本很好、很有趣、很独特的书来。也许——尽管这听起来会让你抱屈——这样的结果，你甚至会感到满意的！在尼采写于1888年——是年，乔治·勃兰兑斯首次发现——的一封信中，你可以找到这一可悲预言的证实。难道尼采没有奋争过吗，没有寻找过吗，没有受过苦吗？可是，到了临

终时刻，当尘世间所有幸福，在他眼中都变得无足轻重、四大皆空时，他却像一个少年，贪婪地捕捉着有关自己初次成名的信息，并与自己或远或近的朋友们，分享自己的喜悦。在写于此期的数十封信中，他不惮烦劳地以各种方式讲述，勃兰兑斯是如何开始其演讲的，讲堂是如何聚满了三百多人，甚至还引用了他演讲的丹麦文海报。名望刚一开口笑，往日岁月里一切令人恐惧的体验便被丢到九霄云外了。忘掉了孤独、遗弃感、山中的洞穴和一条蛇爬出嘴里的那个人——他的全部心思，都指向世俗的、可以理解的、可以理喻的幸运。凡人的命运便系如此：

> 一只贪婪的手，在搜索宝库时，抓到条蚯蚓，就喜不自胜。
>
> （Mit gier'ger Hand nach Schätzen gräbt,
>
> Und frob ist，wenn er Regenwürmer findet.）

19

人在年轻时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觉得，他所发现的似乎就是最新的、极端重要的真理，所以他必须尽快把它宣告给可怜而又无知的人类。嗣后，在他变得更有经验也更谦虚，便对自己的真理产生了怀疑，只不过到了这时，他写作才是为了检验自己。又过了若干年，他已经知道自己从根上就错了，而且，也根本没必要检验自己。但是，他依旧还是在写东西，因为他除此之外不会干别的行当，而拥有百无一用的“多余人”的名声，则是可怕的。

20

一个个性非常独特的人，却往往会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作家，反之亦然。有时，我们在写作中所追求的，与其说是讲述在我的身上所发现的事情，倒不如说表达自己“善良的愿望”（pia desideria）。因此，一些很不安分且很不知梦为何物的人，却可以歌颂早已被人歌颂过且已使大家全都厌恶了的宁静与轻闲；而另外一些一昼夜睡十小时的人，却偏偏能适时地做完一切——这还不算幻想一下冒险、暴风雨和危险，甚至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挨个数落一番。

21

当你阅读早已过世作家的作品时，总会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把你给攫住：二三百年、两千年以前曾经活过的人——无论他们曾经在哪儿活过——他人在尘世上的某个时刻所写的一切，距今已多么遥远了啊，可我们却在他人的著作里，寻找什么永恒真理！

22

今天我有权庄严宣告甚至是自有人类以来第一次宣告的真理，到了明天甚至可能即在我的嘴里，就变成枯燥无味、百无一用的许诺了。这样一来，我就失去了把它称为我的真理的权力——

而那兴许只是因为我只有一个人——而其他人仍将与这一真理一起生活、爱它并赞扬它的缘故吧。

23

一个不会灵感勃发地撒谎的作家——要撒谎只能是灵兴勃发地撒,这是一种十分伟大的、并非所有人都会有的艺术——喜欢表现自己的坦率和诚恳。他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24

独特性的来源:一个已经没指望彻底根除自身某种缺点或哪怕是把它向自己和他人掩盖起来的人,会试图在这种缺点里找到其特有的优点来的。假使他在这一点上得以说服周围的人,他就达到双重目的:既摆脱了良心折磨,又成为独特的人。

25

当人感到自己对一些小难题力不从心时,往往会转而追求另外一些伟大目标。而他们并非总是毫无结果。

26

打嗝会打断最崇高的人类思维。如果你愿意,尽可从中得

出某个结论；但是，同样，如果你愿意，也可以不得出任何结论来。

27

有信仰的女人——尽管我们并非十分情愿，但对男人，我们会原谅其“信念”的。当然，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对自己的不可战胜坚信不疑，却又不得不向必然性妥协，会十分奇特。双手布满老茧既可笑又不雅观——可虽然如此，既然我们并未生活在天堂里，而是生活在尘世间，在此，我们不得不满头大汗去挣赖以糊口的衣食，因此，手上不可能不布满老茧。可把老茧视为理想究竟又有何必要呢？在实际生活中，尤其是在几乎每一位现代男子都或多或少被注定生活其中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信仰是必须具有的。团结就是力量，而团结只能产生在具有同样思想的人中。其次，深刻的信念自身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能成功取代甚至在许多方面优于最严谨缜密的论据。有时，一些有信仰的人只需以其固有的、健康的、沉闷而又颤抖的嗓音，嘟囔出那么一两个短句，挤满礼堂心中仍然犹豫不定的听众们，便会被征服。而这已然是历来如此的惯例了，以致大家都认为，真理似乎善于大声而有力地呼喊。可实际上真理常常是无言的，尤其是新的真理，它们最怕人，而且，它们的嗓音也几乎永远都是微弱有时甚至是嘶哑的。可是，在这种情形之下，重要的不是它实际上怎么样，而是它对人群有什么影响。对于社会活动家来说，信仰简直是必不可少的。而如果有人足够聪明，以致知道自己虽有自信但缺乏足够的天分，故此无法巧妙装

扮一个信徒的话，那么，对他来说，彻底放弃社会活动不失为最好的办法。而与此同时，他也会明白，缺乏信仰并非是有益的。因此，他也会宽容地对待那些由于生活条件的决定而具有如此信念的人的。但也正因为如此，对那些无任何必要而以如此野蛮的文身丑化自身的人，他也会极不耐烦的，而尤其是对女人。可是，具有信仰的女人何以会令人无法忍受呢？她生活在家庭里，不用从事艰难的、日复一日的劳作，她又有何必要丑化自身呢？既然你有一双洁净漂亮的手，为何要人为地磨出两手老茧来呢？通常女人们并不愿意为自己构想出什么信念不信念的，她们往往会在随便什么地方找现成的来。而且，多数是从对她们感兴趣的男人们那里；而且，即便如此，也只是在下列场合之下，即当她们感到，那个男人自己也未强壮到足以为自己的理念开辟道路的地步时。她们在为那男人揪心，于是，便使出最后一招：试一试，看她们那软绵绵的拳头对自己心爱的人起不起作用。这样做当然很令人感动，可毕竟有几分可笑，到最后则会令你极端厌恶的。因此，如果你碰到这样一些女人，她们并不相信自己的丈夫，也不认为有必要去帮助他们，同时也没什么信仰，那么，碰到这样的女人，是令人欣慰的。

28

妇女解放——战胜强敌唯一的、至少是最可靠手段，是学会运用他的武器。依据这一原理，已经对奴从男子感到厌恶的当代女

性竭力想从男子们那里尽可能多学几手。奴役多痛苦，而自由多可贵！到后来，当奴役已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时，会使一个人只要能获得自由，情愿牺牲一切。对于一个困在地狱中等死的囚徒来说，即使他有了善心又当如何？他只有一个目的，一个愿望，那就是获释，离开监狱，与此相应，他才只珍视自己身上那些足以帮助他实现朝思暮想的愿望的品质。假如要想折断铁栏杆需要的只是强壮体力的话，那囚徒准保习惯于把强健的肌肉视作最好的行善者的。而假如狡猾能帮得了他的忙的话他又会觉得世上最珍贵的，就是狡猾了。我们的女人皆有类于此。她相信，男子之所以能占上风，主要是因为他们有教养还有受过严格训练的头脑，于是，她便扑向大学和书本。在她眼里，向她昭示自由的学问是光明，而其余的一切都是黑暗。这当然是错误的，可是，假使你劝她不要信这个，那您只会是白费口舌，她是不会相信的，无论如何也是不会相信您的，她也不会相信，与她最美丽的憧憬相连的一切，会不好甚或是很糟。这样一来，显而易见，女人的教养将不亚于男人，她们将会有坚定而又广泛的见解，终生不渝的信念、世界观，甚至还可能学会严格符合逻辑的思维。到那时，两个对立性别之间通常所有的许多误会也许就不会发生了。然而，上帝啊，真到那时活在世上是多么乏味呀！男人在证实什么，女人也在把什么证明，甚至就连孩子，可以肯定，也一生下来就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而未来的男人们，该会多么忧郁地怀念我们这个时代那些调皮任性、性情乖张、单纯无知、懵懵懂懂，同时也不愿无所不知的女人呐。整整有一半人类不愿意无所不知。希望即在于此：也许实际上即使没有理解，人也过得去？也许，逻辑头脑不是什么美德，而是罪孽。然

而，在为生存而从事的斗争中，由于适者生存的法则，人类已经丧失了不少优秀的品质，显然，女性的不合逻辑性，也在注定死绝之列。可惜，真是太可惜了。

29

各种文学都好，只有乏味的那种除外——伏尔泰如是说。我们可以把他的思想略事扩展而说：各类活动、所有人都好，只有乏味的人除外。无论您有什么缺陷和罪过，只要您具有吸引力并有趣，大家就会原谅您的。因此，坦率和自然也才会被人当作是可疑的美德。无论如何，当人们说，坦率和自然是一种美德时，这句话永远应被理解成“一粒盐，讥嘲地，带一定保留地”（cum grano salis）。也就是说，一股脑儿说出某一真理是可以允许的，也是适当的，还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像圆木一般在路当中放倒，可千万不要把这种坦率归纳为一种原则。总是“讲真话”，总是完全敞露自我——何况这实质上是做不到的，任何人任何时候其实都未尝做到这一点，甚至在有名人物的著名《忏悔录》中也未做到——要比人们通常以为的远更危险，更需要负责任。我敢于充满自信地断言，假如有那么一个人，愿意并且也能够讲出有关自己的一切真相；而且他不是像文学家们通常所做的那样，以譬喻的方式讲述（所有譬喻都是夸张），而是以朴素的、平常的、人类所用的赤裸裸的语言来讲述的话，那这人就会永远把自己给毁了，因为他在邻人和自己的眼里已经失去了任何兴趣。我们当中每个人心灵的深处都有一个沉重的、无法治愈的创伤——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但却

做出、而且是必须做出似乎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存在的样子，而且大家也都装出十分依赖它的样子。不妨让我们回忆一下莱蒙托夫的诗句：

> 看一看你的周围：人群在日常的道路上欢快地走动；
> 在他们那节日般的脸上忧虑的痕迹隐隐，
> 却没有一丁点儿眼泪来大煞风景。
> 但在他们当中未必有这么一个人
> 不曾被严厉地拷打折损，
> 在皱纹过早爬到脸上之前、
> 不曾有被损，也没犯过罪行。

遗憾的是，这段话里所包含的真理可以说是太多了，而这些真理则必须加以掩盖。掉眼泪、坦白招认是极不体面的。因为真正可怕的事物是会把大家都吓跑的。当然，人们也常以此类事物来吸引人；比方说，如拜伦和莱蒙托夫那样。然而，可怕事物的诱惑力是以模糊朦胧和遥不可及为其必要条件的。任何怪物从远处看都是美的。只有那个善于让自己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的人，才可以是有趣的。女人并不总是懂得这个道理。女人一旦喜欢某人，就会竭力走近前来，尽可能走得离他能更近些，通常使她们十分惊讶的是，为什么男人总不肯以坦诚对坦诚，为什么人们不让她们介入最珍贵的心灵宝库。但心灵这一宝库唯其不可介入才美。一般说这也不是什么圣殿，而不过是一个遍体鳞伤的兽-人躲在里面舔自己伤口的洞穴而已。这种事难道也可以当着人做吗？一般说来

人都需要人们为他们提供一种正面的东西，而女人尤甚。在文学中尚可以歌颂绝望、无望和不可救药的创伤——总之随便什么都可以；因为这毕竟只是文学，亦即假定性而已。但在生活中，如果你察觉自己的郁闷无法摆脱，察觉自己的病患已不可救药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儿，也就意味着最终杀死你自己，而不是治愈你。所有的人，甚至就连优秀人物，也会从您身边踉跄退却，除非为了遵守某种秩序和循规蹈矩，而在他的世界观里给您安置一个不是十分醒目、因而也不十分珍贵的位置。如众所周知，在世界观里如同在墓地里一样，已为每个人都准备好了位置，那里所有人都是尊贵的客人。在那里即使是多余人也能找到自己的栖息地。那里总有一块地盘是特别围护好了的，各类废渣都往里倒并在那里腐烂。但对那些还不愿意涉足世界观领域的人，我们的建议是三缄其口，或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及与其相仿的人那样，去搞文学。对于在写书时（而且是只在写书）的作家来说，一切都是可以允许的——只要他有才华即可。可作家在生活中却不可太开放，以免人家猜测，他在书中关于自己是不是说真话。

30

普希金断言诗人应该而且也能够成为自己作品的法官。“你对它是否满意，爱挑剔的艺术家？满意，那好，让公众去骂它好了……”我们未必可以与此论点论战，而且也无此必要。因为我们怎能够“证明”，最高法庭不属于诗人本人，而属于社会呢？抑或相反，普希金的观点是对的？因而，我们不能把普希金的话当作普遍

必然判断。我们有权同意或是不同意它。然而，它一旦成了证据，就不可能被驳倒。无论我们是否喜欢这一点，但是，显然普希金对自己的作品是十分满意的，而且，也不需要读者的赞许。多么幸福的人呀！而我认为，他的幸福有赖于下述一点，即他在自己的追求中，善于不超越某个特定界限。我认为并不是所有诗人都同意复述普希金上面的那句诗。比方说莎士比亚。我绝对无法想象莎士比亚在写完《李尔王》或《哈姆雷特》之后会对自己说："对自己的劳作，我的评判比所有人都严格，我对它们很满意。"我甚至认为在他头脑里，有关《哈姆雷特》或《李尔王》的优点何在的问题，根本就不曾产生过。不但如此，我认为，对于写作了《哈姆雷特》的莎士比亚来说，"满意"一词一般说来已然丧失了任何意义，而即使他曾经用过这个词，也仅只是出于习惯而已，正如同有的时候我们会出于习惯说出早已过世的死者的名字那样。对于自己的作品，对于自己那已为全体有教养的人类读了三百年之久的作品，他想必觉得它们尚不够完善，像婴儿的啼哭或病人的呻吟一样软弱而又可怜。他把它们交给了剧院后，极有可能连他也十分惊讶，作品居然会大获成功。兴许他也曾欢喜不止：他的眼泪还有点用处，哪怕只是为了要人开心或是教人们一点什么。在这个意义上，兴许对他来说，公众的评判会比他自己的评判更可贵。他不能不责备自己的孩子——可谢天谢地，至少人们是肯定它们的。当然，人们之所以肯定它们，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解或是理解得不够好，但这已经不再重要了。"要是照每一个应得的名分对待他，那么谁逃得了一顿鞭

子?”[①]——哈姆雷特问道。莎士比亚早知道,严厉的法庭会否定他的作品:法庭上有那么多可怕的问题,却连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也没有。难道说仅此就足以令人“满意!”吗?《错误的喜剧》《十二夜》甚至《理查三世》尚差强人意,但在《哈姆雷特》之后,人只有躺到坟墓里才可获得安宁……假使要我开诚布公地说出一切的话,那我还不能完全相信,普希金自己是否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息,也忠实于自己业已在1830年,即写作这里所谈及的那首诗的那一年,所曾表述的观点,他是否说出了他想说的一切了呢?或许他已经感觉到鲜有对其作品感到满意的诗人,但骄傲妨碍他承认自己的软弱,于是,他竭力想要再次以自己优越于公众这种意识来安慰自己。这个办法太妙了——没什么好说的!应当用鄙视来对待屈辱——要知道普希金被迫不得不忍受许多屈辱——而那个为了要蔑视屈辱者,而去找寻自己那的确立下的功绩并倾听良心的严厉审判的人,是多么的不幸呐!所有这些斤斤计较统统是不必要而又危险的。一个人如果想要保持力量和自信,就必须抛弃宏大的幻想。他应当鄙视敌人,即使从内心来说他不能鄙视他们时,也仍须装出一副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样子。于是,人们看他总是心满意足……普希金是个聪明人,天性非常仁厚的。

31

与意志作对的形而上学——我脑子里常常浮起这么一种想

---

① 《莎士比亚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8页。——译者注

法，即恶兴许并非那么不必要——如人们一般以为的那样。疾病、屈辱、贫穷、丑陋、失败及所有其他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以热带式的富饶繁荣生长的植物，兴许，都是人所需要的。这一观点有许多经验观察为依据。诗人常在诗中歌颂哀伤。

我们是小学生，痛苦是我们的老师(Nous sommes les apprentis, la douleur est notre maître)——缪塞如是说，甚至每个人都能连书都不用翻，就这同一题目，从各种各样作者的书里，摘录出随便多少这样的引文。而且，每个都能不光援引——在此种场合下人们不大相信的，因为一般人们以为他们是没有心肝、非常冷漠的——哲学家。而且，还可以引用性格温柔和带有感伤气质的诗人的诗作。我们无疑可以举出许多痛苦与损失于人有益的例子来。当然，反之亦然，我们同样也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事例，即无论你怎么寻找，也无法从痛苦和损失中，找到任何益处。而恰恰就是这样一些事例是深刻、严肃、令人十分屈辱的痛苦之事。喏，比如契诃夫笔下的男人和女人，多数显系比照真人写出，但至少他们与现实生活是相像的、栩栩如生的。万尼亚舅舅，一个50多岁的老头，以非其所有的嗓音，对着整个舞台，向整个世界呼喊道“生活完蛋了，生活完蛋了”，说着，毫无疑义地向无任何过失的教授开了枪。或以《乏味的故事》里的主人公为例。主人公怡然而自得，一连30年，在做一件重要而又有意义的事，可突然、不知不觉间，他患上一种可怕而又讨厌的病，但疾病并未一下子夺去他的生命，它只不过向他张开了它那吞噬一切的大口。为什么要这么写呢？而契诃夫笔下的少女和女人又当如何！她们人数很多，他笔下的女性多数年轻、无辜而又迷人。可是，时时处处，都有无意义的、野蛮而又丑

恶的悲伤之事，在窥伺着她们，把她们最卑微的希望扼杀在萌芽状态中。她们哀哀啜泣，号啕痛哭，可是，命运还是不放过她们。这类可怕的事又该如何解释呢！契诃夫不吭声也不解释。可他也不哭：他早已不会流泪了，况且成年人哭鼻子是可羞的。必须或是紧咬牙关不吭声，或是给予说明和解释。于是，形而上学来着手解释了。在理性通常所以止步的地方，形而上学却认为自己有权再往前迈一步。“我们曾经，”他说，“看到过许多这样的事例，即一种痛苦初看上去似乎既荒谬又无必要，随后却觉得它别有深意。而那些我们无法给予解释的事，兴许依旧有其自己的原因。”“生活完蛋了”——万尼亚舅舅如是说。“生活完蛋了”——无数个无辜死去的年轻少女的嗓门，在呼应着他，然而，或许什么东西都未曾完蛋。濒死者所体验到的恐惧本身说明，死亡仅只是表面的。死亡只不过是一些伟大事件的开端。一个人未来得及体验到的东西越少，他身上未获满足的情欲和愿望越多，他就越有理由认为，他的存在越不可能毫无痕迹地消失，无论如何，总归要在宇宙中有所表现的。自觉自愿地禁欲和苦修苦行，是世上极其流行的一种现象，它们是破解这一谜底的钥匙。任何人都未强迫人这样做，是他自己自愿承受苦难和节欲的约言的。本能是难以索解的。本能是植根于我们的天性最底层、最神秘、最不可知之处的一种东西，它向人暗示了一个对人类来说十分可怕的决定：弃绝生活，保存自己。多数人并未听到这个声音，或许他们即便听见了，也不愿听从它。于是，不再指望我们的敏感性的自然，便采取了暴力。它把天堂呈现给青年时代的人，在他们身上唤醒强烈的憧憬和希望，可随后，当我们正在期待其履行诺言时，又极其残忍地当着我们的面，把我们

全部期待的子虚乌有、虚无缥缈性展现出来。几乎每种生活都可以用几句话来给予归纳：刚把天空向人展现，一转眼便又把人抛进污泥里。我们全都是禁欲者：一些人出于自愿；一些人则是被迫的。在此尘世之间，在人身上只能唤醒理想和希望，而希望的兑现却不在此世。谁经历的损失和痛苦最多，谁的生命力在觉醒之后就越顽强、越活跃。形而上学向人们嘀咕的就是这类话，我们聆听着这类话，经常还复述着这类话，却忽略了淡化印象的“兴许”一词。我们有时相信此类话，并从此类话里，为自己提炼出哲学世界观来。我们甚至还断言，假如我们手里有权的话，我们也不会改变这个世上的一切，任何东西都不改变……假如由于某种奇迹，这样的统治权落在了我们手里的话，我们仍然还是会无比欢快地，要所有高尚的世界观、形而上学和理念统统见鬼去；而无所谓地、不假思索地、把我们曾经赋予其以巨大教益的所有痛苦、所有丑恶和所有失败，从大地上打扫干净。学习已经令我们厌烦了啊，厌烦透顶了！可结果却是：你只能无可奈何。而正因为如此，由于缺乏更好的(faute de mieux)，我们仍将杜撰体系。但我们有约在先，我们不会生那些不愿意了解我们体系的人的气。要知道，根据公正原则，他们完全有权这样做。

32

应当尊重老年——大家甚至包括老年人都这样说。而多数年轻人也极其情愿地自愿履行着这一要求。但在他们的敬意里和自觉自愿的、有时甚至是刻意做作出来的行为中，却透着一股深深伤

害老年人心的东西。每一个敏感的年轻人，似乎都在以其自觉让步本身，在告诉那位老人："毕竟新星比旧星亮。我来日方长，你去日无多——难道我连这么不值钱的玩意——尊敬——也不能输你几分吗？"而老人们在接受日常贡品时，也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所应领受的，不会比尊敬更多。冲着他们的年龄，人们既关切又恭敬，但这些关切和恭敬是有必要条件的，那就是老年人应当有老年人的样儿，应当远离生活。你不妨让一个活人去效法浮士德的榜样——顿时会使人忧心忡忡！老年人通常总是年老力衰，因此，他们必须服从社会，装出一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样子，只有关心正义和爱惜自己的好名声及诸如柏拉图式的幸福除外。只有不多几个老人敢于和习俗作对，而一旦他们这样做了，就会被人当成怪物及败类。我们并不想让老年人想入非非，况且，归根到底，生活就是这样安排好了的，即似乎老年人根本就什么都不需要。这当然没什么了不起，在我们这种生存条件下，不光老年人，就是年轻人也不得不随遇而安、浅尝辄止，而在此尘世间，起而捍卫横遭蹂躏的人类权利，至少不是地方。令我感兴趣的，仅仅是这样一种情况，即科学和哲学都把不自觉的伪装当成真正的现实。华发苍髯一般被人当作是战胜情欲的可靠标志。人们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华发苍髯归根到底是不可免的，因此，人的最高职责是战胜情欲……而大量哲学体系，都是建基于这一大理石基础之上的。我们犯不着与习俗作对——我们照旧会给老年以尊重的。但是，我们却要为哲学前提寻找另外一些来源，那就是：即使是在形而上学领域里，也是该为情欲开辟自由道路的时候了。

33

陀思妥耶夫斯基——恶魔呼唤(advocatus diaboli)——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一样不喜欢清教,并千方百计竭力当着人的面揭露和抨击它。他通常并不讲究方式方法,兴许,甚至从来就懒得去认真研究一下路德的学说,他的感觉并没有欺骗他——清教及其道德对他以及与他一类的人是最不适合的,但这难道说明,清教总的来说百无一用,我们蛮可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根据一个词的语源学含义,来对之进行毁谤和谴责了吗?而清教徒——这是理所当然的——却在抗议了,但他也只是抗议抗议罢了,抗议本身并不具有任何可以肯定的内容。要想确证这一定义是错误的,只需瞧一眼简明历史教科书就足够了。但实情恰恰相反,在现存所有基督教教义中,清教实质上是最富有说服力的。首先,清教所追求的是,把人安顿在尘世之间。清教当然反对过天主教。可它只是为了正面理想,为了反对天主教的破坏性倾向才开始抗议天主教的。天主教太相信自己的势力和吸引力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相信自己的教条是战无不胜的,为此,为了这些教条,它不痛不痒地把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条人命,当作了牺牲品。为了上帝的荣耀(Ad majorem gloriam dei)而歪曲和丑化个别人,这在天主教鼎盛时的中世纪,曾被认为是最普通的、安全合法的事。不怕人们以为我陷入悖论,我敢斗胆断言,人们之所以杜撰出了理念,仅仅是为了给丑化人提供权力。中世纪对一切正常的、自满自我完善的东西,有一种神秘的不可理喻的仇恨。一个年轻、强壮、漂亮、

精神安详的人，在一个天主教徒身上，只能引起疑心和仇恨。光是他的模样就是在侮辱和否定教会。对他连审问也用不着。此人即使也进教堂，即使从未在话语和思想中怀疑天主教教条的真理性，他也还是个邪教徒，必须采取一切可以采用的手段，把他打入另册。而天主教的手段是尽人皆知的：褫夺名誉、禁欲主义、弃绝肉欲。即使是一个十分正常的人，一旦在寺院制度下被关闭一段时间，也会丧失精神的平衡和那些存在于健康的精神和健康的体魄里的所有美德。天主教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它达到了使人的全部存在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目的。天主教把通常的、自然的、以婚姻和家庭为满足及其终点的爱情也认为是一种罪孽。它不仅禁止修道士，而且还禁止神父成家——其结果是使得非正常、奇特的情欲得到了发展。它到处宣扬贫穷——结果却使得世上出现了闻所未闻的贪欲，这种贪欲越是想隐藏起来就越是极度膨胀起来。它要人们恭顺谦和，结果却使得赤足的修道士中，出现了一些无可与之匹敌的酷爱权力的暴君。路德在罗马所见到的，一个人居然会不理解天主教为其所提出的任务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的现象，绝非某种历史境况的偶然结果，而是几乎总是自觉地想要赋予生活尽可能更多一些令人惊慌恐惧性质的好几代人，几个世纪以来持续工作的一种结果。路德这个来自乡村的人，这个德国的修道士，他的天性太实在太纯朴太真挚了，根本无法搞清罗马所发生的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以为世上只存在一个真理，以为天主教的本质就是他眼中的具有美德生活的典范。于是他一往无前地向着自己的目标挺进。僧侣生活的使命何在？为什么非得要剥夺神父成家的天伦之乐呢？为什么要一般地剥夺人的欢乐呢？怎样才能与神

父之都所笼罩的淫逸放荡的生活妥协呢？一个正常德国人所拥有的理性，在为如此这般的景象所具有的显而易见的荒谬绝伦性而愤怒；而路德不会，也不愿在这个理性已被人们忘却的地方，寻找它的任何好处了。生活那疯狂的、前所未有的、疾速而又频繁地从极端禁欲主义和盲目信仰转向根本无任何信仰和情欲的放纵的剧烈动荡，在这位诚实的修道士身上，唤醒了神秘主义的恐惧，赋予其以与全能的教皇和神圣的天主教信仰展开胜利的斗争所需要的巨大力量。而他又怎能不奋起反抗呢？是谁在否定呢——是路德还是由于自己的恐惧，由于自己所担负的责任而居然敢于效法东方各民族祭司阶级的榜样，从保卫神谕走向考验生活之谜的罗马呢?！假使修道士们只限于在思维领域里放纵的话，路德兴许还会原谅他们呢。但中世纪的修道士们与我们当代的哲学家们无任何共同之处。他们并没有在书本里寻找"世界观"；而逻辑的竞技也很少能使他们开心。他们一头扑进深不可测的生活的旋涡里，在自己和邻人身上做着实验。他们从极端弃绝自我彻底摒弃肉欲转向放荡的酒神狂欢。他们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吝惜。总之，路德奋起反抗的那个罗马，想要再次重建巴比伦塔，但这次却不是用石头，而是用人的灵魂重建。路德对在他眼前展现的这一幕十分恐慌，他后退了，后退的同时，他几乎叫半个欧洲跟随他一样掉了头。而这，就是他对历史所建立的、值得肯定的功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竟然会抨击路德教义！他是否在惋惜过去的天主教及其"精神上的"子孙们所曾登上的那个令人上气不接下气的高峰呢？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是不是仅有健康的道德及其所奠定的生活习俗还远远不够呢?！而这毕竟还不是"值得肯定的"。这仅仅只

是“抗议”而已！无论你们信不信我，但我还是要说并且永远都要声张：毕竟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作先知的弗·索洛维约夫不对，而把他称为“一个残酷的天才”和“寻宝人”的H. K. 米哈伊洛夫斯基是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是去寻宝去了，对此已不再会有任何怀疑了，而对于在笃信宗教唯心主义这面大旗下出场的年轻一代来说，小心回避那位老巫师倒不失为体面之举，因为，只有眼睛非常近视或是根本缺乏生活经验的人，才认不出他是个危险人物，而把这个老巫师选为自己精神上的领袖的。

34

说服人这件事既乏味又困难，而归根到底，实在说，也无必要。假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那情形大概会好得多。可遗憾的是，无论如何这是不可能的！无论你愿意与否，你还是得承认万有引力法则的存在。某人以为我们必须承认人是猴子变的……无论这有多么不平，在经验领域里，总归有一些真理，一些普遍必然的、真正的真理，对它们，任何反抗和暴动，都无济于事。假如科学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必须向我们证明与此相反的事物，那我们定会以何等喜悦的心情向他们声明：火根本就不烫人，响尾蛇压根就没毒，从高塔上掉下去也根本摔不死人，等等。可遗憾的是，学者并没有证实什么的义务，自然就已替他证实一切了——而且，这是怎样的证明呀！——这种证明根本不需逻辑和道德的帮助。假如自然和形而上学一样，居然也想用布道或是三段论法来迫使我们得出结论的话，你们会怎么看，它能在我们身上达到自己的目的吗？可

是，自然可比形而上学更善解人意，而且，更主要的是，也比它更强大得多。自然把逻辑和道德给了黑格尔和斯宾诺莎，而自己却操起了一根大棒。喏，你去试试吧，敢和它争吗：你不由自主地就会让步了！最聪明的人，形而上学论者们，就是天主教的宗教裁判大法官，他们就曾效法自然的榜样，他们很少诉诸言论，与心灵的热度相比，他们更信任火刑的威力。他们所拥有的势力哪怕再大那么一点点的话，那么，关于教皇是不可战胜的这一点上，在整个世界上你都找不到两个想法不同的人。而形而上学的理念，想要以理性的根据征服世界和人的理念，却从未取得统治权。如果它们想要发号施令的话，那么就得诉诸比说服更有效的办法。

35

进化——近来，在作家以及那些与文学无关的人身上，我们越来越频繁地看到，他们的世界观总是在不断变化。老人们开始怒不可遏了；他们觉得如此频繁地改变信念，的的确确有失体面，要知道信念毕竟不是手套，戴旧了就可以扔。可对老年人的愤怒，年轻人却连理都不理，他们总是无忧无虑地从一种观点体系转向另外一种。而那些不够果断的人毕竟有些难为情，他们不敢把事情做得太张扬，所以尽管他们实际上已经背叛了自己先前的信念了，但却从不公开声明这一点。但也正因为如此，也常常有这样一类人，他们彻底公开而又坦率地、漫不经心、若无其事地声言，他们已经彻底抛弃了半年或一年以前所曾怀抱的信念了。甚至还有人出版了一本本的书，讲述他如何在最短时间内从一种世界观转向另

一种，又从另一种转向第三种的。他们并不认为这样的“进化”有什么值得忧虑之处，以为这是合情合理的。可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合情合理的”。情愿为了一种信念而放弃另一种，这首先是对任何信念表示完全冷漠的一种标志。老人们之所以敲起警钟决不是无缘无故的。可我们这些不久前还在和各类常在性作对的人们，却非常乐于看到年轻人的这种轻率。他们将在唯物主义、实证主义、康德学说、唯灵论和神秘主义等的丛林里漫游，直到终有一天他们发现，所有理论和理念，都像我们的曾祖母穿过的箍骨裙和钟形裙一样，是我们不那么迫切需要的。这样一来，他们便开始过起一种没有理念，没有预先拟订的目标，也没有预见，而全凭偶然和自己的运气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也很值得一试！说不定这样一来我们能获得的东西会更多……无论如何，这样做会更加有趣得多……

36

意志力——意志软弱或意志瘫痪，是我们这个时代，可实际上不光是我们这个时代，而是所有时代里一种极其危险、十分流行的弊病，它的实质并不在于一个人从此便如龙钟老人那样完全无思无欲了，而在于，他已丧失了将其愿望付诸实施的能力了。病老软弱的意志，在一些非常激烈、极其激情洋溢的人身上，也可见到；因此，人们通常的指责——“不要说你不会，而要说你不想”——远非永远恰当。于是，这样一来，激情的力量非但未能用于在我们之外创造某种东西，还会整个用于内心斗争。人们一般非常公正地把意志软弱当作最危险的一种后果。因为内心斗争是一种破坏性斗

争。一个人非但什么也不做，或是换用科学的语言说，他非但不尽力让自然适应自己的需求，反而减弱自身对于外部环境的适应程度。即使一个医生甚或一个富有理性的普通凡人，也会毫不犹豫地断定，我们在此所碰到的，是一种病理学个案，应当采取一切手段，与之进行斗争。而病人本人在他有可能被拯救以前，也会持有相同看法的。但当治疗未能取得任何效果时，医生便会走开，并拿出我们的科学尚不够发达来做挡箭牌。可病人又该怎么办呢？他可是逃无可逃，而谈论疾病不可救药也令人厌恶。于是他就开始想啊想啊——总是想任何人都不去思考的事情。他被大家给遗忘了，而他自己渐渐地也忘掉了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万物，而被他忘掉的，首先是一个如此流行的真理，即只有那引起公认为是普遍必然的判断才有价值。他倒也不是对这一真理提出诘问，他只不过是把它给忘了，而又没有人向他提醒一下它的存在。在他眼中，他的所有判断都是重要的，有价值的。而我们当然不能提出这样一种原则：让所有人都抛开外部世界而转向自己的内心。可有何必要非得提出什么原则呢？我们蛮可以简简单单地说一句：我对外部世界的命运漠不关心。我不想移山填海，也不想改变河水的流向，更不想重绘欧洲地图，更别说到杂货铺里卖香烟了。我什么都不想“做”。我只想思考，我的无所事事是世上所能有的一切事中最重要的，我的“病”与健康都好，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试想，一个被医学和医生遗忘了的人，什么鬼怪念头想不出来呀。他的判断是非必然性的，这一点就跟白天一样清晰。但这也就是说它们没有意义吗？也就等于说意志软弱或瘫痪，仅仅是一种病吗？

37

死亡与形而上学——甚至就连一个肤浅的观察者也能轻而易举地发现,生活中较好的总是非常难于达到的。某些心理学家甚至认为优秀的主要魅力就在于它难于达到。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但无论如何也包含真理的成分:通向好的道路充满风险。这大概是因为自然远比我们惯于以为的贫乏以致不能为贪婪求知的人类储藏足够的益处,抑或是因为这里掺杂了某些崇高意图,而我们拘于自己的局限性对此无法猜详——但无论如何,事实在于,某一目标越是诱人,达到这一目标的道路就越是危险和可怕。我们是否可以从中得出一个推测或至少是一个悖论,即任何危险性后面都隐藏着利益,因而危险性是一个标志,而不是像日常生活经常教导我们的那样,是一个反标志?而因此——既是推导结论,那就推导结论好了——最大危险即死亡,理应包含了最大的希望!在此,我们可以停下来,不再思考以下的结论了。而我认为我们在此停下来是应该的,不然就会与传统的形而上学发生争论了。如众所周知,形而上学总是善于以永恒性的折光来解释我们在时间中的存在的。我们不妨也以它为榜样,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去尝试认识绝对。我们于是找到这样一个令人宽慰的推断,尽管这是在超验领域(即它的追求者更多的是在尘世间,在那里,从事劳作和必有一死的凡人们等呀等,怎么也等不到,哪怕能在想象中,减轻其命运的重负)。我们必须学会,把一切包括死亡,都用来达到我们生活的目的。

38

未来——一个习惯于信任理性的、清醒而又聪明的小男孩，在一本为儿童写的书里，读到了对沉船事件的描写。沉船发生时，船上的旅客们恰好在吃甜食。当小男孩读到，船上所有人甚至包括无力去拯救这艘船的妇女和儿童都扔掉食物，哭哭啼啼，号啕大哭地在甲板上跑来跑去，他感到很惊奇。这些人干吗要哭，干吗要跑来跑去，为什么会像没头苍蝇似的犯急呢？水手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会把取决于他们的一切事情都办好的。既然命中注定要死——无论你犯不犯急，总归不免一死。小男孩觉得，假如当时他也在那条船上，他肯定不会离开餐桌，而会直到最后一分钟，都要坚持吃甜食的。应当认为小男孩的推理是清醒、正确而又无可指摘的。活着的时间只剩下几分钟，能让这点时间过得尽可能更愉快些，岂不更好？你就是把亚里士多德本人给叫来，这一逻辑推理链也是符合理念的。而你无论如何也无法向这位小男孩证明，他一旦真的在沉船上，他也会丢开甜食——哪怕这是他喜欢的甜点心——而和其他旅客们一起，没头没脑疯疯癫癫地在船上跑来跑去的。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条道德准则，那就是说：不要妄测未来。今天在你身上占统治地位的是理性，甜点心对你来说就是最高法则。可到了明天，兴许你把什么理性、什么意义统统赶走，而和没头没脑和荒谬绝伦打成一片，到那时，你甚至可能会爱上苦难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39

先验的(a priori) 综合判断——众所周知,康德在数学和自然科学中发现了先验的综合判断。他究竟是对还是错,亦即我们是否应该把他所指出的判断说成是先天或后天——有一点无可置疑:所有这些判断都被人当作如果不是绝对就是相对无可争议的判断而接受了。而在形而上学领域里,情形与此有所不同,但也恰好是在这一领域里,隐藏着对我们来说最重要也最有趣的真理。康德被迫承认我们从事先验的综合判断的理性能力,恰好是在这里结束的。可是,由于以下原因,即无论如何人不能没有形而上学的判断,所以,康德就提出以前提、假设和乐观主义的推论来代替它,认为我们可以在超验领域里寻找到我们的现象界里所缺乏的一切的。这样一来,尽管他没有发明真正的科学的形而上学,但他却构想出了一种非科学的形而上学;这也就是说,他带了自己的读者绕了个大弯子,在经历了长久的漫游之后,他把读者从相反的一面,领到了他答应把他们从那里引开的地方。要知道非科学的形而上学在康德之前即已存在,即使是在中世纪哲学家那里,以思辨为题的想象就已多得不可胜数。而且,这些哲学家们通常全部装备了"道德的"证据。假如康德真的想以革新的形而上学为目标的话,那他首先应当起而反对形而上学最喜欢的"推理"这种真理探索法。人是一种极端吝啬而又贪婪的生物。他们极欲多知道一些,而又尽可能便宜地买到知识。正因为如此,人们总是会如此想象,即他们以经验方式,亦即力量损耗的方式所获得的每个真理,

都能赋予人以获得更新的真理的权力——而要得到这些更新的真理，已经不再需要付酬了，或用哲学语言说，即是先验的，从理性即可得到。而人们非但不会为自己不花钱就白得东西而害羞，反而说不定会为自己居然有此能力而自豪。于是，人们不是想要去看、去听、去摸，总之，不是想去探索，而是只想着如何来推理！无论采用何种手段，假使他们真能用狡计战胜自然，用狡猾、下流和欺骗从自然那里骗取某个重要的秘密的话，我们当然会谅解他们：胜者为王嘛！可要知道他们的"推理"除了一些形而上学体系之外，根本没有得出任何结果，而那些个体系，就连一百多年以前的康德，也觉得它们只是些空洞无意义的废话。我们是否到了该抛弃推论——而像莎士比亚、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几乎所有的诗人所做的那样。经验的(a posteriori)获得真理，也就是说，当你想要了解些什么时，每次都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了，出发去看一看——是时候了呢。而相反，如果你懒得去或是不敢从事新的实验，那就不妨像实证主义者那样，训练自己学会对存在的终极问题表示冷漠。至于道德的、本体论的及诸如此类证据，实在说，连想起它们都觉得很难为情。况且，又有谁真的会把它们当回事呢？每一次新的实验都是有趣的，而我们那些推理，亦即我们那些先验的综合判断，多数不过是一些漫天许诺的谎话，其价值，就连印这些谎话的那张纸都不如。

40

一般规则——人们往往喜欢向哲学家要普遍原则。而由于哲

学家同样也是人，他们也得根据市场需求来决定自己的生产，所以，多数情况下哲学家们都从事一般法则的创作。可是，一个问题油然而生了：一般规则究竟有何意义呢？答案几乎与问题的产生同时到来：没有任何意义。自然居高临下地要求我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拿出自己富于个性的创造来。而人们却不理解这一点。大家全都期待哲学说出终极真理，而这种真理从前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有。世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真理。况且，为什么我们每个成年人自己不实实在在做一个创造者，不为自己的恐惧而生活，不拥有自己特有的经验了呢？你可以领导和教导儿童、少年和青年人，可是，对一个总在寻求指示的成年人，却应千方百计地给予谴责和否定。因为他们只表现出了懒惰和胆怯，他们不敢从事尝试，因此才会总是向智者企求答案。而那些智者们呢，也居然毫不犹豫地为他人的生命承担责任。他们虚构出一些一般法则，似乎他们真的知道普通凡人所不知道的认识的源泉究竟何在。全是假的！智者并不比愚人知道更多——他们只是比蠢人更多一些勇气和自信罢了。每个聪明人都会发自内心地耻笑"书生"之见，可要知道书本却都出自智者之手。而书籍的的确确往往是极其有趣的——但这种有趣，须以其中不包含一般法则为限度。谁若是想要效法叔本华、黑格尔、托尔斯泰、席勒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榜样，来设计自己的一生，那才不幸呢！对他们的书，是可以甚至必须去读的，但生活却须凭自己的头脑。那些做过相应实验、亦即想要按照某种从书中读到的理论来安排自己生活的人，对这一点的体会更深刻。即使结果好，所得也只是低级的。这也就是说，你别无出路！一个无论他愿意与否，或迟或早他总归会承认任何

老生常谈都不适用，必须开始自己从事创造。难道说归根到底(après tout)竟然会如此可怕吗？普遍必然判断是没有的，我则有非普遍必然判断就够了。而只有那些导师们，才会为此而痛苦……

41

形而上学的慰藉——众所周知，形而上学总是以最无情的方式抨击各种快乐说，认为它是对人类尊严之伟大的一种侮辱(laesio majestatis)。人们对我们说，我们的尊严不允许我们把自己个人的幸福当作自己的最高目的，我们不妨假设实情确系如此。可又为什么、有何必要构想出什么慰藉，哪怕它是形而上学的呢？为什么要让形而上学这样"纯粹"的、理念的概念，充当像安慰这样如此粗陋、"感性的"(取康德之意)语词的旅伴和同盟者呢？对形而上学来说，以骄傲的无慰藉性来互立相互友好的誓言，岂不更加体面得多！安慰要求以心灵的稳定和平静，甚至以默默的喜悦为前提。可要知道，形而上学有责任(只要它肯同意自己也对无论什么负有责任的话)以极为鄙视的态度，摒弃一切尘世的幸福，而把它们抛给那些不能登攀到纯粹的、无利害关系的直观高度的唯物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们。欢乐或痛苦与形而上学论者有何关系！它们是它们，而他是他。可忽然间，他居然开始幻想起安慰来了！显然，这里准是发生了误解，而且，这误解还够大的。你越是深入思考和审察无穷无尽的形而上学课题的终极目标，越是会对它们所具有的终极性确信不疑。形而上学所从事的一切，都仅仅是为了能得到一种新的幸福，我差点儿要说这是快乐了。伏尔泰断言，

假如没有上帝，那我们就必须虚构出一个上帝来，而他那极端实证主义的立场，为这句话做了注脚。但在这里，实证性仅仅只是个形式而已，而其内容则是纯粹形而上学的。因为每个形而上学论者所最关心的，就是如何说服自己，上帝比他自己自身的存在更其如是地存在着。而既然他已信誓旦旦地这样说了，就他而言，这也就够了。尽管到后来却原来他错了。他找到了安慰，比安慰更甚的，他也未曾去寻找。如若不然，他就会明白，他有信仰这一情况，丝毫也不足以证明充当他所信仰的客体的真实性。那样一来他就会明白，他是否有所信仰，这压根就不重要，全部问题仅仅在于，是否有一个最高的意识实体，抑或我们这些话，只不过是僵死的必然性法则永久的奴隶和纳贡者。可是，说到底，这一切又与他有何干系呢?！宣称自己是快乐说的不共戴天之敌的他，所想望的除了慰藉还是慰藉，怀疑他是否有权被安慰只会令他发疯发狂。而他呢，也情愿以一切可以采用和不可采用的手段从道德的义愤直至拳头，来坚持自己的信念。显然，要想使一个这样的人理智起来，是徒劳的。既然一个人并不想望上帝，而一味只想着如何更好地安排自己的生活的话，你是无法把他的注意力从当下此刻中引开的。然而，或许上帝毕竟是存在的，而无论是伏尔泰还是形而上学论者，都不该去虚构一个上帝出来。而不信仰上帝根本就不足以反驳，反而恰好只能证明上帝是存在的。而且，它是比信仰更有力的证据。难道形而上学论者就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吗？遗憾！也许，他们在此之中找到了“安慰”，从而摒弃了采用道德和拳头及诸如此类的惩罚手段，可遗憾的是，他们太喜欢采用上述惩罚手段啦。

42

实际建议——有教养的、饱读诗书的人们应该能留意这样一个问题，即文学是一回事，而生活则是另一回事。然而，这决不等于说，作家永远都是在撒谎。我敢斗胆地、肯定地说，颇有一些作家只在非常罕见的场合下，才极不情愿地说一些谎。可我们必须学会如何读书，而读书的方法却不是轻易就能掌握的：一百个人里，差不多有几十个实际上弄不懂他们读的书有什么意思。比方说，人们一般都认为，善于在自己的书里充满激情地歌颂苦难的作家，时刻准备向每一个带着极度需要前来向他求助的人，敞开自己的胸怀。这一点，人们可以从他的著作里读到。可到后来，当人们在生活中看到，苦难的歌者们对尘世间的受难者们连一眼也不看就掉头逃跑时，他们感到十分惊讶，甚至会气愤填膺，进而大谈言行之间的矛盾问题来。但实际上，全部秘密在于歌者身上的苦难已经够多的了，多得都无以计数了，而由于他终究无法摆脱它们，所以，他才会尽情地歌颂苦难。“笼中鸟的歌唱不是因为欢乐，而是因为苦闷”(L'ucello canta nella gabbia non di gioian, ma di rabbia)——一则意大利谚语如是说。爱受难者，尤其是爱无望的受难者，那简直是不可能的。谁若持相反论点，谁就是在说谎。的确，曾经有过那么一次，有人说出了这么一句话：所有劳作者和注定要死的人，来我这儿吧，我会安慰你们。可你们是否还记得，那些犹太人问了他一句什么吗——“你是谁，为什么说起话来像是手中握有大权似的?”而假如他不能也无权回答这一问题的话，他就

应收回自己已经说过的话。而我们这些普通人，既没有他的力量，也没有他的权力，所以，我们只能爱尚未失去希望的邻人，而我们超越这一界限的任何企图，都是空洞的，不值得注意的吹牛撒谎。除了歌声以外，我们不能向歌者要求任何东西，更不能要求痛苦。我们倒是应该好好想一想如何才能使他轻松起来，而别想指望从他那里得到轻松。人不能总是哭哭啼啼眼泪流个没完。那就让我用第二句意大利谚语来结束吧——“没一条悒郁的狗会不摇尾巴”(Non e un si tristecane, che non meni la coda)。(直译意为：任何不幸都可以弥补。)

43

假如一个病人在治疗期间，肯认真服从有教养、值得依赖的医生的劝告和处方，那任何人都会说，他做事很理智。而假如病人拒绝接受治疗，不是由于根本不信任医生和医学，就是没有任何原因，而只是马虎大意的话，那任何人都会说他做的事很蠢。而假如一个健康人居然想让自己染上一种可怕的疾病，比方说肺痨或是麻风病的话，那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称他是疯子，不但如此，为了能制止他实现这种疯狂的意图，即使需要使用暴力，我们兴许也不会止步不前的。我们是如此坚信病是恶而健康是福。有人问了：我们的这种信念究竟有何根据呢？普通人当然不愿认真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它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一眼就能认出。但普通人对地球是一动不动这一结论，是不会心存疑窦的，当有人向他讲述现实世界与我们的观念世界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时，普通人只会哈哈

大笑而已。在普通人看来,不值得给予讨论的问题,难道还少吗!一个哲学家是无权以一个普通人的权利为依据的。一个哲学家必须要能不断地怀疑,除了怀疑还是怀疑,而当任何人都不再提问,不愿冒成为众人之笑柄的危险时,恰好也正是哲学家该提问的时候。假如日常理性就足以使人探求到真理的话,我们也许早就无所不知了。所以,无论你愿意与否,都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认为健康要重于疾病?我们甚至可以把问题提得更尖锐一点:究竟什么更好,是健康还是疾病?而假如我们能驳倒实用主义的观点——而在哲学中是不可能有实用主义的容身之处的,对此大家当然都同意——那么,即刻就会看出,显然,我们至少绝对无任何理由,宁要健康而不要疾病。无论健康还是疾病,都不是我们自己凭空捏造出来的,刚一降生世上时我们就发现它们已经成形了,其模样正是当初自然发明它们时的样子。对自然的隐秘意图所知甚少的我们,又何苦将评判自然成败的权利担在自己肩上呢?健康使我们愉快而疾病令我们烦恼——可要知道这种观点是一个哲学家所不配有的!他之所以是哲学家正是因为他善于采取客观立场,否则的话,他与蛆虫相比有何优点呢?哲学家们杜撰了拥有纯粹理念供其驱使的自律道德,而自律道德则与生活的经验内容又绝对没有任何关系。我们还必须再跨进一步,即必须让"理性"也能拥有其纯粹理念储备,以应付生活中的各种情况。要让理性能根据自己自由的见解,而根本无须按照公认的观点来评判。而一旦理性连其他任何根据都不拥有时——不妨让它权且使用一下否定法:日常理性肯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因此,应当予以推翻。日常理性重健康而鄙疾病,而理性仅仅根据这一点即须证明与此

相反的观点:病是圣福。而恰好是这么一种理性,才配享有自主和自律的美称。这种理性恰如一位真正的君主,除其自身意志外,不支配任何东西。就让所有的“观点”都为健康说好话好了,而理性却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主张,直至终究无法教会人们绝对服从时为止。理性不仅应把疾病捧到高位上,还应歌颂苦难、丑陋、失败绝望。理性每迈出一步都应与实用主义和日常理性斗争,直到人类毫无怨言地为自己付出全部贡赋为止。理性会害怕报复吗?理性是否会和道德一样,归根到底要适合大众的口味吗?

44

实验与科学——众所周知,无论实验的规模有多大,科学总归不承认它。科学是不会从实质方面承认实验的。科学把大量单个事实如多余的不必要的压舱物一般从船上扔了下去。科学只掌管那些合乎一定规则的、往往是顺序出现的现象,它最珍重的材料是这样一些事例,即一种现象可以依人的愿望引发,因而也就可以对之进行实验。科学解释地球的运动、四季的交替,因为此类现象表现出一种有规则的连续性;科学通过在电器上打火的方法向人演示打雷和闪电,总之,有规律的现象顺序出现得越明显,科学的领域便越宽广。可是,对那些单一的不可复现的也不能用人工方法制导的现象,又该怎么办呢?假如大家都是盲人,其中只有一个人在瞬息之间恢复了视觉,看见了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美好和壮丽,科学也未见得会把他的证言当回事的。但一个明眼人的证言所包含的意义,更重于数百万盲人的证词。一个人一生中可以

有猛然复明的时候，尽管它往往只持续数秒钟。难道能够仅仅因为此类现象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发生，因为它们不可能在每一个当下此刻给予制导这一点，就对它们的存在沉默不语吗?！或是即便也说但却必定出之以诗意的形式，以便让任何人都有权说一句：这一构思很美妙，可毕竟只是被现实所否认的构思而已？……科学要求人们这么做。科学只把那些可以由任何人在任何时候给予验证的判断称为真的。科学以此超越了自己的职能范围，这一点难道还不清楚吗？经验远比科学实验广泛，而单一现象所能告诉我们的，也远比经常重复出现的现象多。科学是有益的，对此无可争议，但科学并不拥有真理，而且也永远不会拥有。科学甚至都无法知道什么是真理，它只不过是在积累普遍必然判断而已。但是显然还有一些、并且从前也一直有过一些非科学的真理探索法，它们虽未引导人们达到认识本身，却也已跨入了它的门槛了，可我们却采用现代方法论，对其进行抨击，连认真想一想它们也不敢。要知道当初那些星相学家、炼金术士、占卦者、巫师曾在许多年中，一连数夜独坐屋里沉思冥想——谁能赋予我们权利断言他们不过是在打发无聊的时光？他们并未找到哲学的基石?！但是，问题兴许根本就不在什么石头上。甚至石头云云只不过是为了适应一个蒙昧人的理解力而想出来的一个借口，对其可疑的遁世隐居的一种解释罢了。假使一个炼金术士或古代的占卜师向邻人坦率承认，他的工作并非以普遍利益为目标，那他又能以什么借口为自己无所事事辩解呢？他们必须装出有益或至少是可怕的样子来，以保护自己不受纠缠不已的好奇心和监督的干扰。于是，他们或有意或无意地一味撒谎，时而给人以希望，时而吓唬人们。但他们当然也

有其自己的要事，而这种事又只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它是个人的事，而不是社会事业。而人们理应对个人私事保持沉默……而这是令人惊奇的！一个人往往会由于一些最微不足道的问题而在判断上举棋不定。但每人生活中都有些这样的时刻，到那时，一个人会不知从哪儿突然来了做判断时前所未闻的勇气和果决。昨天还是一个胆小慎微的谦谦君子，今天忽然情愿以一己之见对抗整个世界，为了捍卫自己的观点，他不怕与所有如今在世的人，也不怕与所有曾经活过的人作对。我们要问，这种信心从何而来，它自身又意味着什么呢？用通行的证明法为其进行论证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假如一个热恋中的人断定，他的爱人比世上所有女人都美，为了她哪怕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值；假如一个受欺负的人断言，说欺负他的人是世上最下流的家伙，理应对其实施拷打和死刑；假如一个自命为哥伦布的人对自己说，他所幻想的美洲是唯一值得人们给予关注的对象——谁会告诉这些人，说他们那些除了他们自己任何人都不与之分享的判断，是无权被人称为真理的呢？抑或更确切地说，总归会有人对他们说这番话的，可他们又会相信谁呢？他们肯为了谁的缘故而摒弃自己的认识了呢？为了客观真理吗？也就是说，为了要皆大欢喜而认为所有人都会继其之后重申他们的判断。但他们并不需要这样。就让堂吉诃德手执利剑打天下去好了，让他为了证明杜尔齐涅娅的美丽或每一架路上碰到的风车和羊群的危险性而和每个路上碰到的人打斗去好了。当代德国哲学家们和堂吉诃德一样意识不清，他们有这么一种预感，即实际上他人是在与风车和羊群斗，而不是与骑士和巨人斗；而他们的理想实质上只不过是一个只配喂猪的姑娘；而为能打消自己那致

命的疑问,他们诉诸利剑、证明,并且,只要一天不堵住所有人的嘴巴,他们就一天不得安宁。当他们从众人口中听到对杜尔齐涅娅的赞美时,他们会对自己说:是啊,她的确很美,从来没放过猪。当大家为他们在与风车和羊群的打斗所建立的功勋而惊羡时,他们兴高采烈:这么说,这不是什么羊群——如它们表面的样子,而是骑士;不是风车,而是巨人。这就叫业经证实的、普遍必然判断。公众的支持是当代哲学及其愁容骑士所以存在的必要条件。科学哲学怎么等也等不到新的塞万提斯,他将结束这一野蛮的习俗并通过证明铺就一条通向真理之路。所有观点都有存在之权利,而说到特权,那么,我们应当青睐如今最受鄙视的那些观点,亦即不可能得到验证,并由于这一点而不可能成为普遍必然判断的观点。既然人已找到一种能够表现他与世界真实关系的语言,那他就有权把它说出来让人们听到,尽管他对世界的态度是独一无二的,迄今未之一见的和永远不会重复的。通过观察和实验对之进行验证是受到严厉禁止的。假如在您身上,"客观检验"的习惯已经把对生活真理的发自天性的感受性戕害净尽了,那么,您已经就没有了自己的视觉和听觉了,您所能信任的,就只有不取决于您的意志的仪器所提供的证明,喏,这样一来,您当然也就一无所为了。您就坚持您的科学是最完善的知识的信念并归纳它好了。可是,假如您还有一双活人的眼睛和敏锐的听觉,那就请您抛开工具和仪器,忘掉方法论和科学的堂吉诃德作风,试着去相信您自己吧。您即使是找不到普遍必然判断,以及在您眼中羊群就是羊群,那又有什么要紧呢?这说不定还是向前迈进一步呢。您忘掉了与大家一起观看事物的习惯,但却学会了如何在任何人尚一无所见的地方有

所见；学会了不是思考，而是诅咒；学会用与大家格格不入的语言来表现前所未有的美和伟大的力量。我要重申一句，星相学家、炼金术士和占卜者们，当初之所以鄙弃实验方法，不是没有道理的，这种方法根本就不是近代的一种发明，而是在地球上有了生命以来一直都存在的。其实动物也会做实验，它们只是不会本着归纳逻辑写科学论文、并且也不会为自己的思维而自豪罢了。母牛一旦在水槽里被烫过一次嘴，下次即使走近食盆也会小心翼翼的。每个实验师所做的也与此相仿，只是更系统化罢了。但是，在缺乏经验的时候，动物往往依靠本能行事。可我们人，难道就有足够的经验了吗？难道经验就能给我们我们最需要的东西了吗？既然如此，那就让科学和手工业一起为人们日常生活需要服务吧，甚至也可以让同样想望为人服务的哲学去寻找普遍必然真理好了。但在手工业、科学和科学哲学之外，还有适应领域。任何时代里的人，都怀着自己特有的恐惧和风险在追求知识。难道说我们这些 20 世纪的人，会自愿放弃自己的主权，出于对社会舆论的恐惧而专门寻找有用的知识吗？或为了不让自己显得过分颠沛流离，我们接受当代形而上学以取代哲学之石，以前提、绝对及诸如此类表面上超验的表达法掩盖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恐惧？

45

俄罗斯精神——众所周知，俄国文学甚至整个俄国艺术的突出特点，在于简洁，真实和修辞上根本不事夸张。这究竟是优点还是缺点，我不打算论及，但有一点在我看来毫无疑问：我们的简洁

和真实，是我们在文化上相对缺乏教养的一个结果。当欧洲的人类思想界已经一连好几个世纪都在为无法解答的难题而苦心焦虑时，我们才刚刚开始尝试自己的力量。过去我们还未品尝过什么是失败。一个思想最深刻的俄罗斯作家的父亲，可能只是一个一半时间花天酒地、一半时间从事单调公务的老爷，或是一个为糊口的面包而心焦如焚、连一分钟游手好闲寻欢取乐的闲暇也没有的农夫。我们如何才能知道人类的认识究竟有没有界限呢？我们似乎觉得如果我们不知道，那也仅仅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认真地去寻找。别人的经验对我们来说是不必要的，要知道要了解别人的经验，我们可以从最不可能的来源——书本——中，得到最不明确、零零星星的信息。相信未来是美好的，这是人的天性，在没有相反证明之前，对待那些想要剥夺您信仰的任何企图，我们往往会给予有力的反击。一个在思想感情上带有最强烈怀疑主义特征的俄罗斯人，其内心深处也隐藏着希望。我们那使整个欧洲批评界如此目瞪口呆的对“真实性”的无所畏惧，即源出于此。现实主义是人们在地球上发明的，在那里，人们为它奠定了理论基础，可也是在那里，与现实主义相对，人们还有许许多多、可以软化由现实主义推导出来的、无可挑剔的结论的理论。地球上还有“上帝或自然”(être suprême, deus sive natura)，这是把自然和神同一化的一个公式，是斯宾诺莎哲学的观点之一、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康德的前提、英国的实用主义，进步及数十个哲学和社会学理念，而极端现实主义者们自己，就是用这些理念，把“生活真实”包裹得严严实实，以致使它根本就不成其为真实了。西方人只依靠自己并且也只相信自己。他坚信如果他不能自救的话，那任何人也不会来救

他。与此相应，他的全部意图都指向一点，即如何更好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他所能利用的时间是一定的，有限的：如果他来不及唱完自己的歌的话，那歌便会半途而废。为了那些没来得及演唱的节拍，命运连一分钟也不肯给他延长。而作为一个经验老到的乐师，他能极好地控制自己。在他那里就连一分钟也不曾白白浪费，因为他懂得，哪怕把速度只放慢到那么一次，就会与和谐永远拜拜！速度就是一切，而速度的条件即在于运动的轻盈性和快捷性。一个演员必须能在很短的一节拍中演唱若干个音，而且要使演唱能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他根本没有赶拍，供他支配的时间远远多于他所需要的。而且，每个音响都应当是完美的、饱满的、有其完整性和表现力的。要做到这一点，仅有天赋还不够。还需要有经验，有传统和学派，有继承前人的本能。抓紧每一天，抓紧每一秒钟(Carpe diem)——欧洲人懂得这一点已经有两千年之久了，而我们却至今仍相信，急什么急，我们的时间还有的是。屈指计算天数甚至分钟和秒数，你倒是给我找出这么个俄罗斯人，肯下作到玩这样一种小市民的把戏！我们左右打量，伸伸懒腰，揩揩眼皮，我们想要在开始做某事前，先须决定做什么和怎么做，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做决定也不是马马虎虎，不是根据从别人那里得来的零零星星、支离破碎的信息，而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头脑。我们不承认传统：任何一国文学中也不曾有过如我国文学中那样一种与传统的富于挑战性的斗争。我们想要重新审查一切，重新决断一切。不用说我们的大胆和勇气，其根源在于我们对自己的力量，有一种完全没有文化的依赖。在我们这里，别林斯基——一个肄业大学生，一个从第三手材料了解欧洲哲学知识的人——居然敢

就早已被人忘怀了菲利普二世和宗教裁判所的牺牲品一事，向全世界起诉。而全部俄罗斯文学艺术的意义和实质，就在于这场诉讼。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创作活动临近终点时，曾就一位备受痛苦的小孩的一滴眼泪，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挑起了同样一场争论。俄罗斯人往往觉得他无所不能，因此无所畏惧。俄罗斯人会以最阴暗的色调来描绘生活，而假使你向他提这样一个问题时——你怎么可以接受这样一种生活呢？怎么可以与现实生活中所充斥的我们的全体作家，从普希金到契诃夫变本加厉地、如此毫不留情地描绘的所有可怕事物妥协呢？他会用伊万·卡拉玛佐夫的话来回答你："我并未接受这种生活。"这一答案初看上去是荒谬的，既然有这种生活，那么不接受它是不可能的。但在这个答案之后，隐藏着另外一重含义，即对最终战胜"恶"的可能性所怀抱的信仰，尚未完全耗竭。因此，一个俄罗斯作家不会在敌人面前躲藏，而是会径直迎着敌人走上前去。我们的教派信徒已被活活地埋进了土里，而形形色色的、五花八门的产生于俄罗斯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及其信徒们，则走向民间，走向只有上帝才会要他们去的地方，以此破坏着自己和他人的生活。作家们也不甘落于教派信徒之后。他们同样不愿精打细算地节省时间，不愿意分秒必争，而他们这样做，并非如一位肤浅的、远离俄罗斯生活的观察家所可能以为的那样，是出于懒惰，而是出于信念——这种信念并没有任何根据——即他们在时间上是太富有了，以致犯不着在时间的支出上斤斤计较分分秒秒和节奏节拍，所有这一切都太渺小了，太不重要，普通的肉眼是难以分辨出它们来的。我们想从无穷的永恒性中慷慨地汲取一切有限，即欧洲市民阶层的命运。除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外，所

有俄罗斯作家完全真诚地鄙视西方人的拘泥细节。就连崇拜西方的作家,也从未真正理解,也不愿理解西方。正因为如此,在我们这里,西欧的观念才会总是带有幻想的性质。就连“清醒的”60年代,实际上也是一个最浑浑噩噩的时代,在我国,那些阅读达尔文、解剖青蛙的都是那些期待弥赛亚、基督的二次降世的人。我们这儿即使现在也在重复同样的故事。我们纵容自己,尽可能摆阔,阔到一个人所能想象的极端——要真诚,要真实——仿佛我们真的就是精神上的克雷兹①。其所拥有的财富多得不可计数,以致可以尽其所有来向人展示,从而犯不着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况且,甚至世界上最富有最有力量的统治者克雷兹们,也不认为自己有权永远只说实话,就连帝王们也不得不做作——如在外交关系方面——而我们呢,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只说实话,掩盖我们真正本质的任何谎言,都是犯罪,因为我们的真实本质才是世上所能有的当中最好的一种!……你试着把这话讲给一位欧洲人,那么,那欧洲人哪怕只要稍稍分析一下你的话,也会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的。一个欧洲人会把自己理性和天才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知识和全部技艺,用于使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一切,尽量少暴露一些,尽量自然一些,因为自然——在欧洲对此任何人也不会有异议的——是丑陋而又可怕的。在欧洲,不光优美艺术②(这是一种旧的说法),就连科学和哲学也在本能地说谎,并以说谎来为自己的存在辩解。一位欧洲学者所为您提供的,开头和最终都是完善的

---

① 克雷兹——古代吕底亚的国王,传说拥有无数财富。此处指极大的财主。——译者注

② 指绘画、雕刻、音乐等。——译者注

理论——喏，谁会不懂，完善性有什么意义以及为什么要有完善性。在我们的西欧邻人们那里，任何人都不会做出中途打断自然、不让它说最后的、给人以希望的话，不让它从事包罗万象的综合、不让它把话说完这样可耻的事。在他们那里，早在最初一句话开始前很久，给人以安慰的终结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最后一句话，就已事先储备好了。在他们那里，夸张和修辞是创造的必要条件（conditio sine qua non），是反对所有恶的唯一妙药。在那里，在哲学中居统治地位的是神正论；而科学中则是规律性。甚至就连康德也无法避免朗诵，甚至在康德那里"道德需求"也成了终极证明。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得不在古老而又文明的欧洲那既有艺术又完美精致的、凝结了数千年之久艰难而又痛苦经验的谎言和朴实无华、缺乏技巧、年轻而又不文明的俄罗斯的简洁真实之间，做出抉择。他们距终点近，而我们则更接近于开端。但究竟是谁距真理更近了呢？而且，我们究竟是否可以谈论自主、自由的抉择了呢？大概是不可以的。而且，或许无论是老年还是青年，都同样无法为我们提供我们所寻求的真理？莫非就连有关真理的概念本身，有关真理这可能性的推断本身，也不过是局限性——我们的经验——的一种结果？我们先验地断定，前者可能而后者不可能，而且，还从这一任意前提中推导出真理性的概念。于是乎，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生存的力度和条件，按其自己的方式进行判断。胆怯而又惊恐的人，在为营造秩序而张罗，因为秩序至少能让他过一天安宁的生活。年轻人幻想辉煌和美丽。老年人则任何都不愿意想望，因为他已无任何指望。如此这般，不胜枚举。而所有这一切都被称为真理和真实。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所见识的，就已囊括了生

活的全部。因此，唯一正确的便是经验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了：我们只有不脱离我们生存的真实条件，才能谈论何谓真理。而只要一脱离开它，科学也就完蛋了：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我们那给人以信实感的真实性，和欧洲的修辞学一样，处在真理与谎言的“彼岸”。年轻的东方和古老的欧洲，只是在忍受真理强加于它们的局限性，并尽可能想要摆脱这一局限性——前者是漠视它的存在，而后者则努力适应它。可归根到底难道说前者和后者还不都是一回事儿吗？难道说艺术的修辞学不也像真实一样诱人吗？前者和后者都是生活。难以容忍的是想要假扮真实的修辞学和想假扮文明的真实。这种假面舞会须以真理亦即局限性为其客观而又永恒的意义之所在。而这是令人感到屈辱的：我们想要的至少是直到相反的证据出现之前，只有一种观点具有或可能具有客观意义：世上没有任何事是不可能的。每次当某人想要让我们相信，还有另外一种局限性更大的真理时，我们便会惊慌失措，起而利用一切所能利用的手段来捍卫自己。此时，我们甚至不惜采用逻辑和道德，尽管对它们我们曾经大肆嘲弄过。而这又有何惊奇之处？当一个人是在捍卫自己最后一宗财产时，对使用什么手段就不那么计较了……

46

只为那些头脑不会发昏的人！（Nur für Schwindelfreie!）说实话，本应以某个道德戒条来结束一本书。我本应对读者声明，说，尽管有了上文所说的一切，甚或正是鉴于上文所述的一切，如

众所周知，在结语部分，任何时候都不妨用“鉴于”一词来取代“尽管”一词，尤其当结语部分是根据为数众多的零零星星的材料写成的时候，如此一来，喏，由于上文所述，希望毕竟还没有死去。每次破坏都引向创造，在艰难的劳作之后，等待我们的是休憩的甜蜜时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一类的陈词滥调是作家们常常用来安抚读者“和自己顺顺气儿”的——数不胜数。但说这类话，任何时候都来得及。既如此，何不让我们把道德问题拖后几年甚至几十年——假如上帝假我以时日的话。有何必要一定要在此刻，在每本书的末尾做“结论”呢？我几乎坚信，或迟或早，我都会为读者提供他的心灵所企求的一切的。而他呢，即使我不安慰，当然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那么，假如读者自己为自己许点什么诺言那又会怎样呢？要知道无论是读者还是作家，实际上同样都无法履行其诺言。可是，如果不能换一种方式，如果一个作家必定得大声疾呼地宣告，害人的隐秘愿望是可以实现的。那么，我们不妨姑且同意这种假设，至少，我们可以使其延期，延期到老年，到直到无限的统治权(usque ad infinitum)……而暂时，就只一个口号：只为那些头脑不会发昏的人！阿尔卑斯山里有一条小道，非常狭窄，难以穿行，悬在万丈深渊之上。只有那些不怕头晕且已习惯了的山民，才敢沿这条小路行走。那些头昏的人，只能选择平坦的大路，或是干脆坐在山谷里欣赏披雪的峰巅。难道我们非得爬行这条小路不可吗？在永久性雪线上面，并没有草木葱茏的牧场，也没有金矿。据说，在那里可以找到永恒之谜的谜底，可人们胡诌的东西还少吗！并非所有的流言都可以相信。如果有人对山谷厌恶了，如果他喜欢登山，如果他敢于朝万丈深渊里俯瞰——最主要的——如果他

在生活中除了“形而上需求”外已经一无所有的话，那么，他当然会往山顶登攀的，他甚至都不愿打听一下，山顶上等待他的是什么。此人不但不怕，甚至渴望让自己的头发昏。但他未必会召唤他人跟在自己之后往上登攀——并非任何人都适于做他的伙伴。况且在此类事情上，也不需要有同伴。尤其是因为其他人都习惯于走平坦的大路，习惯于有航标，有里程碑，有详细的地图，图上往往预先标出前方道路上的每一个转弯之处。这些人不光是于事无补，反而会阻碍这一事业。他们会成为那样一些既沉重又多余的活的压舱物，以致你连把他们抛出船舷之外也不行。领他们一块儿走，你就尽等着安慰他们，向他们许诺吧！既如此，那就不要他们，一个人走自己的路，岂不更好？而且，不光不引诱他们跟自己走，如果可能，何妨把他们吓跑，有意夸大这件事的难度和危险性？为了让他们的良心不致过分不安——谁喜欢走大路，谁就必定喜欢良心的安宁——我们不妨想出点儿招儿来，为他们的无为做些辩解。我们不妨说，他们是些最优秀的、最尊贵的人，他们是大地的精华，总之，对他们表示万分尊重，以致就连最善于挑剔的人也说不出个不字来。可是，既然他们的头会晕，所以，他们也就有完全合法的权利待在家里不去登山。因为山路，正如任何一位阿尔卑斯山的向导都会告诉你们的，只是为了那些不晕的人——只为那些头脑不会发昏的人——存在的。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a
SS号=14675052